

人文 / 历史 / 传承 / 创新

FUDAN
ECONOMIST
[仙舟客]

人文 / 历史 / 传承 / 创新

FUDAN
ECONOMIST
[仙舟客]
2018.06.17



仙舟客

[伉俪] 叶世昌、陈文莲：携手七十载，共进新时代 / [生涯] 徐康宁：也无风雨也无晴 /
[创业] 王爱民：知识为体，智慧为用 / [聚首] 王帅：磨炼与回归，让未来无限精彩 /
[女性] “逐梦者”赵雪芹：在命运的安排面前，从不认输 / [跨界] 祝君波：出版文化，收藏心性 /



吴斐丹

道阻且长，逆流而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全球校友会



“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微信公众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服务中心

电话：021-55665306 | 传真：021-55665306

Email: econalumni@fudan.edu.cn



卷首语

“好学力行，薪火相承”

“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伴随着夏日的脚步，第六期《仙舟客》也如期而至。

本期的校友代表让人不由想起古代文学经典《中庸》中的那句话“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他们不仅苦心经营学术，更带有着一份社会的关怀，不断将学术投入至实践中。

本期封面人物吴斐丹先生，是经济学院的学术理论刊物《世界经济文汇》的创始人。通晓日、德、俄等多国语言的他大量阅读国外的较为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并将其引进中国。同时，他也率先在复旦成立了人口研究室，为解决人口问题下了不少功夫。

经济学院另外一名老教授叶世昌，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货币史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他人合著的《中国货币理论史》填补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而于 1949 年来到复旦大学担任经济学系教授的蒋学模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材》，跨界翻译了名著《基督山伯爵》。

老一辈的成绩辉煌而令人敬佩，而新一代的经济学院才子也传承着老一辈人“好学力行”的精神，不断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自我的能力。

98 级博士生王爱民将自己的所学用于上海浦东机场的市场定位、航线网络和国际航空枢纽的战略规划之中；96 级经济系校友吴立波，毕业后跨行业至传媒，和队友携手创办了《东方周报》的新闻周刊。

本期的三位女性校友代表“巾帼不让须眉”；00 级博士文静至今的职业生涯，从英语教师到研究历史地理，再到最后研究经济的道路，创造了她曲折却多彩的人生；李丹将自己的学术生涯投入至“经济历史”中，用经济学量化的思维来研究历史；现为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赵雪芹校友一直坚持在工作与研究的第一线，七位青年分析师从她的团队里成长起来，之后成为了各大券商的首席分析师。

此外，本期还介绍了 00 级“教授博士生”徐康宁，现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的 96 级经济系研究生邵宇，现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的 00 级校友王勇；在澳洲创业的 08 级校友黄辉毅，敢于用自己的方法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的黄振兴，奔赴伊拉克，献身石油事业的王帅。以及一直致力于为校友服务的，复旦大学澳洲校友会理事丁绎镛等等。

转眼间一年已经逝去，人生虽然匆匆，却珍藏着无数珍贵的细节。但庆幸有《仙舟客》相伴，每一页都镌刻着校友们扣人心弦的惊叹与感悟人生的真谛。老一辈的教诲在不断传承，新的一代也在不断为其注入时代的精神。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会长

编委会主任 |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张 军 Zhang Jun

编委会 | Editorial Board

赵定理 Zhao Dingli / 俞乃奋 Stephany Yu
陈诗一 Chen Shiyi / 刘军梅 Liu Junmei

执行主编 | Executive Chief Editor

窦锋昌 Dou Fengchang

值班编辑 | The Editor on Duty

刘 浏 Leo

责任编辑 | Editor

王晓莉 Shirley Wang / 吕晓刚 Lv Xiaogang
邱佳佳 Qiu Jiajia / 朱家菲 Zhu Jiafei
梁 冰 Liangbing

记者 | Journalist

曹 柠 陈 熙 陈 曦 甘 磊 韩可欣
何敏君 金宇壕 李 博 刘 浏 马恺昕
欧杨洲 唐一鑫 翁海峰 殷鑫豪 袁 驰
张程喆

美术编辑 | Art Editor

Mark

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
Alumni Associatio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服务中心
Alumni Service Center,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CONTENTS

[封面]

04 吴斐丹：道阻且长，逆流而上
文 / 刘浏



[伉俪]

14 叶世昌、陈文莲：携手七十载，共进新时代
文 / 唐一鑫

[追忆]

26 蒋学模：从翻译家到经济学家的华丽转身
文 / 蒋维新

[生涯]

32 徐康宁：也无风雨也无晴
文 / 何敏君

40 邵宇：潜心修行，躬行实践
文 / 李博

52 王勇：天道酬勤，愿守一方书桌
文 / 陈熙

[创业]

62 王爱民：知识为体，智慧为用
文 / 金宇壕

[聚首]

68 04 经济系：十年归来，仍是少年
文 / 陈熙

72 丁绎镬：在南半球 守望日月光华
文 / 殷鑫豪

78 黄辉毅：拥抱世界
文 / 欧杨洲 袁驰

84 黄振兴：让学术和音乐交织的使者
文 / 袁驰

90 王帅：磨炼与回归，让未来无限精彩
文 / 甘磊

[女性]

96 文静：非典型性经济学人的蜕变
文 / 马恺昕

106 “逐梦者”赵雪芹：在命运的安排面前，从不认输
文 / 韩可欣

[问学]

116 李丹：经营学术，就是经营热爱的事情
文 / 陈曦 翁海峰

[跨界]

123 祝君波：出版文化，收藏心性
文 / 曹柠

134 吴立波：人生山重水复，但我永不迷路
文 / 张程喆

[二代]

140 家庭教育：给孩子点亮启程的明灯
文 / 陆波

[经纬]

149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快讯



图 / 祝君波



吴斐丹：道阻且长，逆流而上

文 / 本刊记者 刘浏

1931年11月，当时住在横浜路景云里的吴斐丹，由于室友床铺下被警察搜出了红色书刊，自己也被莫名地一同逮捕，随后度过了半年多令他胆战心惊的监狱生活：

“最初，当时所谓的‘政治犯’被一同关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然而，由于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计划，我们被转送到漕河泾上海市正式监狱，与已判刑的罪犯一起关押；随后由于战争、罪犯管理等一系列的原因，我们又被解送到杭州、苏州等地的看守所，最终在淞沪血战结束后，被送回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对于这半年的囚牢生活，吴斐丹用戏剧家田汉在抗日战争中的一首入狱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平生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
安用螺纹留十指，早将鸿爪付千秋。
娇儿且喜通书字，剧盗何妨共枕头。
目断风云天际恶，手挟铁槛使人愁。

吴斐丹曾说：“我便是在激流之中度过自己平凡的一生。”然而全国各地不断辗转的经历、近十所大学的任职、经济与人口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注定了他的人生将不平凡。面对道阻且长的激流人生，他选择了逆流而上。

动荡之际，救国之思

1907年，吴斐丹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的稠城镇石古金村。腐朽的统治、飘摇欲坠的王朝注定了这将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不久后，中国土地上发生了一场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大革命，男人的长辫与红缨帽“不见了”，女人的缠脚布也逐渐“消失”。在这一年，年仅5岁的吴斐丹进入了私塾读书，并在1年后转至新式小学，开始接受科学与民主的教育。

由于母亲是一个纯朴而又勤劳的农

民，加上父亲是一名守旧的中学教师，重视“耕读家风”，在父母的影响下，吴斐丹从小便与母亲一起打理着家中的一块小土地。吴斐丹在个人自述中曾写道：“割草、打柴、碾谷、下种、收割，当时的这些农活我都与村民们一起干过。”这种长期的田间劳作让他养成了与农民亲密相处的习惯，也深刻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贫穷与艰辛。

在时代环境、学校教育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下，吴斐丹从小便在心中埋下了一颗“实业救国”的种子：“既然封建统治已经被推翻，今后如果能发展工业

便能够救国了。”

1921年小学毕业后的吴斐丹顺利考入金华市的浙江省第七中学，并于两年后转入杭州的浙江省第一中学。当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已经先后展开，吴斐丹接触到了西方文学，例如林译小说集，这让他了解到西方文化中一些较为新颖的文学体裁。

在吴斐丹的记忆中，学校还会邀请胡适之、徐志摩及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等前来作报告，鲁迅先生与陈望道先生也曾在这里教过书，进步的民主思想不断熏陶着吴斐丹以及这所学校的学生。在这一阶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诞生了，争取民主的国民议会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陆续展开，吴斐丹便跟随着时代的脉搏一起成长。

1925年夏天，吴斐丹考入厦门大学的预科班，这正好处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有许多著名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因为不愿意遵循守旧而南下，其中有一部分名人，例如鲁迅、林语堂、顾颉刚、孙复等就在厦门大学担任教授。

先前，厦门大学并不是一个经常被政治风暴影响的区域。由于地处孤岛，当地的闽南华侨众多，厦门大学 and 东南亚各国联系也较多，这导致其反而与国内联系较少。加上厦门大学拥有良好的图书馆等基础设施，因此在当时被视为一个不错的学习场所。但国内政治氛围的紧张，加上新鲜血液的流入，教师之间对部分时代问题的看法与观点逐渐产生了矛盾与偏差。这种冲突最终导致了部分教师和学生纷纷离开厦门大学。

吴斐丹也是其中之一。当时的武汉和广州正处于革命形势高涨的时期，而

吴斐丹也想加入到这个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之中：“我在1927年时前往武汉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读书。在转校后，便担任了武汉国立第二中山大学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与学生会负责人。”在此读书期间，吴斐丹深受当时的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汉俊的影响。

吴斐丹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曾同他有多次接触，深深感到他是爱护青年的。当时他教唯物史观，教学质量非常高，令我颇有收获。”此外，李达讲解的社会科学概论、邝摩汉在课堂剖析的社会问题，也同样给吴斐丹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但好景不长，中国的革命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在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七·一五大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此失败，许多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被屠杀，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吴斐丹所在的国立第二中山大学也被反动派盯上，数以万计的军队层层包围了学校达一周之久，最终导致学校被迫解散。

吴斐丹亲眼目睹自己敬爱的李汉俊老师，以及部分同学被活活枪杀在大学附近的东厂口省议会广坪，这令他十分痛心。残酷的现实，让吴斐丹改变了先前“实业救国”的幻想。如果政治问题没有解决，就无法通过“实业”来救国。于是，他希望能够着手研究社会科学，并通过自己所学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提供自己的建议。因此，吴斐丹于1928年转学至离家较近的复旦大学，开始攻读社会学系。

日月所照，梯山航海

在复旦求学期间，吴斐丹果断参与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左翼作家联盟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组织，并与张明养、吴景崧、夏征农等校内以及当时的劳动大学和立达学院的进步同学与进步教授商讨时代问题。

在课外，吴斐丹利用当时复旦大学地处农村的优势开展社会调查，深入到当地农村与靠近蕴藻浜的工人区，去体验农民与工人的生活，这让吴斐丹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从1930年起，他便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相关文章。

1931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吴斐丹定居上海横浜路景云里，并在吴淞中国公学和复旦中学分别教授伦理学与西洋史。但就在这一年的11月，与他住在一起的室友被警察搜捕出红色书刊，这让吴斐丹也被一起抓进了监狱，随后度过了长达半年的牢狱生活。吴斐丹说：“在我们被捕前的政治犯，很多都被暗中枪杀。但幸运的是，关押我们这些政治犯的警备司令戴戟非常关爱青年，因此提前将我们释放。”

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调养后，吴斐丹经由他先前的复旦同学、时任《申报月刊》的编辑吴景崧介绍到《申报月刊》工作。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大萧条的阴影还未散去，作为《申报月刊》的编辑，吴斐丹必须对世界经济危机中种种现象发表看法。为了对付当时的经济问题，他必须将对经济的研究深入下去：“因此，在1933年9月，我决定东渡日本，去学习国外的经济理论。”

他在回忆录中这么写道。

抵达日本后，吴斐丹前往库页岛、北海道、鹿儿岛等地调研，撰写了许多从政治经济上揭露日本侵略政策的“日本通讯”，并寄回国内，在《申报月刊》和《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但这些文章并不完全是对日本的批判，吴斐丹深信中日两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关系，将来一定能够和睦相处，所以在写通讯时，总是参考更多的资料与文献，以求达到观点上的平衡，让每一句话都言之有据，而不受自身感情的控制。

此外，吴斐丹还在日本的上智大学夜校学习德语，以求能阅读更为广泛的学术材料。但随着日本侵略中国形势日益紧张，加上吴斐丹在许多“日本通讯”向中国传递着日本当局的信息，日本当地警察不断加强着对他的监视。吴斐丹便于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后回国，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此后，日军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于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吴斐丹随即前往昆山前线担任了《申报》的战地记者。

然而，上海不久后就沦陷了，敌军继续长驱直入，很快便占领南京，并进攻武汉。吴斐丹几经辗转来到武汉，于1938年春夏间参加由国共合作举行的战时大本营活动，担任大本营政治部秘书，参与抗战动员工作。

吴斐丹说：“虽然当时迫于形势，国共合作组成了新政府，但两党的摩擦与矛盾也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政治部的工作也变得愈发艰难。”考虑到先前在上海结交的许多老友张明养、金仲华、吴景崧等人也都南下去香港工作。吴斐丹便也前往香港，并为生



• 图：青年时期的吴斐丹(上排右4)

活书店编写《战时日本年鉴》和《抗战史料》。

不幸的是，日本正在进一步对广州进行大密度的轰炸袭击。不久后，广州也沦陷了，香港成了孤岛，出版物寄运到内地发生困难，《战时日本年鉴》改名为《战时日本全貌》出版后便不再续编，而《抗战史料》也因资料来源和出版的困难而停止了编订。不仅是吴斐丹，很多文化人都做好离开香港的准备，如胡愈之和郁达夫也脱离政治部来香港随后

而转道前往新加坡。

吴斐丹还记得先前，时任复旦大学的教务长李炳煊曾在吴斐丹从梧州到香港的途中，说很希望他到重庆复旦大学（抗战发生后复旦迁往了重庆）去教书。在这样的情势下，吴斐丹便于1939年5月赶到重庆复旦大学任职，主要教授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等课程。此外，吴斐丹还先后在中央大学、朝阳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商学院、政治大学及其他大学担任过专任和兼任教

授。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吴斐丹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结合自己教学工作，进一步开展了对旧中国的财政金融和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撰写了《战后我国财政建设要点》、《当前的中国银行制度问题》、《中国经济危机的分析》等论著，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搞通货膨胀、从经济上掠夺城乡人民的种种事实，将反动当局贪污、盗窃成风的现状和盘托出。

随后，吴斐丹教授于1947年在《中国农业经济的危机及其补救方策》一文中将中国经济衰落的原因归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入，致使农产品价格低廉；加之受农村高利贷的盘剥，加重了农民租税负担，致使土地兼并和集中。对于这篇文章，吴斐丹先前所指导的研究生尹伯成说：“这些分析虽有一定局限性，但这说明吴斐丹已认识到旧中国农业衰落之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三座大山被成功推翻，时代对经济方面的研究有了更新、更为迫切的要求，吴斐丹便进一步投入至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中。

对他而言，节日、寒暑假就和平时工作一样，一年之中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吴斐丹的儿子吴宗上说：“父亲的个人物质生活相当朴素，既不抽烟，也不喝

酒，吃饭着衣都十分简单，很多衬衫都缝缝补补了好多遍。”但对于订阅书报的钱，吴斐丹却从不吝惜。他常去书店中寻找一些与经济相关的书籍，并把每月工资中的大部分都花在了买书与订阅报刊上。吴斐丹说：“搞经济学的人懂的东西应当多一点。”

1957年，吴斐丹开始担任《世界经济文汇》杂志主编。对此，尹伯成回忆道：“当时经济系外文资料室有许多外文刊物，但是看的人甚少。而吴斐丹先生因为懂多国语言，便萌生了将这些外国刊物上有价值的文章进行翻译的想法，这样这些废弃的文献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这个愿望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实现了，《世界经济文汇》因此而诞生。在这个刊物上，全部的文章都是国外经济文献的译本，由吴斐丹自己以及聘请系里的一些老师进行翻译。

这种认真与负责任的精神也同时体现在吴斐丹的课堂上。外国经济学说史这门课是当时经济系学生最主要的课程之一，因此历来都由系里声望较高的吴斐丹负责。尹伯成说：“他上课时总备有一本厚厚的讲稿，但从从不照本宣读，而是完全脱稿讲授。在讲解的过程中，他经常会把对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穿插在其中，将新旧社会进行对比，用正确的道理启发和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

在课堂之外，吴斐丹也会抽时间去看望学校里的青年学生们，嘘寒问暖，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吴斐丹知道学生们多数在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这个吃完晚饭的时间里呆在宿舍休息，他便利用这个时间跑到学生宿舍，而自己吃晚饭



• 图：吴斐丹一家，吴斐丹为右一

的时间常安排在晚上七点钟以后。因此吴斐丹在学生中间口碑甚好，许多同学都说：“他确实是一位好老师。”

复旦大学经济系八三级的许德民说：“我刚升二年级时，曾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发表了自身的一些观点与看法，但不知是否准确合理，便向吴斐丹请教。吴斐丹虽然并不认识我，却在一天内把文章修改好，并亲自送到我的寝室。后来该稿件被《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部采用。”

而在尹伯成的印象中，吴斐丹不仅对学生好，而且还是一名非常清廉正直的老师，从来不受他人的一份礼物：“1979年国庆节前，吴斐丹曾托我回苏州探亲时在苏州帮他买一只净水器用的

活性炭的胆。但因为只要几元钱，我一直拒绝告诉吴斐丹具体的价格，不肯接受他的钞票。”结果1980年的元旦，在尹伯成回家探亲时，吴斐丹给了他两斤重的大白兔奶糖，但这只“胆”根本不值两斤奶糖钱。

可就是这样一名学术能力强，又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了反革命。在“文革”期间，吴斐丹教授成为经济系中第一个被批斗的“反动学术权威”。他曾经的日本留学经历被称为“崇洋媚日”，他批判俄国沙皇是独裁者的文字被当作含沙射影中国，他宣传洪亮吉的人口论被视为反对国家“人多热气高”、“人多好办事”的人口思想。《世界经济文汇》也因“文

革”而被迫停刊。

但了解吴斐丹的人都知道，他去日本留学是为了让中国更好地了解自身以及国外的经济现状；他批判沙皇只是针对俄国当时的情况；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思想最终被毛主席采纳，成为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

虽然遭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但吴斐丹并没有屈服，相反他一直坚持到了“文革”的结束。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一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此时的吴斐丹已经迈入70岁的大门。曾有人劝吴斐丹好好休息、保养身体，但吴斐丹反而更加精神焕发，干劲倍增，继续站在教学第一线：“知识分子切不可清闲，要抓紧时间为人民多做点事。”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迅速发展与前进，吴斐丹更希望能够为国家的“四化”事业献出一份力量。

一方面，吴斐丹继续进行着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于1979年与1980年分别修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与翻译《魁奈经济著作选集》，为我国在古典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吴斐丹继续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上下功夫。当时，中国的人口数量即将突破10亿大关，人口方面的问题逐渐凸显。吴斐丹便在1979年4月

的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强调了“计划生育”，并在随后的第二次人口理论会上发表长篇论文《研究人口理论，掌握规律，控制生育，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我们应该有计划地将人口控制在较低水平上。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回忆道：“那一年，吴斐丹在复旦抽调了几位青年教师成立了复旦大学人口研究室，并最终获得批准。在研究室随后的运行中，吴斐丹申请到了联合国支持的23万元研究经费，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然而，吴斐丹雄心十足，一心一意要把它做大做强。在吴斐丹老师的努力下，“上海人口学会”也于1980年成立了，并由其本人担任第一任会长。

为了更好地吸收国外人口治理经验，吴斐丹不断加强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并与他们结下了良好的关系。他的人口理论当时被作为代表性论点收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的《中国人口的斗争》一书中。1981年春天，他率领中国高等学校人口考察团前往加拿大、美国、日本三国进行了为期34天的考察，了解不同国家人口问题的现状，以及其人口学人才的培养和训练情况。他的带团出访，很快便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这自然便于加强复旦人口研究室的国际联系。

但就在吴斐丹出国访问回来后不久，正值他人口领域的工作蒸蒸日上时，他自己却倒下了。尹伯成说，当时的吴斐丹被医生查出了晚期肝癌，住进了医院，但是病床上的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研究生以及人口室工作的情况。他甚至



• 图：吴斐丹(右一)与苏步青(左一)和周谷城(中间)



• 图：1980年吴斐丹参加国际人口学家北京圆桌会议

还抽出时间来修订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说史》，准备增写《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一章。吴斐丹说：“现在我虽然年老有病了，但只要还有一口气，研究社会科学的心就不死！”然而，病魔终究在1981年9月12日早晨夺走了他的生命，享年75岁。

当时的复旦大学副校长邹建秋说：“吴斐丹先生的去世，对复旦损失太大了。”复旦大学人口室的成员说：“吴先生如果晚10年离去，我们人口所的发展就不是现在这个规模，上海的人口学会也会发展得更好。”他的研究生说：“吴先生如果晚点去世，我们在学术上就会成长得更快。”

先人终究已逝，但吴斐丹那种在逆流中坚守与拼搏的精神定将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铭

参考文献：

① 吴中杰：《他走的不是时候——记吴斐丹先生》，载《读书文丛·海上学人漫记》，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177页。

② 尹伯成：《吴斐丹传略》，载熊诗平、徐边主编：《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76页。

③ 方治、陈典模整理：《吴斐丹简述》，晓亮主编：《中国经济科学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495页。

④ 《吴斐丹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三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218页。

⑤ 尹伯成：《治学唯勤奋，平凡不平凡》，载《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52页。

⑥ 尹伯成：《现代人口学倡导人之一——忆吴斐丹先生》，载《复旦名师剪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250页。

(本文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斐丹的人物专稿，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尹伯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撰写的吴斐丹回忆录，以及吴斐丹的自述整理，在此致谢。吴斐丹，1928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解放后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并担任过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主任、复旦经济系外国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主任和人口研究室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经济学会理事，上海人口学会会长，上海社会学会顾问，上海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顾问等职务，逝于1983年9月12日。)



叶世昌、陈文莲：携手七十载，共进新时代

文 / 本刊记者 唐一鑫

五月初，这处位于国福路小巷内的居民区宁静和静谧却又生机勃勃——橘子树结的新果青涩圆润，石榴花绽得鲜红，金银花的香气氤氲着香樟的清芳醉人心脾。

从小区门向右走到头，再爬上五楼就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叶世昌与夫人陈文莲的家。从青春懵懂到两鬓斑白，从封建家庭到现代都市，从动荡年代到安稳现世，他们已经携手走过了七十一个年头。

回忆过往，叶世昌与陈文莲相遇是在橘果般青涩的年纪，又共度了鲜艳如石榴花的盛年。从大风大浪的时光走出，现在二人的感情则如古木清芳般淡雅悠长。

在温暖惬意的午后，叶世昌与陈文莲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将他们初识、重聚、相伴的故事娓娓道来。

初识：懵懂少年正青春

“当时啊，当时看中了咯。”

回忆起与陈文莲初见的场景，叶世昌自然地望向坐在对面的妻子，初夏的阳光洒满书房，叶世昌满脸笑意。

经过七十一年风雨陪伴再回忆当初，任何语言都显得贫乏了，但两人默契眼神的碰撞，却道出些岁月酝酿的深情。

那是1947年初，当自新文化运动时期兴起的移风易俗之风刮遍江浙沿海时，台州市黄岩县城里的有些家庭，依然保留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风习。18岁的叶世昌刚从黄岩县立中学毕业，长辈们就把他的婚姻大事提上了日程。

经媒人打听，叶世昌的长辈们了解到县立初中陈老师家的小女儿与叶世昌同龄，两家都是知书达理家境较好的人家。不久，懵懂的他在家里母亲、大妹的陪伴下第一次来到陈家。

“我家祖母家教严格，我不讲话都是他们大人讲……我是一点也不懂的，我爸爸讲他都是好的，祖母也同意了。”陈文莲家属于封建家庭，读了两年初中后她就被留在了家里。偶尔瞥一眼面前这个浓眉大眼的圆脸少年，单纯稚气的陈文莲有些害羞，也不能说话。

第一次见面后，两家长辈都对彼此印象不错，没过几天，叶世昌陆续收到复旦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好消息同时传到了陈家。“到我家报喜的有两次，这是很少的也是很好的。”陈文莲眯着眼睛笑脸盈盈，那日陈家祝贺毛脚女婿升学宴会的热闹场景还历历在

目。

就这样，两个稚气未脱的少年走到一起，结为小夫妻。结婚第六天，复旦开学，叶世昌就告别妻子提着行李坐上了到上海的轮船。

刚进大学，好学的叶世昌充满期待，希望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可无奈当时的上海，依然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上海是反对国民党的阵地，复旦是进步的堡垒，当时（学生政治倾向）有两派，除了什么也不管只读书的，一派是国民党的特务，一派是进步青年，反对国民党专政。”早在中学时期，叶世昌就受到历史学家、进步教师管听石先生影响，这时的他自然成了进步青年的活跃分子，时常参加游行活动。

等到1947年放暑假，叶世昌才有机会回家。没有想到这次回家，他与陈文莲有了第一个女儿，也没有想到短聚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多年的离别。

叶世昌依然记得，那时的学生大都忧国忧民。在47年10月，浙江大学爱国青年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后，复旦的同学们气愤不已，以各种方法支持斗争。有一次，一行人以旅游的名义乘火车赶到杭州声援，把火车挤得满满的，他站了大半夜才到杭州。

在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之后，国民党更加疯狂地镇压学生运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虽颓势难逆却把魔爪伸向了复旦学子，1949年4月份的一个深夜，国民党兵闯入学生宿舍，对着名单抓学生，“查到叶世昌时，查的人说这个人的名字我看到过，肯定有的。但名单里却没有这名字，他就很犹豫，结果我没有被抓。”



• 图：记者与叶世昌 陈文莲

幸运之神庇护正义，要是被抓走，叶世昌的命运可能被改写。多年之后，谜团偶然被解开：“我的叔叔在台湾，改革开放后回上海探亲，有一次说‘名单我给你换掉的’。”

重聚：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谈起解放前后的经历，叶世昌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年没回家了，坐在一旁沉默倾听的陈文莲，此时肯定地答道：“他五年没有回家，五年没有回去。”

战争时期是因为时局动荡，毕业后则又因生活尚未安定，两人唯有遥寄锦书聊表深情，平均十天一封的频率，五年下来，书信已经积了满满一大箱。

毕业后，叶世昌留校成为新设立的银行专修科助教，一年后院系调整，复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叶世昌也随银行系进入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工作，直到那时他才分到了一间小小的独立公寓。

1953年2月2日，陈文莲清楚地记得这一天。

这天，陈文莲坐了一天一夜的轮船，一只手提着装有一沓书信和衣物的箱子，一只手指着五岁的女儿，在十六铺码头下了船。天刚蒙蒙亮空中还飘着小雨，陈文莲此前从没出过远门，刚到上海“有些害怕”，便在码头叫了辆黄包车径直驶向上海财经学院。

巧的是，刚进财经学院，陈文莲遇到叶世昌的同学、同事顾存伟来上班，看着眼前的小女孩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和叶世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顾存伟立刻猜到这是他的女儿，便让陈文莲等一等自己先抱小女孩进去，想看看叶世昌会是什么反应。

“有了住处之后我写信让她们来上海，但具体哪一天来不知道的。”叶世昌自己也没有想到，和女儿的初次见面颇有些戏剧性，那时他正在办公室备课，看到顾存伟突然走进来再看看他怀里的小女孩，虽然不见妻子却一眼就认出了女儿。血脉相通心意相连，尽管素未谋面，女儿一见到叶世昌，也亲热地抱住了他。“那当然是很高兴的！”想起第一次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为人父的喜悦，他的脸上乐开了花。

到了叶世昌在润德坊的小公寓，陈文莲却有些哭笑不得：“他去上学时我给他收的行李，一些衣服两条被子一条

毛毯还有枕头，这些是我的嫁妆给他。结果我一看他的被子不见了，剩下的毛毯都是洞很硬很硬，盖着一点也不暖和，我很惊讶，我家的还是像新的一样的。”原来，那个时候大家都自觉“共享”，叶世昌见有些同学家境贫困，就把被子给送了出去。

在黄岩老家时，叶陈两家都有帮佣，家务活很少自己动手，等到了上海，陈文莲不得不学习操持家务。“之前我祖母告诉我不管你出嫁前在家里是怎样，但结婚以后就要主动做事，孝敬长辈、尊敬丈夫、爱护弟妹照顾好家里人。”

但没想到，光做饭就成了她面临的第一桩难事。“当时要生炉子，我开始不会，被煤烟熏得眼泪止不住的流，没办法啊。”特殊环境往往会激发人的潜能，没多久陈文莲就成了操持家务的好手。

工作初期，叶世昌微薄的薪水却要拆成几份用——作为家里的老大52块的薪水有32块寄回家，余下的20块交给妻子维持一家三口的吃穿住行。陈文莲把这些钱精打细算，毫无怨言，“他家弟弟妹妹都很感谢我，上次团聚，他家妹妹都说‘嫂嫂最好了，村子里找不出第二个，没有哥哥嫂嫂，妈妈养不活我们的’。”



• 上图：1995年叶世昌与陈文莲在南汇桃花节
下图：1995年五月叶世昌与陈文莲

转折：学海寻道与解放自我

叶世昌与陈文莲的转变几乎是同一时段开始的，不过叶世昌是在学术上明确了研究方向，陈文莲则是改变某些旧观念将自己从家庭中解放出来。

在念私塾时，着长衫留长辫的先生喜欢摇头晃脑地给学生们讲些历史故事，叶世昌常常听得入迷，等到长大了他发现自己家里就有不少历史书籍。在那物资匮乏的年头，这些书籍成了他的宝贝吸引他神游其中，没想到这为他之后的学术之路早早埋下了伏笔。

大学毕业后，叶世昌留校继续学术研究，但并未在财经类的大方向中明确自己的专攻领域，直到1954年，茫茫学海中，一条吸引他为之付出几十年精力的道路渐渐清晰起来。

那一年，叶世昌大学时的老师彭信威先生（后来成为同事）的力作《中国货币史》出版，他读后眼前一亮，不禁感叹道：“我发现了一个学术上的新天地，想不到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和货币思想资料是如此丰富，同我的学术兴趣又是这样吻合。”史学本就是从小喜欢的，货币更和叶世昌的大学专业密切相关，兴趣与专业的结合成了令他心喜的“新大陆”。

巧的是，当时上海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恰好有一批古钱，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叶世昌抓住机会一边学习一边以《中国货币史》为依据为钱币配写说明，做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钱币陈列室，这成了他“中国货币史”研究之路上的良好开端。

到了1959年，叶世昌在书店偶然

看到了巫宝三先生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这让他再一次如获至宝，“这书同样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其中有许多货币思想资料。我发现当时的货币论战，从货币理论上属于货币本质论上的两个派别对立，即西方所说的货币金属主义和货币名目主义。”顺此思路他进一步深挖，从两派对立角度分析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货币思想，写成了《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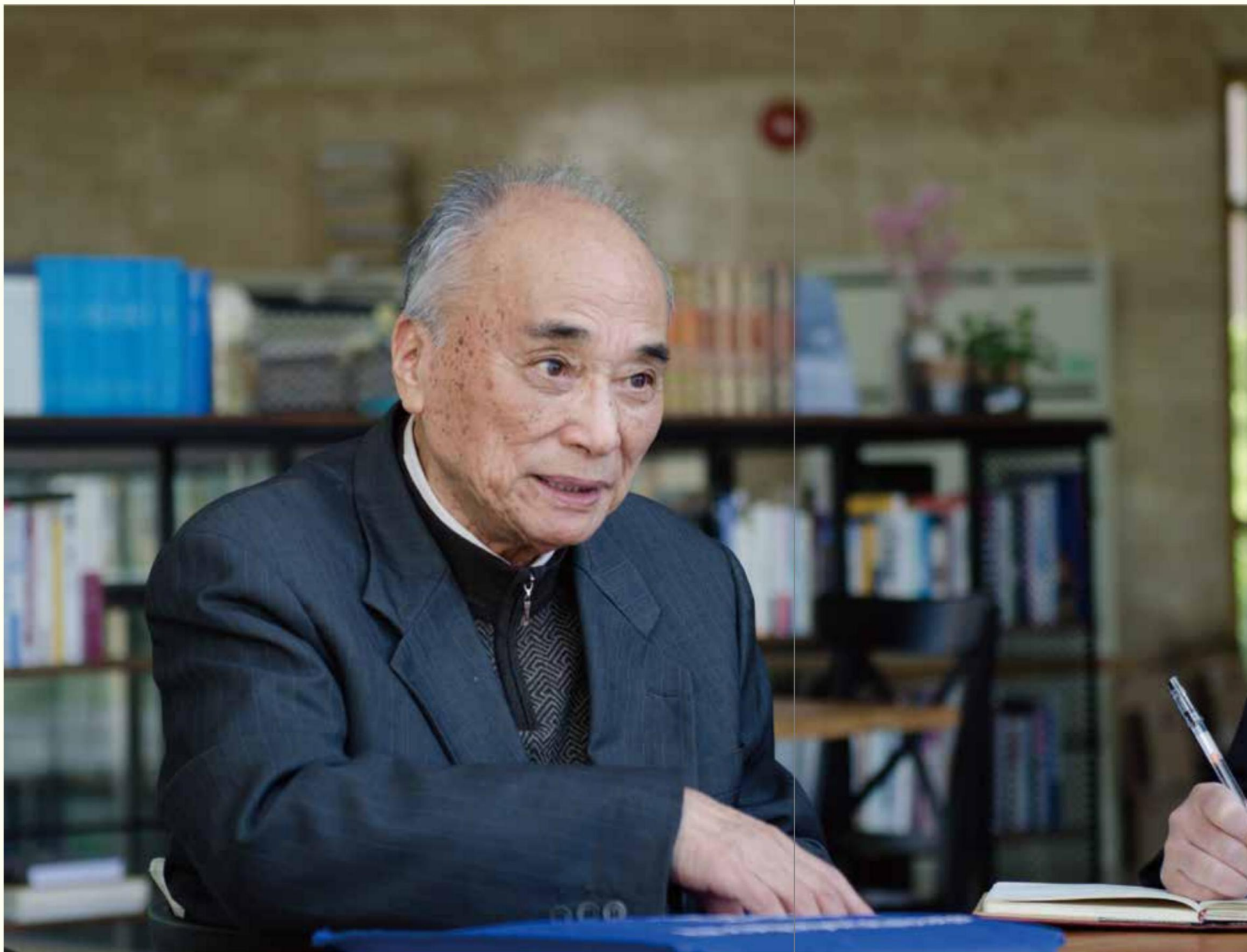
在自述中，他写道：“这不过是一本八万字的小册子，但是对于生平第一次出书的人来说，所受到的鼓舞自然可想而知。”

至此，茫茫学海之中叶世昌坚定了中国货币思想史和中国货币史研究齐头并进的路径，在这条路上默默奋斗至今。

陈文莲是老么，还有一个大姐两个哥哥，家里长辈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家里男孩可以念大学，而女孩只需要有一些文化基础就够了。与裹小脚的大姐相比，有初中文化的陈文莲算幸运了。

在上海前三年，她的大多数时间被家务劳动占据，为了解解闷，她也加入了上海财经学院家属委员会，义务帮助学校的老师们照看孩子。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在这三年之中，陈文莲不仅积累了更多照顾孩子的经验，她具有的爱心、细腻也渐渐表现出来，这位从旧时代走出来的女性所具有的闪光点得到了领导的重视。

1955年，正当叶世昌走向货币史研究之路时，陈文莲也引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踏出了迈进新时代的第一步。



那一年，毛泽东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那一年，女权运动家波伏娃受邀访问中国；那一年，陈文莲开始接受专业的儿童保健培训，为走出家庭独立工作做准备。

那时，陈文莲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为丈夫孩子做好早餐后便出家门到新乡路一号上海市儿童医院接受培训。她们所学的内容涵盖营养、疫苗等诸多方面，回想起那段时光，陈文莲忍不住感叹道：“辛苦，很辛苦啊……这也是组织的信任，所以再难也要努力学好，时代不一样了我很高兴也感到很光荣。”她的选择也得到了丈夫的支持鼓励，三年后，陈文莲进入上海社科院幼儿园工作，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耕耘：桃李芬芳，硕果满枝

1993 年的博士研究生，现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向民在博士论文后记中饱含深情地写道：“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尊敬的叶世昌教授，是他帮助我择定论题，使我有机会叩响这久已被冷落却又充满奥秘的智慧之门，并得以经过这里走向民族自身的经济学。”

2004 年毕业的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冯华也曾提道：“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叶世昌教授和师母陈文莲女士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给予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指导。”

育人数十载，叶世昌指导了 13 名硕士毕业生，36 名博士毕业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学生们眼

中的叶世昌是治学严谨、为人亲切及思想包容的。对叶世昌来说，其实这是精神的传承。

解放前，周伯棣教授常常主动关心学生运动，给予叶世昌们很大的精神支持，院系调整之后，叶世昌曾回忆道：“周老师虽是系主任，但毫无领导架子，拥有翩翩君子风度，淡泊名利，一心治学。”晚年时，周伯棣特意将自己收集的西汉、唐、明、清四朝会要赠予叶世昌，表达自己的关爱与期望。今天，这些书被整整齐齐地摆在叶世昌书房的壁柜中。

尽管在学术方面不能给予叶世昌和学生们帮助，但陈文莲在生活中尽全力支持丈夫的学术、教育事业，让学生们

感受到长者的温暖关怀。

正是因为有她在耕耘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才使叶世昌有最充足的精力深耕学术。每到毕业季，有些学生专门穿上硕士服或博士服，来到这处位于国福路的小区，再爬上五楼，和恩师、师母在摆满学术著作的柜子前合张影，与引路人一起为这一阶段的学术生涯划上句点。

而妻子所做的一切，叶世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被问到如何形容与陈文莲的缘分时，叶世昌只是起身，打开侧面书柜的玻璃门，拿出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学论集》，熟练地翻到第647页，颤颤巍巍地指给记者看，上面写着：“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陈文



• 图：1994年叶世昌与其博士生卢文莹

莲女士，她包揽了全部家务，使我能心不二用，有更多时间投身于学术活动。”

不仅桃李遍天下，叶世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货币史研究领域也收获了满枝硕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三人合著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上下册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近代货币理论史专著，填补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2003年出修订版）；2001年，他与学生潘连贵合作的《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勾勒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数千年货币金融制度史的变迁，他还在《中国金融通史》编委会的主持下，完成了第一卷“先秦至清鸦片战争时期”，于2002年出版。

从动荡年代一路走来，叶世昌更懂得安定和谐的环境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当1974年他回到母校复旦时，他感到“很亲切很热爱，能够回来也是对我的肯定”。那之后，他的大量著述面世，“很感谢复旦，使我有自由的学术环境，精神上也很自由没有压力，可以安安心心搞研究”。



• 图：叶世昌和欧阳卫民博士合影



• 图：2008 年 3 月 29 日叶世昌教授 80 华诞暨从教 58 年庆典

相伴：“他不会用钱”——“她用钱总是对的”

每天早上，陈文莲都会给叶世昌煮个鸡蛋和三个红枣，吃过早饭后，叶世昌常常待在书房钻研书本，陈文莲就看报纸杂志或整理房间。到了下午三点半，他们一起下楼散散步，从国定路走到四平路再回到国权路，偶尔碰到老朋友也会热情问候几句；晚上吃过饭后，两人看看电视，再聊聊天。

这就是他们一天的生活。

“人生难免有小波折，我祖母告诉我，年纪轻苦不算苦的，老了享福才是快乐”，满头银丝气色红润、已入耄耋之年的陈文莲向记者传授她的人生箴言。

在叶世昌眼中，他和妻子都是安静随和的，不仅在生活中不与外人争吵，

结婚 71 年来，夫妻二人也从未争吵过；而在陈文莲眼中，除了安静随和之外，丈夫还有些“傻”——“不给他吃他都不知道的……把他照顾好就是我的责任。”说罢，两人默契地大笑了起来，叶世昌说：“我现在都不会做家务，我的生活就靠她了。”

在生活上不拘小节，但对待学术上叶世昌却有着超乎常人的严谨与执着。他始终认为理论分析要建立在史料作深入发掘与严格考证基础上，相信“掌握史料越充分，越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得出正确的结论”。为此，叶世昌在很早就有搜集史料的习惯，在早期他只能一笔一划将图书馆里的资料誊写下来，后来技术进步，他就把资料拍个照、印出来、装订成册，几十年下来，两种史料本积存不少，成了他最珍贵的宝贝。

即使年届九十，叶世昌依然笔耕不



• 图：叶世昌整理的史料

辍，常常去图书馆里采史料、在书房里钻研学问，而陈文莲就是他最坚实的依靠。

当被问到多年婚姻幸福的“秘籍”时，叶世昌不假思索地答道：“不干预”。“我写写书，家里的事情我不管，我也很相信她，我就主要专心学术……我们就这样子不吵架，当然有时候负担太重了，家里事情很多，她难免发发牢骚，有时候话讲得稍微偏执点就停止了。”

在学术领域，叶世昌是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而在家里，“财政大权”属于陈文莲。“我把钱都给她，我的钱我不大用，这样是互补的……男的不做家务很不好，但我们已经习惯了，她用钱总是对的。”

听了这话，坐在一旁的陈文莲哈哈笑道：“他用不来的，他不会用钱。我

就把家务管好让他安心搞科研，为国家做贡献！”**结**

（本刊记者采访了叶世昌、陈文莲夫妇，在此谨致谢意。叶世昌，1951 年复旦大学银行系毕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参与成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上海市钱币学会、上海市经济史学会等学术团体，并曾担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钱币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与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厦门市钱币学会顾问等社会职务。）



蒋学模：从翻译家到经济学家的华丽转身

文 / 蒋维新

今年是我父亲蒋学模诞辰 100 周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纪念活动中，不少人都谈到同一个话题，蒋学模是如何成为跨越翻译界和经济理论界的权威人物的。我根据最新搜集的资料作出的以下叙述，或许能使世人对蒋学模成为翻译家和经济学家的背景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对现在正在励志奋斗的青年或许能给以某种有益的启迪。

29岁译成《基度山恩仇记》青史留名

蒋学模最初是一名翻译工作者。他从 1941 年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直到解放前夕，从事的都是翻译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任香港《财政评论》编译。但工作仅几个月后，因香港被日军占领，《财政评论》社内迁，这份工作就丢了。但这时蒋学模已经开始在翻译界崭露头角，1941 年他的译作《粮食——保卫察里津》和《希特勒征服欧洲》出版。香港被日军占领后，蒋学模的哥哥蒋学楷被日军枪杀，失去依靠的他被迫离开，几经颠沛流离，于 1945 年来到重庆。经川大金孔章老师介绍，进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当编译。因受不了该委员会那种闲散无聊的工作氛围，他于 1945 年 10 月接受了复旦大学《文摘》社的邀请，担任《文摘》社编辑。

《文摘》杂志 1936 年创刊于上海，抗战期间内迁至重庆。受出版条件限制，1945 年的《文摘》为每期 16 开 32 页篇幅的半月刊，主要摘译由美国新闻处供

稿的政论性文章和报道二战动态。《文摘》社有社长章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主编张志让及贾开基等 6 位编委，但编委们一般不承担具体工作，蒋学模承担了部分选稿和几乎全部的翻译工作。蒋学模工作非常勤奋且效率极高，从 1945 年 10 月到 1949 年，除完成每月两期《文摘》约 10 万字的翻译任务外，他还翻译了文学古典名著、长篇小说等。这些作品，按照出版顺序排列依次为：《人与地》、《基度山恩仇记》、《苏联行》、《俄罗斯最后到来的巨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保险》和《捷克的工业国有化》。

使蒋学模一举成名的《基度山恩仇记》的翻译工作是他于 1946-1947 年完成的，但大仲马的这一文学巨著已使他魂牵梦绕了多年。早在 1936 年他在东吴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观看过好莱坞影片《基度山恩仇记》，对故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9 年他在四川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英译本《基度山伯爵》，以读《红楼梦》的热情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废寝忘食地一口气读完了它。以后，有空时常常抽几章阅读，反复回味，不



• 图：蒋学模翻译版本的《基度山恩仇记》

知不觉中把全书又看了一遍。当时就萌发了将其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念头，只是受制于生活环境和出版的条件而没有动手。

1945 年 10 月受聘《文摘》社后，蒋学模有了安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当时重庆出版界正处于极度的不景气中，大家忙着做东归的打算，《文摘》的编务工作也比较清闲。在常务编委贾开基先生的鼓励下，蒋学模开始着手翻译《基度山恩仇记》。在等待从重庆返回上海交通工具的整整一年中，他基本上完成了《基度山恩仇记》的翻译。1946 年 7 月返回上海后，他又用了大半年译完全书。《基度山恩仇记》于 1946 年 11 月起由文摘出版社在上海陆续分册出版，1947 年 7 月再版，1948 年 3 月三版，1948 年 10 月四版，1949 年 3 月五版。从出版的高频率可以看出，该书深受市场欢迎。在“拨乱反正”之后，该书于

1978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书名改为《基度山伯爵》，新书上架时洛阳纸贵，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迄今为止，各种平装本、精装本的总印数已超 100 万。

《基度山恩仇记》的中译本，除了蒋学模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外，其他都是根据法文原版翻译的。对于各种译本的评价，各人自有偏爱，无可厚非，但市场关注度最高的仍是蒋学模的译本。究其原因，一是蒋学模是《基度山恩仇记》中译本的第一人，而且在长达 30 年的时间里在大陆只存在这唯一的版本，读者不可避免地会先入为主。二是蒋学模文风朴实，行文流畅，很容易抓住读者，这是他深厚文学功底的体现。蒋学模版本最受市场关注的例证之一，就是台湾光复书局 1998 年编辑出版的《珍本世界名著》第 31 卷《基度山伯爵》选用的就是蒋学模的版本。

在《基度山恩仇记》的翻译过程中，蒋学模对翻译工作本身产生一些想法。他在1947年9月呈复旦校方的工作汇报中曾提到撰写《翻译之理论与实际》的设想，可惜这一设想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完成《基度山恩仇记》翻译时蒋学模才29岁，这充分展现了其翻译天才。但就其整个人生来说，《基度山恩仇记》只是蒋学模璀璨人生的一面，其后是更为出彩的政治经济学大师生涯。

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师

1949年《文摘》因种种原因停刊，“蒋学模因此中断了翻译生涯，转向复旦经济系任教。蒋学模先开设了两门新课《苏联经济建设》和《东南欧经济》，不久就转教政治经济学。而就在1949-1950年蒋学模由翻译转向教学的初期，他撰写的《末期的资本主义》、《美国经济危机》等5本专著已经出版。

1950年为培养有马列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新中国建设人才，党中央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抽调各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到人大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复旦大学当时选派了5位教师，其中去学政治经济学的是蒋学模和苏绍智。在人大的两年学习期间，蒋学模第一次系统地研读了马恩列斯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特别是深入研读了《资本论》三卷，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苏联专家讲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引起了蒋学模的强烈关注，使他初步有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理论框架。

蒋学模一边学习，一边笔耕，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51年8月，开明书局出版了蒋学模普及型理论读物《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故事》，向青少年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该书此后更名为《人类社会发史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多次出版。1952年，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由开明书局出版，该书1955年的修订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2年，蒋学模回到复旦大学后与其同事们一起编写了供大学本科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讲义》。由于《政治经济学讲话》和《政治经济学讲义》是国内第一次撰写包括有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读物，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印行了近100万册，《政治经济学讲义》被华东地区很多高校采用。据说，当时毛泽东主席也看到了《政治经济学讲话》，并给予称赞。由于《政治经济学讲话》广泛的社会影响，1955年蒋学模受邀上京和王惠德、陈道一起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常识》，由学习杂志社出版，以配合当时全国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高潮，该书一年之内印行了280万册。

至此，蒋学模从翻译工作者转向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尽管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然而，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批开拓者和传播者。

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蒋学模政治经济学著作出版的第一个高峰期。除了以上几本书外，蒋学模撰写的学术专著还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的分配》等10部。



● 图：1964年7月17日，毛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代表，蒋学模位列前排

其中，与姚耐、雍文远、苏绍智合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成为众多院校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材的首选，发行量达20万册。

蒋学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突出成就，使其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58年毛主席在上海接见教育、卫生、艺术界人士，谈家桢、蒋学模、孙怀仁、章靳以等六位教授受到接见。蒋学模时年40岁，副教授，与谈家桢等资深教授一起与毛主席面对面进行了交谈。1964年7月17日，毛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代表，蒋学模位列前排。

“文化大革命”使蒋学模的学术生涯中断了十余年，他重新出现在大学讲

台上时已年近花甲。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蒋学模解除了思想禁锢，突破了原先的理论禁区，质疑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提出社会主义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等一些创新观点，引发了经济学界对传统理论的反思。改革开放30年间，蒋学模不仅通过自身的理论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发展，而且通过对学生的悉心指导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传承给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经济学新人。他的“不能守旧，不怕守旧”、“做一个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等名言，至今仍被他的弟子们津津乐道，成为激励他们在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中砥砺前进的强大动力。



• 图：蒋学模编撰的教材

蒋学模对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这本教材是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供大学非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生使用的教材。蒋学模对该教材倾注了全部心血。由于教材是多名教师分头撰写的，为了保持全书逻辑体系、理论观点、文字表述风格的一致性，时年62岁的蒋学模开起了“早车”，每天清晨4点起床进行统稿，一直工作到中午12点。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该教材第一版于1980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由于该书理论阐述深入浅出，被解放军总政治部选为干部基本学习教材，尔后又被中央组织部推荐为干部自学理论读物，因此，该书的使用范围远远超出原先用于普通高校的设想，绝大多数的中专、电大、函授学校也都选用了这本教材。此后，蒋学模根据理论和实践的变化，每两年修订一次，至其逝世的2008年，已修订到第13版。因此，这本教材里凝结了蒋学模28年的心血。该教材总印数高达1805万册，

甚至在蒋学模逝世10年后的今天，这本教材仍在继续印行。可以说，这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影响了数代人。蒋学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所作的贡献，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骨子里流淌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血液

人的一生，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并不容易。蒋学模在翻译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领域都取得不凡的成就，真是十分罕见。

蒋学模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三个重要因素。一是他非常勤奋。从1941年大学毕业到1949年《文摘》停刊，剔除因香港沦陷举家逃难的3年，蒋学模从事翻译工作不超过5年。在这5年中，除了完成编译的本职工作外，完成的译作总计9部约230万字，平均每年46万字。

从1950年到2008年，剔除10年动乱，蒋学模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约50年，发表的文章和专著共计907万字，平均每年约18万字。二是他文字功底扎实，文风朴实。翻译和教学都是一种再创造，要消化吸收原著的精华，然后将自己的理解娓娓道来。《基度山恩仇记》是这样，《政治经济学教材》更是这样，将深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用大众化的语言进行传播，才赢得了数以千万计的读者。三是抓住了机遇。《基度山恩仇记》是在抗战胜利后等待回迁上海的一年中完成的，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么，翻译《基度山恩仇记》这么一部巨著可能就不会付诸实施。而1950-1952年的人大进修，则是蒋学模华丽转身的重要基础。原定的进修时间为一年，第二年的进修是蒋学模经过再三申请才得到的。

蒋学模对《基度山恩仇记》和《政治经济学教材》都十分钟爱，他自称这两本书代表了他的一生。从其整个人生来看，从事翻译工作的最初动机是谋生，而《基度山恩仇记》的翻译是一种由欣赏度的不断上升而引发的偶发事件。尽管这种偶一为之使他一炮走红，但他并没有继续他的翻译家之路，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走上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作为毕生的选择，不是偶然的，这同我所处的时代条件有关”。

蒋学模生于1918年，6岁时随父亲来到上海。尽管父亲的银行职员身份基本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小康生活，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处处都充斥着令人摆脱不了的民族屈辱感，加上对于

失业的担忧，使蒋学模从小就在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个人的出路在哪里？哥哥蒋学楷书架上的《社会学ABC》使正在读中学的蒋学模惊奇地发现，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此后，波格丹诺夫关于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阐述使他进一步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最后会发展到没有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读大学他选择的是经济学专业。那时，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但他自己有兴趣钻研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将30年代的蒋学模引入了政治经济学的门槛。以后，在四川大学时找到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使蒋学模更加向往社会主义了。大学毕业后谋生的不易、香港沦陷后数年的颠沛流离以及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动荡，这些都促使蒋学模在新中国建立后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为之奋斗终生。

《基度山恩仇记》的结尾写道：“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青年蒋学模的理想，他在“等待”和“希望”中遇见了《基度山恩仇记》，不知不觉成了翻译家，他终于等来了新中国的建立，见证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茁壮成长，并希望它走向更为灿烂的明天！



徐康宁：也无风雨也无晴

文 / 本刊记者 何敏君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抱怨有任何改变，它只会由于你的努力、你的作为而有所变化。”

在东大图书馆的咖啡厅里，徐康宁分享着自己的62年的人生感悟。曾经的努力和坚持、眼中的山水和理想、肩上的重担和责任使得他一直未曾停下自己的脚步，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他作为一名学者的视野和高度。

冥冥之中，圆梦复旦

对于徐康宁来说，和复旦结缘似乎是冥冥之中早有的安排，虽然未能在最好的年纪邂逅复旦，但是和复旦的缘分却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的。

他是从一部小说中对复旦大学开始有印记的。“文革”后期，徐康宁还是一个中学生，少年的他，喜好读书，涉猎广泛，其中读后难忘的一本小说便是《基督山伯爵》。这本小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翻译这本小说的便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蒋学模。一个经济学院的教授对文学和语言有如此造诣，令少年时期的徐康宁为之赞叹，也对复旦这片土地产生了向往之情。

1978年恢复高考，徐康宁考入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的前身），所读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师资班。由于当时理工科大学办文科专业缺乏足够的师资，不少专业课程都是聘请外校的老师来上。徐康宁清楚记得，大三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西方经济学》，是到江苏省委党校和那里的学生一道上课的，开课老师

便是来自复旦大学的尹伯成。尹伯成老师的这门课为徐康宁打开了西方经济学的大门，从此他的学习和研究开始与西方的学说或国际经济有所交集。命运的轨迹似乎早已写好，当时的徐康宁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尹伯成老师的一名博士生。

早在1986年，徐康宁就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博士生，但由于旧的人事关系制度羁绊，原有的单位不放行，他最终没能到北京去念成博士。之后十几年，徐康宁主要忙于工作，为自己所在学校从无到有地办起了经济学本科专业和硕士点，但并没有忘却自己的博士梦。千禧之年，徐康宁终于圆梦复旦，成为尹伯成教授的博士生。此时，徐康宁已经44岁，是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和教授，带了好几年的研究生。按徐康宁自己的话说，当时读博士完全没有功利上的考虑，因为职称上已是教授，不出两年也会当上博士生导师，但为了更全面、更系统地学术上提高自己，便选择到复旦大学的优势学科“经济学专业”念博士，



图：徐康宁在东南大学图书馆前

希望自身的学术水平能再上一个台阶。

作为一个“教授学生”，徐康宁在班级中显得比较特别。“当时班上不少同学在年龄上都和我自己带的研究生差不多。即使如此，我也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和别人在地位上有什么不同”。年纪差距虽大，但却不妨碍彼此间的友谊和成长。徐康宁回忆那时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一起做习题、一同考试的时光，脸上满是温情和怀念。

三年的学习给徐康宁带来了许多收获，让他的专业知识和学科理论更为系统、全面、扎实。他回忆起在复旦的时光，印象尤为深刻的便是复旦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良好学风。当时的复旦有在学术上造诣高深的一辈教授，也有在相关学科颇有建树的中青年教授。老一辈

们一代一代，把这优良的学风传给年轻的一代，中青年教授们则用先进的思想和敏捷的思维为这学风注入新的活力。在这样兼修中外、独立自由的学风的感染下，徐康宁深受触动，学术思维得到极大涵养与提升，“我觉得自己眼界更高，视野也更加开阔了”。

不仅仅是教学模式和自由的学风，老师们的人格魅力和良苦用心对他影响也颇为深刻。复旦读博期间，作为正教授的徐康宁其实在某些学术问题已经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对于这些见解，“他们都能够平等的对待，没有简单以先生之尊排斥学生的观点”。老师们的肯定和包容让徐康宁很是感动。“我记得当时经常在尹老师的家里讨论学术问题，尹老师谈起学术问题时严肃认真。但在

学术问题之余，又非常开朗健谈，跟学生打成一片。”当时尹伯成老师先是称呼他为“徐康宁同志”，到后来称他为“康宁”，几乎从未直呼其名，导师的这一特别称呼让这个“教授学生”备受感动。他知道导师的独特用心，自己年龄偏大，已经在学术的道路上走了20年，并有一定的学术积累，这样称呼是给自己以更多的信心和鼓励。所以他也特别把心思用在学业和学术研究上，以学业成绩回报导师。复旦读博士期间，徐康宁就在许多学者都非常向往的一份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学术论文。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徐康宁的主要研究领域与世界经济有关，以及在世界经济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为了更好地了解国际上的经济发展动向，直接阅读英文第一手资料是必须要下的功夫。读英文专业文献或学术论文相对容易些，因为背景聚焦、词汇相对简单，但为了解更多情况则必须广泛阅读更多的英文报刊杂志。徐康宁的中学阶段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英语没有系统地学过，大学和研究生期间也着重是学语法，阅读面也不广。

“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对我加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能力有很大的提高，除了复旦大学对博士生的英语学习抓得比较紧外，更重要的是，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有更多机会了解外部世界，阅读面大大拓宽，认识能力大大提高了。”徐康宁这样说道，并回忆起在复旦大学

学博士英语以及英语教师教学严厉的情景。

为了充分了解外部的世界，及时掌握一手的资讯，徐康宁每天都会读相当数量的英文材料。除了专业资料外，每天读英文报纸成了规定动作，其中有三份是他的必读之物——《China Daily》、《The Wall Street Journal》、《Toronto star》。其中，《The Wall Street Journal》是用手机APP阅读，《Toronto star》是用Kindle阅读，而且经常用Kindle读《The Washington Post》。作为一个经常在报纸上写评论的学者，他坦言道，“虽然现在自媒体很发达，但是有一些深度的报道、一些重要的新闻、一些重点的评论，还是在纸媒上。”因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环球时报》这四份报纸是他每天必看的。日积月累，不仅打开了一扇更好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而且也扩大了英语的词汇量。他坦言，真正做到像英美知识分子那样轻松阅读英文报刊，至少要掌握2万多的英语词汇，中国人极少能达到这种水准，自己也未达到，但坚持每天读英文报纸还是很有收获。“阅读会给你带来一种愉悦感，如果能用多一种语言阅读，愉悦感就是双份的。”这是他的读报感受。他很佩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现任院长张军教授能够经常在国际英文主流媒体上发表经济评论文章，因为某种程度上在国际主流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比发表国际期刊学术论文更加要求作者的国际化水准。作为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张军教授无疑是最具有国际化能力的，这是他对张军院长的评价。

正是因为及时掌握大量第一手的国际资讯，熟悉世界经济发展动向，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公室在向全国部分学者征求当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指南建议时，徐康宁提供了“世界经济重大结构性矛盾及其影响研究”的课题建议，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列为课题指南，又经过参与投标竞争，他作为首席专家，拿到了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志趣：皓首穷经，无限风光

复旦读博期间，校内各种高端学术讲座给徐康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身也非常推崇举办各类的学术讲座，在他看来，这些学术讲座为各类学子接触各种学科提供了机会。高质量的学术讲座、高端的学术报告对于学生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学术资源，“任何一个读书人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各个学科里面有造诣的一些学者，这对一个学生、或者一个读书人思想的提炼、知识的丰富和眼界的拓宽都是非常有益的。”

谈及在复旦的课余生活，徐康宁表示自己非常热衷于逛书店。在他看来，“读书人一辈子可能主要就是读书”。复旦学校门口就有好几个书店，这些书店基本上承包了他的所有的课余时间。

“一个人，除了需要看一些和他的专业、功利有关的书籍之外，还需要看一些其他的书。”年轻的时候，徐康宁就非常喜欢读书，后来渐渐走上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的道路以后，发现很多问题不仅仅是靠专业性的工作就能够达到

理想境界，“尤其是一些涉及到人和制度的问题，往往超越物质和制度，跟文化、跟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以学土木工程的人为例，学土木工程的人一定要学好结构工程、测量学，但是光是读这些书，不一定能够造出最美、最有价值的房子。因为“最美”、“最有价值”包含了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意义，这些是专业书籍所不能回答的。“如果一个人有比较好的文学修养、善于思想，他就有可能在专业建树之外有一个更为理想的图景，能勾勒出更美好的东西。这样的人对于美好世界的建设，对于丰富自我、充实自我都更加有利”。

专业之外，徐康宁喜欢看一些文史类的书籍。他坦言自己最喜欢的两个作家就是马克思和鲁迅，尤其是他们身上所共有的现实批判主义精神。“他们始终带着冷静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分析世界，包括必要的时候批判世界。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仍然需要这种精神”。“马克思思想深邃，语言非常具有哲理和感染力，给读者留下的印记极其深刻。而鲁迅作品的风格就在于他的战斗性、辛辣性和讽刺性。”徐康宁不久前去北京专门看了鲁迅的博物馆，还到鲁迅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去瞻仰。

“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叙述一段特定的历史”。因此，他还非常喜欢逛博物馆。无论到国内还是到国外的一些城市，徐康宁最喜欢去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博物馆。在他看来，博物馆里的展品展示了人类历史的变迁，反映了文明的积累，而对于生活在文明社会的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文明的历程，逛博物馆就是最好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他已经



• 图：徐康宁在德国的马恩雕像前

去过大英博物馆三次，法国卢浮宫两次，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去过几次已经有点记不清了，他说应该在五次以上。看徐康宁的博客，可以发现他的第一篇博客就是写大英博物馆。

传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复旦读博士期间，已经是硕士生导师的徐康宁，对本科生和硕士生人才培养都有了自己的一套心得，复旦三年则使他对人才培养的规律理解更加深刻，在摸索中，他逐渐找到了建设高水平专业的门路。他认为，人才培养首先需要拓宽学生的眼界，特别是在本科阶段，“本科打好基

础才能够在将来有更大的可塑性”。而对于硕士研究生阶段，“尽量把其作为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对于那些有学术研究造诣和潜能的，应该尽快让他们去从事高深的学术研究，而大部分的硕士研究生可以尽快地用一两年的时间掌握一两门技能，去适应这个社会对专业性人才培养的需要”。对照现实，徐康宁觉得硕士研究生三年的时间太长，所以他现在特别强调硕博连读，更加强调本科生直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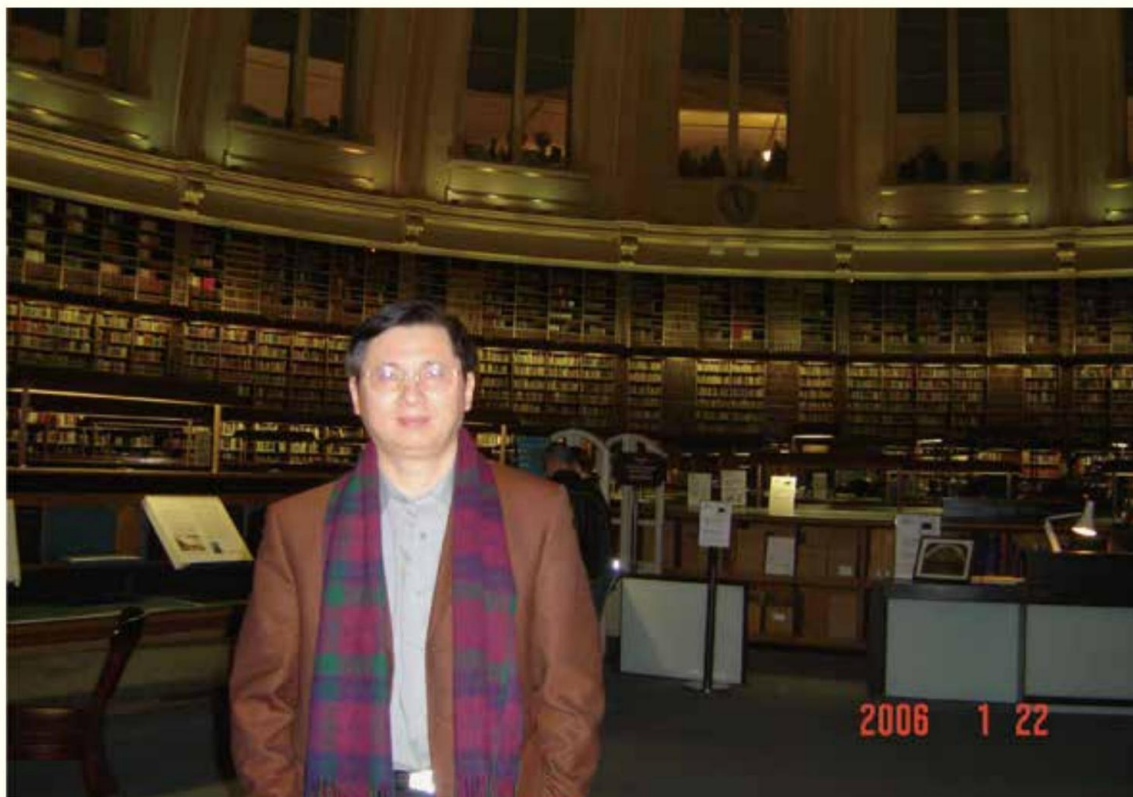
2003年，徐康宁博士毕业之后回到东南大学继续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在一个以理工科见长的高校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在工科如此强势的环境下，徐康宁从不轻言放弃。作为八年的副院长、十五年的院长，用二十三年的时间，历经东南大学经济学本科、硕士、博士等阶段的学科建设，后来还建成了博士后流动站，他不仅是亲历者，更是主要建设者。徐康宁未曾多言这中间的艰辛，但是欣慰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虽然现在的徐康宁已经不再担任院长，但仍然是所在学校经济学的学科带头人。在他的带领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东南大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在2017年全国学科评估中取得全国前列、江苏第一（并列）的好成绩。一个只有二十几年历史的专业取得这样的成绩，这跨越时空的进步让他更加坚定自己的道路，更加自信和淡定面对各种挑战。

学科建设之外，徐康宁也不曾停下学术研究的步伐。出版了《文明与繁荣》等学术著作六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100多

篇论文，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理论评论文章，也获得了许多荣誉，全国性的“宝钢优秀教师奖”就获得了两次，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和江苏省政府参事。他的个人的研究成果曾两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此外，他还是全国性一级学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副会长，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经常被政府部门和企业邀请，也是省委书记和省长经常面对面咨询的“座上客”。“这些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一个内心很充实的人，而所有这些都与复旦三年的深厚积淀是分不开的。”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他渐渐体悟到了成为一名学术工作者所必需的特质。“立志于做学术工作的人首先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做好多年坐冷板凳的准备，有时候冷板凳时间坐得越长，将来的学术成果就越好。”对于当下中国的年轻学生往往不太敢也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见解的情况，徐康宁坦言，缺乏表达的勇气和正确表达的能力是不利于学术研究工作的。他告诫有志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学者和学生，一定要狠狠地打好两个基本功——外语基本功和文字基本功，外语可以打开一扇新的窗户，文字和书写则是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必备工具。



• 图：12年前徐康宁在大英博物馆留下马克思脚印的图书室

精神贵族，生活草根

“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生活中，物质上可以马虎一点，但是精神上一定要丰富一点。”这是徐康宁对读书人的定位，也是对自己这个读书人的定位。

谈及纪念陆谷孙教授的那篇博客，他坦言自己与陆谷孙教授并不熟识。除了那本由陆谷孙教授编写的“大部头字典”便实在没什么交集了。陆谷孙教授曾说：“我觉得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精神上要做贵族，生活上可以草根

一点。”陆谷孙先生宁做闲云野鹤但精神丰富的读书人，也不做锦衣玉食的诺诺者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徐康宁。徐康宁认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复杂的世界和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当有像苏东坡和刘禹锡乐观的人生态度。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词，其中那句“也无风雨也无晴”成了他一篇博客文章的标题。

在采访中徐康宁还特别提到，一个人发表多少篇有学术影响的文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写出“道德文章”，



• 图：采访结束后徐康宁与记者的合影

学者应该通过自己的笔为社会的进步与公平正义作出应有贡献。他认为自己的导师尹伯成教授就是书写道德文章的模范。尹老师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凭老师的资历和复旦的牌子，自然在房地产界很有话语权，但即使在房地产市场很火爆的时候，老师发表的房地产方面的有关文章，也是呼吁房价不能脱离民众的购买力，要严防房地产市场泡沫和开发商暴利行为，这就是道德文章。”言语中，他对自己的导师充满了敬意。

在采访末，他寄语莘莘学子：“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年轻人，不应该只是抱怨，世界不会因为你的抱怨有任何改变，它只会由于你的努力、你的作为而有所变化”。**络**

（本文系记者对徐康宁校友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徐康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3届博士。现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政府参事、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邵宇：潜心修行，躬行实践

文 / 本刊记者 李博

“自 09 年离开学校，差不多到证券行业工作十年了，我觉得这十年对成长的帮助未必低于在复旦学习加工作的时间。我在复旦十三年都是在学理论、框架的东西，前人教我的东西，后十年行业中学的可能是更为新颖比较实际的东西。”

“我觉得这两者是相互融合的过程，真实世界的实践有助于学校纯理论的东西提炼、提升，至少可以把局部真理根基到现实当中。”

见到邵宇的时候，他正在赶着回一个采访电话，而前几分钟，他刚刚结束一场投资策略会，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状态，一年公开发表文章 100 多篇，接受采访 300 多次，演讲 200 多场……

1996 年跨专业考入复旦经济学院，2002 年复旦金融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009 年底离开复旦讲台步入金融市场，如今已经是东方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

修行：文学到经济

邵宇 1973 年出生在湖南省株洲市田心，“当时那是一个大型的工业基地，整个镇区就围绕着一个大型的企业（中车集团），居住了大量的员工和家属。”这个镇构成了一个小型的社会，氛围和周边地方完全不同，“更像一个独立的王国”，从幼儿园到高中，邵宇正是在这个独立王国成长起来的。

出生在一个企业 + 移民氛围浓厚的地方，让他更早的接触到技术创新和开放的思想，也是他后来跨专业考经济学研究生想法的萌芽。

1992 年考入湖南科技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他，并没有按照专业的方向发展，而是选择报考复旦经济学的研究生。当时，中国正处于“小平南巡”后的第二次改革开放的高潮时期，全国掀

起了一股经商的热潮，“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做生意，怎么搞经济发展”，“就和几年前上海自贸区成立一样，每个人都觉得有很多掘金的机会”，在这样时代潮流的驱动下，大三的他有了“去接触一下关于商业关于经济方面内容”的想法和一些实践。

为了弥补专业差距，大学最后一年，他一头栽进了经济学的书海中。数学、统计、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些原本和一个中文系学生无缘的课程，突然变成了他必须精通的东西。没有补习班，也没有辅导老师，完全靠看书自学。他自我调侃的说道，自己大四一年“有种不务正业的感觉”。大学最后一年精力都花在了经济学，而恰巧大量阅读让他找到另一片兴趣的海洋，一片将来可能要花费毕生精力航行的海洋。

凿不休则沟深，斧不止则薪多。一

年自学积淀，邵宇如愿以偿地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当问到跨专业考研的困难时他抬了一抬鼻梁上下沉的眼镜，“把该补的课程补上了，一次性就考过了”。

沉淀：入门到精通

回想起复旦硕士到博士六年的求学生涯，邵宇脑海中最先出现的就是两个词汇：“外文书库”和“网球”。那也就是他曾经挥洒汗水最多的两个地方。

1996年北区还在筹建中，所有研究生都住在南区，邵宇就在南区整整生活了六年。他现在还能经常回忆起这样的下午：金色余晖撒在南区网球场，地上是球网稀疏疏的投影，他与好朋友在球场上挥舞着球拍，汗水打湿了T恤。“当时体能很好，顶着烈日，从下午一点打到傍晚六点不怎么休息也不会累”。基本上每天挥汗如雨，课外活动多是打球中度过的。“现在打二十分钟就累得不行了，最近想重拾这项运动，但还需要点毅力”，他略带惋惜地笑说道。

他称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成绩总体较烂”，“每次都是刚刚及格，所以绩点也不高”，这诙谐自谦的另一面却是一个喜欢在图书馆的修行背影。邵宇把泡在图书馆里的那段时光比作一场“修行”。

“现在脑袋里还就是那两排桌子，管理员坐在门口，天天那几个学子，在痴迷的阅读”，当时的文科图书馆，一楼是外文书库，只允许研究生进入。他学习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自学和阅读

原典文献。当时中国经济学理论还处于一个相对早期的发展阶段，国内先进的相关课程和资料还是较少。再加上当时研究生并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就业压力，不需要急着把课程修完空出时间实习，所以课程分布更加稀疏和均匀。这相对宽松的学习时间恰恰切合他喜欢的自学的习惯，他没有把太多时间用于课堂之上，而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图书馆。

“除了打球锻炼和上课时间，很多时候都是从早到晚都坐在那里，每一任图书馆管理员我都很熟悉”，大量的英文原始文献阅读为他的经济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至于他研究生期间就写出了一本书——《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书的最后是长达数十页的外文参考文献，这种基于原典的参考书在那个资料匮乏的年代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豆瓣网友评论，“像是阅读原始文献的读书笔记”，他自己也如是告诉记者。

“找到一手文献就像找到一颗种子一样”，研究生期间他研究的方向是政治经济学，偏向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额外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这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拿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做例子，“它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或者观点在现在世界的一些演绎”。

在他看来，经典的东西不会过时，有时候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可能有更加西方化或者先进的方法，但它谈的逻辑和事实本身依旧有启发”。

谈到印象最深的老师，邵宇脱口而出的是他的博士生导师陈观烈先生，特别是陈老师的讲座，他至今难忘有一次



讲座上陈老师提出的一个充满预见性的概念，“货币霸权”，提到了美元的霸权和其对全球的影响力。这在 2000 年还是一个相当新鲜的事物，那时大家对此还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概念，“很遗憾没有把老师的系列思想整理出一个完整的结果来”。

深造：学生到老师

2002 年博士毕业，邵宇选择了留在了复旦，继续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将自己在学校吸收的能量重新慢慢辐射给后辈复旦人，一直到 09 年离开复旦讲台。这七载光阴，他担任过辅导员，当过老师，在牛津大学深造过，在政府挂职锻炼过，每个阶段都是收获满满，每次经历都在他后来的工作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在校期间，他教过金融工程、投资学、金融市场学等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而担任辅导员期间，他在复旦带过的学生后来很多跟随他来到了证券公司，成为他所在团队的一员。“因为观点相似，认同你的框架，所以他们愿意跟随你”。在他曾经带过的十多个研究助理中，好几个在复旦便已经交识，很多都成长为了首席经济学家、首席分析师和策略师，出色的已经在某些领域颇有知名度了。

“在复旦的七年，实际上有一年是在海外度过，一年在政府度过的。”

2006 年，邵宇进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进修，在这期间，他听了大量关于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地缘政治方面的课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是

一个开阔眼界的绝佳机会，“对研究框架形成和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说，海外进修让他能在理论上的经济研究站地更稳更高点，那么，在政府挂职的一年则让他在实践上了解经济的真正运行逻辑。邵宇在上海市宝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岗位挂职锻炼了一年。

“要理解中国经济和其他地方的不同，就要理解其中政府发挥了什么关键作用”，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在这里工作，“你能理解从中央到地方整个体系和体制是怎样运作的，它的逻辑是什么，它的优点和缺点各是什么，这样对你的经济研究大有帮助。”

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对经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有独特的认识。一般认为，经济学家可以分成两种，“当过官的和没当过官的”，没当过官的经济学家的设想更加天马行空，他喜欢在假想的前提下，提出他任何认为对的东西。但是做过实践才能明白现实中有很多约束条件，有时候需要在这些约束条件中选择最终具有操作性的东西，而非在理论上提出一些普世的正确观点。

当问到为什么当初没有选择留在体制内时，他提起了复旦的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他把自由看成复旦人的底色，自由的底色很重要，一个自由的底色对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追求有很大帮助，“待在政府的话你整个人生的路径、轨迹以及价值取向都不太一样。自由这一块在我身上有重要影响，所以说觉得政府这条路径未必适合我。”



• 图：邵宇在上海外滩

离去：校园理论学术到券商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理论与实际状况的偏差让邵宇产生了离开象牙塔走入市场的想法。他把学校学到的大多东西称为局部的真理，而行业十年的历练则是以开放的心态探究这些真理的过程。

他把学校研究的一些东西戏称为“屠龙术”，看似十分先进，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学会了才发现，这些理论和

技巧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相当差强人意。就好像那本他研究生阶段写的《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像一本屠龙术太高深太复杂以至于没什么用处，“现在除了前言和后记我基本都看不懂了”。2008 年的金融危机，在金融学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理论认识的分水岭，发现“以前学的东西在解释和预测金融危机方面非常苍白”。学校所学的大多是局部的真理，而邵宇试图追求的是“去真实的感受这个世界，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在

实践中衡量理论和现实的差距。”

带着复旦培育的情怀，积累的学识，邵宇离开了那个生活了十三年的复旦校园，走入真正的金融世界。步入真实金融世界无非两种选择，去政府监管机构和行业中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间，他选择了离市场最近的金融机构做一名分析师来起步。

邵宇的第一份工作选择在西南证券，外部的世界并不像学校那样安逸，当时经常重庆、上海、北京三地跑。在西南证券研究所待了一年后，在北京的另外一家证券公司待了一年，最终 2011 年回到上海来到了东方证券至今。

“在分析师行业，你的不少时间都在路演和跳槽”，他认为，一个研究者最重要的是自己的 IP，不同的平台对 IP 传播有不同效果，券商相对来说是行业里头比较有竞争力和离市场最近的，有利于 IP 积累和宣传，所以选择了在券商工作。

凭借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2011 入职东方证券至今，他从首席策略师岗位换到了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国内券商研究人员具有博士及以上学历人数为 306 人，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国内券商全部加起来只有不到 30 个。

但在这光鲜的背后是的是辛勤努力。一年公开发表文章 100 多篇，接受采访 300 多次，演讲 200 多场，“目前的状态已经是满负荷了”。现在他的一日生活非常的规律，早上 6 点到 9 点是思考和写作的高峰期，上午 9 点到下班一般都是接见客户、参加会议、研究交流，6 点钟下班休息，晚上 10 点多睡觉结束

• 图：邵宇在发言



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同样是做经济研究工作，和之前在学校做研究相比，市场上的研究工作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他把经济学家分成三种，学院型的、商业型的和政策型的。

以前在高校是学院式的，日子比较简单，要么研究要么教学，但现在很多时间都在交流和表达。他认为，在学校工作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一种平静的生活方式，它的竞争压力来自于同行的学术认可。在券商工作也需要得到同行认可，但更多的是“市场的认可”，特别是“投资者的认可”，为投资者提供做出正确的决策建议。学术研究追求理论的精准和美感，而投资者追求模糊的精确，在实际市场上，完全的精准不可能也没有价值，“金融市场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运气成分”。

而邵宇则能灵活的在三种角色之间转换。他经常参与这三类经济学家们的会议，还能在会上碰见复旦的老同学、老同事。在一年参加的两百多场会议中，商业性质占了一百场左右，学术类型和政府相关的各占五十场左右，“我觉得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能在三者角色之间自由的转换，在三者之间灵活来去，他们受到的基本训练是一样的，只要能触类旁通，就应该可以在三者之间灵活来去，这可能是更高的层次吧”。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于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洒满了牺牲的血雨”，邵宇浸润在金融市场的近十年生涯并不是一路凯歌。他觉得，做研究最大的挫折来自于“你的研究不被市场认可”，或者你的研究出现了重大错

误，对重大事件判断的偏差。

“最开始觉得这是很大的 shame，但是后来慢慢习惯，我们不过是普通人而已，我们需要不断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打磨让你体系更加的完整”，“市场允许你犯错误”。在金融研究行业难免要“撕报告”，“报告刚刚写完，相反的事实出现了，直接打脸，你必须把报告撕掉重写，而且是偷偷的撕掉”。他把这种误判看成是教训，它让你更加的敬畏市场，让你更加保有开放的心态去研究。

传播：不变的初心

从学生到教师，从教师到首席经济学家，从学校到市场，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传播真知的初心。

早在硕士生三年级，邵宇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本书《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的写作，即使在参考教材泛滥的今天，邵宇的这本个人“读书笔记”依然没有过时，豆瓣网友有评论“金工必读”，有时在一些讲座之后，还经常有学生拿着这本已经绝版的书向他索要签名。

现在，邵宇引以为豪的是最近作品《全球化 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这个框架有很大的解释力，不管是全球化的高潮，还是现在中美贸易摩擦，它用更长的历史眼光回顾了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过去的繁荣，为何出现现在的低潮危机，特别是民粹崛起，贸易摩擦，地缘风险等等，以及未来如何预见。”

而这只是“全球宏观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是《危机三部曲》，关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第三部是正在筹



• 图：邵宇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发表演讲

备写作的“全球化 3.5：逃逸中低收入陷阱”，“全球化 3.0 演进到 3.5 就是全面的中美贸易、技术、地缘的摩擦”，邵宇表示，这本书应该在年前就能出版了。

邵宇的理论书籍常常写出文学的味道。在“中国宏观三部曲”系列中，他写过《穿越镀金时代》、《新政机遇：改革锦标赛》，还有正在筹划中的第三部“进步新时代”。得益于大学本科四年文学的熏陶，这些书读起来“比较轻松”，“遣词造句也很得体”。他更乐意以一个比较人文和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经济学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数学模型。

这样的“文艺风”也体现在他的演讲中。在 2018 年初的一场题为《2018 分水岭：流动性尽头和勇敢者游戏》的

演讲中，他用“《芳华》”和“油腻”两个词概括了他对 2017 年的印象。前者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人的事业、财富和情感巨大变化，有人成功有人失落，后者指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类似中年男的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

除了纸质书，邵宇在许多网络平台也推出了音频作品来传播自己的观点。在喜马拉雅上有一个与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助手陈达飞合作的课程《复旦名师团的经济学课》，“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实际操作中得到的一些感悟和经验通过这种最新的音频方式来传播给大众”，“换一种尝试，以前是写书，现在发现年轻人对音频接受的意愿可能更强。”他也提到，新近出品的科普理财



方面的短音频节目《如何战胜印钞机》也正在成为爆款。

“不管是商业研究者还是学术研究者，你的 IP 总归是自己最大的资产”，在网络媒体上遍布着他的文章和演讲。在微信朋友圈，他每天都会及时更新热点事件评论和自己在媒体上发布的文章。在采访结束几分钟前，他朋友圈便发出了一张图片，含蓄的评论刚刚结束的中美之间“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的贸易问题磋商。

他言语简练而奥妙，论断中饱含着睿智，眼镜背后目光犀利，交谈过程中娓娓道来，逻辑严密。从复旦校园到金融市场，从经济理论到市场实践，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是对经济规律和真理的探求。

“我以后大概率会回学校去当老师”，当谈到退出市场后的打算时他如是说，经历过学校、政府与市场的修行历练，兼有理论和实践，能在三类经济学家之间自由转换，“虽然离开了复旦母校，但我从来没有离开学术生活”。

邵

（本文系记者对邵宇校友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邵宇，2002 年复旦金融学博士毕业，现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王勇：天道酬勤，愿守一方书桌

文 / 本刊记者 陈熙

与王勇先生的约访恰值五一假期的一个午后，而在眼前这个挂着“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标牌的办公室内，王勇仍在伏案工作着。敲开门，映入眼帘的赫然是墙上挂着的一幅书法——“天道酬勤”！

现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的王勇生于 1978 年的上海崇明，在 2000 年获得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学士学位，同年免试直升进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又于 2003 年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并在 2009 年获其博士学位，曾师从韦森、宋国青、林毅夫和 Myerson, Becker, Hansen, Lucas 四位诺贝尔奖得主等名师。从沪到京，由华赴美，即使是在以严苛著称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仍旧获得了博士资格考试价格理论的第一名，除个人资质外，“天道酬勤”恐怕是对其成绩的最佳解释。

王勇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加入北大之前曾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并且曾担任世界银行常驻研究员与咨询专家。他的很多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因此受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务院、美国财政部、美国贸易委员会、美联储、亚洲开发银行以及韩国金融研究所等重要政策机构介绍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议。此外，他还主持承担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的关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的政策研究课题，也曾接受新华社、日本 NHK 和韩国首尔电视台就相关学术与政策问题的采访，并担任过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讲嘉宾。如今，身处首都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和国内学术中心，又作为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与政策界备受关注的“新结构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重要建设者和领军人物之一，王勇数次参与

国内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争论，受到多方关注，名字在财经媒体上经常出现，而他却曾用这样一句话自勉：“大国逐鹿，京城喧嚣，我最喜欢的，还是一方书桌、一片宁静、一份从容、一行渐修，期盼着那一点顿悟。”

名利场中守一方书桌，这是最简单的追求，却也是最艰难的追求，这是王勇的“不改初心”。

于复旦，得遇良师成人生转折

王勇把自己进入复旦世界经济系就读的选择称作“一系列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高中就读于崇明民本中学的王勇，在入学的第一天便注意到学校橱窗中的宣传栏，其中提到那年的本校一位学生在高考中以上海市理科第三名而被复旦经院录取，加上在王勇高考前一年的上海市状元也进入了复旦大学的世界经济系就读，榜样的力量在王勇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1996 年填高考志愿时，王勇当即决定：自己要去复旦世界经济系。

“复旦有着非常浓厚的经济学传统”，王勇这样回忆到，当时的复旦经济学院不仅有着许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还有着许多朝气蓬勃的青年教师，最年轻者甚至在硕士就开始带课，这种传承更具活力的感觉，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复旦经院还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地方，各类学术讲座信息通畅，人文传统浓郁厚重。1991、1992 年发端，由陆铭、陈钊两人创办的属于经院本科生自己的学术小报《经济学人》，后来也由一群感兴趣于学术的学生代代相传，坚持着

做了下来，成为经院的一个传统。

1998 年秋天，在王勇大三的时候，韦森教授从澳洲归来，在复旦世界经济系开设《比较经济学》课程，这成为王勇大学生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用王勇的话说，“如师如父”的韦森老师奠定了他走学术道路的决心。

据王勇回忆，韦森老师对于学术特别虔诚，讲课也极具激情，不吝与学生分享他的各种思考。尽管其中很多内容艰深晦涩，富于理论层面的思辨性，但无疑给那一级的世经系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王勇而言，走学术道路曾经只是一个遥远而朦胧的梦想，但在韦森老师的影响下，却变成了他人生坚定的目标。

当时，王勇经常到韦森老师在凉城的只有十几平米的家中拜访求教，畅谈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而“做菜很好吃”的韦森老师还会给王勇讲自己与其他的经济学家交往的故事，忽然之间，王勇觉得经济学家不再那么遥远了。就是那段时间，王勇去文科图书馆找了很多经济学家传记来读，最终明确下来：自己也要走学术道路。

半年后，韦森老师再次奔赴澳洲，而那半年对王勇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其间，他去旁听了数学系和经济系的课来弥补世经系本科课程内容上偏重实务的问题。到了大三结束的那个暑假，韦森老师对王勇说，你应该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读硕士。这一机构在 2008 年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所有的教授都是海外名校 PhD 的获得者，教材也都是海外名校的通用教材，这在当时的国内是前所未有的。

恰巧，王勇那年遇上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一次向外校招收免试直升的研究生的机会，韦森、张军、袁志刚和谢识予老师共同为他写了推荐信。在申请前的那个大三暑假，王勇还特地跑到了北大，在三角地的书店里看到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一届硕士毕业生在 1999 年的毕业论文合集，在朗润园的教务橱窗里看到了研究生的课表，他最终下定决心：自己应该到这里读书。

因为这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一次对外校招直升研究生，那时还没有本科生夏令营，王勇当时心里也没有底。或许是上天的考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申请时间恰好和复旦世经系的直升在同一时间段。作为世经系国际经济专业的第一名，当时尚未接到北大复试通知的王勇还同时参加了复旦世经系本系保研的面试。在参加本系面试的学生中，王勇是唯一的男生，也是学生干部，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并恳请复旦能为他在本系保留一个直升本系的名额，但是当时的系领导当场表示你可以选择去北大冒险，但我们不会为你保留这个名额，但是如果北大没有选上，也欢迎你回来通过考试成为复旦的研究生，不会歧视。面临抉择，王勇给面试的老师们鞠了一躬，说：我还是想去北大试一试。

这样的抉择，对于一个大三的学生而言，来的似乎太早、太过艰难。但是，相比于之后的历程与选择，这只是王勇人生旅程的一个小小插曲。幸运的是，背水一战的王勇被北大顺利录取为直升研究生。在大四的上学期，王勇利用在复旦最后的求学时间还专门去听了一些经济学院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的课程，



• 图：王勇于北大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接受记者采访

以及其他专业名师的课程（比如，陆谷孙教授的英美散文课）。王勇回忆到：当年从外校直升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总共有四人，分别来自复旦、人大、浙大与南大，而其中有些学校因为自己学生直升到北大而不是本校，就取消了一本已获评的奖学金，但是我们复旦很大气，没有做这种事。他说：“尽管我离开了复旦，但和母校之间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对于复旦，我始终怀着十分深厚

芝加哥：新的挑战与收获

在北大师从宋国青与林毅夫教授，学习了3年后，王勇继续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

王勇回忆道：“芝加哥经济系以淘汰率高而著称，我们那一届学生一同入学的共24个，都是属于各自国家最为优秀的那一批，却在那年的博士资格考试中被刷掉了10个，考核之严可想而知。”

在芝加哥的6年时光，王勇所承受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在此之前，即使是高考他也从来没有为了完成作业去熬夜，但在芝加哥这里却变成了常态。从复旦到北大，王勇接受的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大陆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经济学的培养条件，但是到了芝加哥却发现欧美，甚至在拉美读本科的学生的经济学的基础还是要更好一些。班级里每个人起初都万分自信，在暑假的math camp里，同学们意气风发，高谈阔论，还会忍不住炫耀一下自己，但一个月的课上下下来，男生们开始胡子拉碴，甚至剃光头，更为明显的是大家开始沉默了，课业的压力无声地在这群天之骄子间蔓延开来。

当时最难的课程之一是价格理论，由诺贝尔奖获得者Gary Stanley Becker和克拉克奖得主Kevin M. Murphy共同教授。课程难度极大，全班同学为了完成作业都经常熬通宵。王勇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段一边完成作业、一边看着天空渐渐发白的日子。要拿到好成绩不再像以前那么轻松，在芝加哥，不把全身的气力都用尽拿不到A的。而最后，在这门课的博士资格考

试上，王勇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拿到Lee Prize。

在芝加哥，授课老师都是世界顶尖的学者，上课严谨，讲得不仅快而且深，要求也很高。在复旦和北大，老师们课余还可能闲聊几句，而在芝加哥的经济系，老师们之间的话题似乎永远只有经济学，甚至连教学都从来不聊，十分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这种氛围给学生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当时，学校鼓励学生三四个人组成学习小组进行讨论，芝加哥大学的Joseph Regenstein library整个地下一层基本上都被经济系的学生所占据。因为淘汰率之高，使所有的同学都很有危机感，同学之间既是竞争对手，同时也是战友，在学习过程中非常团结。

在芝加哥，王勇见到了很多一流的大师，他们不仅治学严谨，而且要求思想的创新。当时在经济系经常有研讨会，氛围从来不是一团和气的，老师们会非常残酷地指出对方的不对，甚至出现过在上面讲而被下面逼哭的老师。老师们围着桌子讨论，学生们就全都挤在一边的椅子上旁听，没有人敢上去坐。讲座教室的墙壁上挂满了芝加哥经济学前辈知名教授的照片，在那里的求真知、鼓励原创的精神极大地感染了王勇。

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王勇与同学们都想，自己博士一年级过得这么辛苦，以后应该就什么都不怕了。不过，王勇笑着说，我们很快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因为做研究才是最难的事情，学生的研究要想能进入本系教授们的法眼太不容易了。



• 图：王勇与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之一 Gary Becker 的家中合影

中西合璧，继往开来

2008年，林毅夫老师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而当时王勇还没有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就受到林毅夫老师的邀请过去一同合作研究。在2008-2012年间，王勇一直在世界银行担任咨询专家，并在2010-2011年担任世界银行的常驻研究员。

无论是教育经历还是工作经历，王勇都有兼具中西方双重体验，谈及他在美国的求学与工作经历，王勇表示，这些都对他有着很大影响。首先，这让他和西

方经济学家们共享同一套分析工具和话语，从专业的经济学角度来看，这对于问题的讨论就更加能够互相理解。其次，这也让王勇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来源，在许多政策的理解与建议方面都可以听到美国和世界声音。更重要的是，这也为王勇提供了表达自己想法的渠道。在科大的时候王勇作了关于中国国企改革的研究，美国国务院得知后便邀请王勇过去做讲座，介绍相关研究内容，这让王勇深刻认识到原来中国的经济学问题已经重要到具有国际影响的程度。最后，共同的学术与工作经历也方便了彼此之间的交流，



• 图：王勇于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

使得彼此之间的理解更加容易。

对于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开创，王勇表示，自己对这一说法还是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的。他认为，谈到建构中国话语体系下的经济学，首先要有开放的心态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说单纯为了获得民族自豪感而谈开创，学术就是学术，中国特色经济学，如果有，那也一定是为了能够帮助更好地理解与解决现在中国正在遇到的重要的新问题而逐渐形成的。此外，还必须了解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现有的研究状况有透彻的把握和了解，必须与世界的同行时

刻保持积极对话和沟通。

其次，空谈无用。开创中国特色经济学，还需要付出积极的、切切实实的、积累性的努力，包括在数据的收集上面和对现实中案例的归纳和积累上，都需要扎扎实实地进行。经济学理论本身也需要发展，以更好地刻画那些在现实中被认为重要的但是已有文献中尚未充分讨论的理论机制，而且理论是可证伪的，必须接受事实的检验，用现实说话，研究方法必须要严谨！

王勇强调，希望有朝一日，基于中国本土经验，同时又充分归纳与综合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进而提出的一些创新的理论，能够逐渐成为主流范式之一，被写进教科书中，丰富现代经济学。而且不仅经济学如此，其他的社会与人文学科也是如此，都能成为人类知识宝库的一部分。

知成一体，投身新结构经济学

在王勇办公桌的正对面墙上，挂着一幅很特别的作品：一张按满了手印的纸，每个手印旁都有着各自的名字。

“这是2015年的12月份，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刚刚成立的时候，大家一起按个手印的留念”，王勇解释道，他抬起头，指着最中间的手印说：“你看，最中间的手印显得特别大的那对就是林老师的，而下面的那对小一点的手印就是我的。”两年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升级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王勇在北大读硕士的时候，就上了林毅夫老师的两门课，并且分数都是全班最高分。读书期间王勇也跟着林毅夫老师写了几篇论文，两人有着密切的师生关系。而新结构经济学虽然直到2011年才作为一个新名词正式提出，但其理论一脉相承、早已有之，王勇也一直参与其中。

王勇认为，目前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教科书关于发达国家的内容居主导地位，相关的解释也比较丰富，比如说创新、人力资本、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制度等等问题的研究，但是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却始终缺乏完整的、良好的解释。按

照主流经济学的教材所提供的那些标准的政策建议，绝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效果都不好，这就出现了学术界的一个危机。世界上有85%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可是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却如此之少，理论的解释力却如此之差。而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够弥补这一缺陷，改变现代主流发展理论中对照发达国家“缺什么补什么”的做法，而是主张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首先看自己“有什么”，然后寻找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从刚刚改革开放时人均GDP不足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到1994年仍不足其平均水平，再到2014年12月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减贫成果，起着很大的示范作用。在王勇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国别问题，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基于现实总结出来的中国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也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这是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知成一体”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奉行的理念，由林毅夫教授首创。王勇解释道：“知”是知道，要根据经验进行理论的归纳，而“成”是做成，要能够把经济发展好，如果做不成则说明这个“知”是有问题的、不完整的、片面的，需要对照着现实的反馈不断地改进。王勇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学术团队和智库团队正好在这两方面发挥着互补的作用。

王勇说，当前中国学术界训练有素的人才越来越多，研究机构也日益规范

• 图：王勇于香港科技大学



与成熟，信息和学术交流也在增多，资金也到位。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天时、地利、人和均具备了，已经有条件能够逐渐对现代经济学做出比较大的原创性的贡献而不再只是单纯地向西方取经。

在这一背景下，谈及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前景，王勇微笑道：“我非常看好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看好北京大学。”他认为北大新结构经济研究院要做的不仅是一个政策智库，而且还必须是能够冲进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学术研究中心。这条路固然会很漫长、很艰辛，但是这很值得做。他反问道：“既然现有的框架还没有做好，我们为什么不去做？”

怀揣着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同和经世济民的情怀，王勇投身到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当中。作为新结构经济学院的初创人之一和学术副院长，王勇的个人事业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紧紧绑在了一起。

短短两年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便升格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支撑其飞跃发展的背后，是无数的辛劳与汗水。两年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便完成了架构搭建与团队建设，冬令营、夏令营和国际会议步入正轨，数据库初步创建，分中心纷纷成立，招生工作有序开展，智库项目以星火燎原之势开展，学术影响力蒸蒸日上……而作为该机构主要负责人的王勇，在深感自豪的同时，透支了多少体力与精力，恐怕连他自己也难以算清。

于平地处起高楼。多少个不眠夜晚、东方渐白，多少次会议白天连接着晚上、今天紧挨着明天，多少趟飞机只是一个移动的办公室，王勇不停地在学术研究、

课程教学、学术会议和行政事务中高频切换。辛劳终究会绽放为果实，或早或晚。如果说王勇教授的专著《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以通俗的语言让世人更清晰地了解新结构经济学，论述独辟蹊径、令人深思的话，那么由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联合主编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一书，则更是集众家之言的“世纪大讨论”，而该书正是起源于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复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产业政策研讨会。文章千古事，治学严谨、求知不倦是王勇一贯的追求，他的多篇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论文在JME和《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顶级期刊得以发表。

我想，入围2017年“中国青年经济学家”，是对王勇前期成就的一个最好诠释。

抱定初心，不为名利所累；专注学术，守方寸宁静。于方寸书桌间，王勇却能心怀天下之大。作为复旦与北大两校校友，王勇多次致力于架起两校学界间沟通合作的桥梁。期冀他也能够用新结构经济学，架起中国和世界间沟通与合作的桥梁。 **睿**

（本文系记者对王勇校友的专访，成稿过程中，在细节修订方面得到了王勇校友及其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同事杨子荣博士的诸多帮助，在此谨致谢意。王勇现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2000年获得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学士学位，同年免试直升进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03年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并在2009年获其博士学位。）



王爱民：知识为体，智慧为用

文 / 本刊记者 金宇壕

“博学睿智，厚德载物。”这是王爱民中专时的同学对他的评价。“一个农村来的中专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说：“1988年毕业之后，我进入一家机床厂工作，而他则选择了继续学习。因此，我们分别了将近25年。2013年再次相见时，我是一家工业自动化公司的创办人，而他则成了我的投资人和合作伙伴。”

王爱民选择用知识改变人生，正如王爱民所说：“知识为体，智慧为用。”

复旦成就知识为体

1995年，王爱民考入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成为复旦的一分子。在其硕士阶段，许多复旦的教授不仅给予了他非常多的帮助，也带给了他思想与研究方法上的启迪。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芮明杰教授，王爱民说：“芮明杰上课时常常语出惊人，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但他的论证逻辑却十分紧密。”这让王爱民知道了广泛阅读对于表达以及实践本身的重要性。

3年后，王爱民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张军教授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当时的张老师只有35岁，刚刚当选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是一个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青年教授和知名学者。读博期间，张军教授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关于博士论文的选题，这为他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

王爱民回忆道：“当时，我在阅读了大量经济学文献后，选取了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博弈论课题，我认为这个选

题非常好，但是张军教授并不这样认为。”

张军教授结合他自身去日本访学的经历，强烈建议王爱民以实证研究作为其博士论文研究的方向，“你们的研究应该比我做得更好或者说对社会的直接贡献可能要比我更大，毕竟时代是前进的”。

在听了张军教授的一番话后，王爱民结合他自己的工作实践，选取了产业组织理论及实证研究为课题，并将博士论文的题目定为《经济转轨时期中国民航业的市场结构与经济绩效—实证研究》，用经济学理论系统地研究中国 and 全球民航业的历史与发展规律，这对于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影响巨大。

复旦成就知识为体

毕业后，王爱民在上海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留任。就职期间，王爱民参与了浦东机场的市场定位、航线网络规划和国际航空枢纽的战略规划，以及迄今世



• 图：王爱民与妻子儿子参加婚礼，儿子是伴郎

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交通枢纽——虹桥枢纽的规划和运营等数十项重大研究课题和咨询项目，他不断将经济学知识应用到具体行业实践中。

2003 年，全国社保基金开始进入资本市场，作为复旦校友的王爱民被聘为当时受托管理社保基金份额最大的某投资基金的行业投资顾问。这期间证券市场处于熊市的低迷行情中，王爱民建议重点配置的机场股获得了 100% 的上涨，该机构获得了全行业第一名，社保专户获得了令同行业包括国际投资界认可和赞叹的较佳业绩。2005-2007 年间，资本市场得益于股权分置改革，进入了一轮牛市，王爱民建议机构重点投资人

民币升值预期下的航空公司，并重点配置当时仍处于较大亏损的南航。王爱民说：“在全球航空业经历了‘911’危机后、在中国民航业经历了 SARS 后，他们有很大概率逐渐走出困境并实现盈利。”在王爱民的建议下，社保基金专户和其他成长性基金获得了较好的投资回报，在南航的投资上用两年时间实现了十倍的收益。五年间，该机构的社保基金专户规模从最初的 30 多亿元增长到 500 亿元。这段与一批优秀的投资界专业人士交往的经历令王爱民印象深刻，这也为其后来进入专业的股权投资领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咨询公司的近六年时间里，国内



• 图：今年四月王爱民博士参加上海半马

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和国内前 15 大的机场都成为了王爱民所在公司的客户，而国际上的知名客户则包括联邦快递、美国达拉斯机场等等。

王爱民回忆到，他曾两次参加春秋航空的战略研讨会，为其在选择第二基地、国际航线开拓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还有一次，在民航业由于种种不利因素处于低谷时，在三大航空公司分别得到中央 30 亿元的注资而民营航空纷纷倒闭的情况下，王爱民在中国民航的核心刊物《民航管理》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政府是否应该求助金融危机下的民营航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国家在救助国有航空公司的时候，对民

营航空公司进行适当救助和支持也是政府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与经济形势下的责任。

后来，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中，春秋航空积极救济灾区，其主要领导人被授予“都江堰荣誉市民”称号，春秋航空则将这一份荣誉转送给了王爱民。“我与春秋航空的领导人几乎没有任何私交，”王爱民说，“但是他们的做法让我意识到知识对于企业的价值能够得到企业家的认可”。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王爱民接受了上海机场集团领导和建设指挥部的邀请，主动从咨询公司辞职并担任了上海机场集团建设指挥部“关于上海建

设世界级机场体系的成功要素、案例分析 and 实现路径”的课题总顾问。

助力创业，创立邦明

2010年，王爱民受复旦校友蒋永祥的邀请参与创立了邦明资本，如今8年过去，邦明资本已经从一个创立初期仅有一支基金的小公司，发展到目前有近30位专职的投资管理人员、11支基金、基金总规模40亿元、投资了60多家科技成长型企业的投资公司。

邦明资本的创始不同于其他很多投资机构，因为他们在认真研究市场情况后发现，虽然中国的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数量众多，但是呈现出显著的“哑铃型”分布，即早期的风险投资（VC）为数不少，偏后期的Pre-IPO数量众多，但那些处于发展期的科技企业尤其是那些遇到发展瓶颈的企业则少有投资机构问津，邦明资本选择这一阶段的科技企业进行定位，投资于成长期的科技型企业并帮助它们突破瓶颈实现飞跃，邦明资本更青睐“硬科技”——有真正技术含量的实业企业，每一分钱都真真切切地注入了实体经济。

到2013年，邦明资本的投资实践获得了上海市科创中心和国家科技部的关注及支持，这年底，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和杨浦区科技引导基金的支持下，邦明资本第一支单支规模突破1亿元的科兴基金（规模为1.3亿）成立。该基金投资了10家中小型科技企业，平均每家企业1200万元，这期基金不仅完成了科技部的引导要求，而且实现了对投资人

较高的回报，成为全国25支获科技部引导的基金中第一支将科技部引导基金通过项目退出实现完全返还的基金。

创新加速器，为梦想加油

如今，王爱民正在与其团队探讨设立一个企业加速器。原因是：王爱民看到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创业创新大潮来势汹涌，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资金的规模和机构数量也急剧增长，这使得需要融资的创业型企业数量众多，但很多投资机构发现可投资的项目数量却非常有限。

鉴于一些项目尽管获得投资后依然面临经营困难、业绩下滑甚至更为严重的状况，王爱民及其团队便开始酝酿成立一个平行于邦明资本“投后管理体系”的企业加速器，旨在帮助有潜力的企业实现除资金之外的资源对接和具有黑马潜质的企业在逆境中重生。

王爱民说：“很多企业在完成前几轮融资之后都会遇到瓶颈，在投资行业有一个词叫‘D轮死’，也就是指一个企业在融资到D轮后仍面临着很大的经营不下去的风险，加速器所要做的就是帮助企业突破这个瓶颈。”所以，王爱民想通过这个加速器来帮助这些企业达到IPO或者能够被上市公司并购的资格。

美国有一家叫作YC的企业加速器，是全球著名的信息技术、电信行业和智能科技领域的集咨询、顾问和企业服务的专业提供商。“创新加速器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硬件和软件的支持，不仅仅是提供管理咨询和顾问，而且是直接参



• 图：王爱民在家乡江苏兴化的油菜花景区留影

与企业管理和运营，这恰恰是为了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一个企业经过了几轮的融资，获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经营不下去了，那之前它获得的大量社会资源就都被浪费掉了。”王爱民说。让企业突破瓶颈，在关键时刻帮助它突破难关，这样能让企业之前所获得的社会资源负责，并在有足够的力量之后回报社会。在王爱民看来，这便是加速器要去达到的目标。

“知识为体，智慧为用，琴心剑胆，慧眼柔肠。”王爱民信奉着这则人生信条，并继续将其作为通往成功的铺路石。

（本文系记者对王爱民博士的专访，部分内容来自《政府是否应该求助金融危机下的民营航空？》、《掘金科技成长》，在此谨致谢意。王爱民，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投资管理、决策顾问与咨询专家。曾任美国盖安德咨询公司上海办事处代表、上海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和证券投资部主管等职务，现为邦明资本合伙人、连资加速器创始合伙人。）



04经济系：十年归来，仍是少年

文 / 本刊记者 陈熙

2018年5月26日是复旦校庆日的前夕，在这个雨后微凉的日子里，校园内已聚集着不少返校庆祝的校友，为周末的校园增添了几分热闹。而在经济学院510会议室，2004级经济系的同学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相聚，每当一个老同学进来，都会引起其他人的关心和善意地戏谑，成就了会场的一个又一个的小高潮。毕业十周年再聚首，一起嬉笑打闹的他们，仍是当初的少年模样。

延续读书时的传统，毕业后的班级活动仍然由班长丁绎镬一手操持，为了这次的毕业聚首，他专门从澳大利亚赶回了上海。当看到原定于上午十一点的集合到了下午三点还是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人时，丁绎镬调侃道：“因为实在太忙了，大家回校都是行程飘忽的，我们南区不是有一个手托着放飞鸽子的雕像吗？那个就是我们班的精神雕塑，大家都是随时准备‘放鸽子’的。”

不过，玩笑过后，身为班长的丁绎镬还是时刻看着手机，关注着大家的行程，不时地告诉在场的人又有哪个同学要到了，并在老同学进门的第一时间喊出对方的名字，对其近况和读书时的八卦都如数家珍，班长的存在让这间会议室里的笑声从未间断过。

忆往昔峥嵘岁月

在04经济系这个大班级中，徐英捷可能是最为特殊的一个了，1977年出生的他比同班的同学们大了八九岁，用班长的话来说，这是他们班的传奇人物。在2004年之前，他一直从事软件相关的工作，而出于个人兴趣，再加上受到林毅夫、张五常等经济学家的影响，他决定投身经济学并在04年参加了高考，比同年考生丁绎镬大了十岁，但年龄丝毫没有影响他和同学之间的情感，风趣幽默、妙语连珠的他甚至被同学夏择民亲切地叫做“七七”。

夏择民是04级经济系的学习委员，曾经超过3.9的绩点让他成为了公认的学神和天才，他也因此获得了“九爷”

的绰号。当被问及自己当年的学习动力时，他幽默地回答：“我来自浙江的小城市，刚来到大上海的时候还没能适应，于是就把精力都用来刷数学题了。”这一回答引起全场同学的哄笑，也让大家回忆起当年夏择民毫不吝私地将自己的学习经验分享给同学，还向班上做笔记最认真的女同学们借了上课的笔记，复印后分发给其他同学。夏择民感叹，现在回想起来，还欠了女同学们不少人情没还。

班上另一尊公认的学神级人物是张牧扬，作为全国竞赛一等奖的保送生，他的绩点一度超过夏择民，在毕业的时候两人都是3.8左右的绩点。借用徐英捷的话说，“如果说张牧扬纯粹靠天赋那是不公平的，他最大的天赋其实是强大的自控能力，永远能够保证足够的学习时间。”如今，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系的他是班级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还在学术界的同学之一。

除了学习之外，爱情也是很多人大学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04级经济系就有一对著名的班对——万超和王帅，如今两人已结婚多年，因此，当王帅忙于MBA的毕业考试没能赴会时，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看向万超，问道：“你老公怎么没来？”

奥数竞赛保送进复旦的王帅几乎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入学时还不到十八岁，再加上学业的原因，他和万超在毕业前都未谈过恋爱，直到大四毕业之际，万超准备考研，而王帅打算考公务员，因此他们和另外两个同样准备考研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自习，日久生情，两人便顺理成章地相爱了。



• 图：5月26日,04级经济系校友晚上在会议室见面

毕业后，因为万超考研计划的失败，王帅也不想在上海工作了，两人便出乎许多人意料地回了万超的家乡大庆，去了中石油工作。不过，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两人便分别被外派去了海外，王帅奔赴伊拉克，而万超也去了苏丹；到了2014年，万超才从苏丹回国去香港中文大学读了MBA，现在到了国家能源集团工作，而王帅直到2017年才回国，去了香港科技大学读MBA，由于下个月即将毕业，忙于考试的他缺席了这次聚会。尽管万超用“平淡”来形容两人之间的感情历程，但她嘴角的微笑时刻提醒着旁观者，他们所拥有的，是一份岁月中相互守望、相濡以沫的爱情。

十年后再次聚首

岁月荏苒，同窗四年的生涯转瞬即逝，十年后再次聚首，同学们大多已组建了家庭，不少人都是携侣前来。其间，最特别的可能是张虹宇了，她不仅手里挽着老公，肚子里还怀着宝宝，一时间现场的话题都被引向了宝宝喝什么牌子的奶粉好，生产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等，教室内欢声与笑语一波高过一波，丁班长一边激情推荐着澳大利亚的奶粉，一边头头是道地讲授着育儿经。从入学到今日，十四年过去，当年坐在教室内的青葱少年们，如今也都是为人父、为人母的年龄了。



• 图：5月27日,04级经济系校友于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教室内合影

到了26号晚上，在聚餐之后，同学们兴起之下，再次回到经院忆往昔。他们围绕着一个圆桌而坐，开着几盏暖色的灯，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工作、家庭、情感，他们一直聊到了晚上十一点多，才恋恋不舍地回去休息，准备在第二天校庆日在校园里探寻回忆。

终于到了5月27号这天，同学们早早地就穿上了大红色的十周年校友服，回到了熟悉的三教，在这里，他们曾经上过许多课程，也曾在这里通宵刷题奋斗过，如今回想起当时的岁月，二十多名同学微笑着用手比出了爱心的形状，拍下了有爱的合影。

之后，一路走一路聊，他们来到了

复旦正门处的毛泽东像，这里如今是每年的新生报到处，而27号这天，为了迎接毕业校友的归来，在毛泽东像前有着一块大大的牌子，写着“我爱复旦：2018复旦大学校友返校日”，04级经济系的同学们笑着在这块牌子后面合了影，表达自己对母校的依恋。

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经过在复旦的四年相伴，这是04经济系十年后再次聚首，时过境迁，十年可能改变了他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但始终不变的，是他们少年的心。愿每一次相见，都美好如初见，大家都如印象中的少年模样。

络



丁绎镬：在南半球 守望日月光华

文 / 本刊记者 殷鑫豪

“我们希望（复旦大学澳洲校友会）能做成一个服务性的组织，在学业或事业上对校友提供更多的帮助。”这是丁绎镬谈及复旦大学澳洲校友会未来发展时讲到的一点。

自从于 2010 年第四届理事会上当选为复旦大学澳洲校友会理事以来，丁绎镬一直致力于澳洲校友会的发展，并在这几年连任复旦大学澳洲校友会秘书长。

在他看来，澳洲校友会在这几年的发展速度很快，人气也越来越旺，随着组织的壮大，对自身的要求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工作中还有很大的完善与规范的空间，并且澳洲校友会作为复旦学子的海外之家所能发挥的作用还远未被挖掘充分”。

博学笃志 复旦结缘

丁绎镬出生于书香门第，家人都是理工科背景，也因此，丁绎镬的名字折射了理科思维的趣味：绎，演绎、推理，“我爸希望我能说会道”；而镬，他解释称，是第 91 号化学元素，在天然放射性元素里，半衰期最长，天然意味着自然，放射性表意活泼可爱，半衰期最长则寓意生命力长。这些都是家庭对他寄予的希望。

由于丁绎镬家中有部分亲戚是科学家，所以他从小就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没有思考、没有经过检验的志向是单薄的。“博学而笃志”，那时还没有接触复旦的他，就深深地被这句话所影响。“学习得越多，思考得越多”，他发现，世界上的高科技越来越多，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和飞速发展的科技一样快速提高，甚至工业革命后世界上反而发

生了更多的战争。

每次读到广岛和长崎的故事，丁绎镬发现，核科技究竟是用在核电站上造福人类还是原子弹上毁灭人类，更多的是由政治家决定的。从那时起，丁绎镬的想法慢慢地发生了转变，他开始更多地关心政治，“我觉得想让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根本上提高，有时候政治家的一个好的政策比一项科技进步带来的效果更加直接有效。”

高考结束后，抱着“上下而求索”目标的丁绎镬，一直在思考自己未来的人生路。也许正是家庭理工科氛围的长期存在，丁绎镬想有所改变，“我觉得自己喜欢和人打交道”，当时，他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与进步主要都在科技生产领域，“我想应该多学一些社会学科，以后对于中国人文方面的发展，应该会有用”。“经济济民”，他补充说，“就是我的目标，北方已经很浓的政治氛围了，作为个人，更多地是想去学

习一种不一样的思想”。而中国经济最好的，“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上海肯定是首屈一指的，复旦作为市场经济研究的领头羊，对自己的吸引力也最大”。同时，他也认为自己应该到一种从未接触过的文化圈子里去，获得一些新的想法。

经世济民 团结有爱

到了复旦，大一时，丁绎镬报名参加了多个学生组织，其中包括团委的团校办公室，在那里他系统地接触了共青团的各项工作和理论学习。学生工作充实有趣，也给他带来了大量的思考。“其实就是务实和务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一下学期，丁绎镬在多个学生组织中开始崭露头角，但每天平均 1.5 个会议也让他感到需要调整生活的重心。对于自己的发展，务实和务虚需要一起抓。他果断向所有的学生组织递交了辞职信，开始了新的大学模式，大量旁听复旦教授们的公开课。丁绎镬笑称：“众多的学生组织及各种活动让我从多个角度认识了复旦的模样，复旦的教授们，让我接触到了复旦的灵魂。”

大二的时候，正值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学院方面欠缺人手，丁绎镬作为班长，由此进入了团学联。在团学联中他换岗了四个部门，主持合并和分拆了多个部门，对团学联的职能进行了调整和细化。“当你接触过了灵魂，想再只关注外表是不可能的。”如何让复旦的灵魂能够传播的更多更远，成了丁绎镬主要的努力方向。

“当时我将学术部拆分成了三个部门，因为学术对于学校和学生，都太重要了。”比如邀请经济学院的教授们指导学生们的学术研究，辅助学生们申请望道学者、蓀政学者，成就了一批目前在海内外各大院校中活跃的学术分子。“只要对学术有兴趣就行，没有基础不要紧”，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加学术小组的同学都迅速地成长起来，“现在，这些同学虽然还未至终身教授，但很多已是副教授级别”，丁绎镬的话语中洋溢着喜悦。

就这样，丁绎镬一直做到了经济学院的团学联主席。大四的时候，学校推举丁绎镬报选上海市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在谈及怎样为之准备时，丁绎镬顿了顿，“其实是时刻准备着，你永远不知道你将来会面对什么，机会会在何时向你招手”。他认为，当时的自己，先是为国家一等奖学金而努力，而后又不断地为更高的目标而奋进。“其实你并不是去竞选优秀学生干部，而是你应该做到优秀学生干部应有的样子，荣誉才给了你。”

作为当时的班长，丁绎镬联合学习委员将班上成绩优秀的同学们的笔记集中起来，形成一种优质资源的整合，每位想获得笔记的同学都可以在学习委员那里得到并拿去复印。此外，在丁绎镬的倡议下，班里还组建了学习小组，方便同学们彼此的讨论与交流。“复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分享的精神”。丁绎镬当时的想法是：人之间是要竞争的，但是未来最主要的竞争还是与外人的竞争，而不是同学之间的竞争；虽然成绩有正态分布，但每个人最终还



• 图：丁绎镬

是要走向社会；如果自己和自己的同学们都变得特别优秀，这对于彼此就是最好的。

在学习小组内，大家互帮互助，可能会悟到一些从来没有想到的东西，思想碰撞对于学习是大有裨益的。而当学习氛围形成的时候，一旦有问题在团队里提出，就会有人去解决。可能很多问题并不是那么高深，但一旦理解后，大家都会有更多时间和资源去学习和研究更高深的原理，这样就可以使团队的效率于整体达到最大化，避免了在一些具体细微的问题上因单个人闷头研究而浪

费太多时间。“别人比我优秀，我是开心的，因为只有不断地和优秀的人接触，我才能变得更优秀。”

这正是丁绎镬能很好地兼顾学生工作与学业两方面的原因。“能进复旦的每个同学都是很优秀的，但由于时间是有限的，要想脱颖而出，就应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到最多的事情，不但要快，还要坚持。尽量学习龟兔赛跑中双方的优点。”

日月光华 澳洲熠熠

2008年，本科毕业的丁绎镬决定赴澳大利亚留学。他认为：“中国的人口数量多，资源的消耗需求大，而澳洲本身生活水平很高，人口又较少，国土面积又大，资源禀赋决定了澳大利亚在未来是有和中国进行密切合作的潜力的，而在合作中，个人的价值也能得到最大化的体现。”

于是，丁绎镬来到了澳大利亚留学。由于之前在国内接触过金融方面的工作，丁绎镬对于上海经济模式的发展也十分了解。因此，丁绎镬来到澳大利亚后，主攻的是金融和法律。在工作中也是先在银行做了市场风险分析，从事法律法规相关的工作。

初到澳大利亚时，丁绎镬并没有提前了解到澳洲校友会的存在。一次偶然的机遇，在春节联欢活动中，他认识了已赴澳大利亚多年的复旦大学叶明吕教授。当时，复旦大学名誉会长叶明吕教授对丁绎镬特别地关照，“终于找到了复旦大学澳洲校友会，找到了组织”。

校友会的活动一般在周末进行，通常采取外出游玩聚餐的形式。“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开心”，丁绎镬称，“我们经常组织国宴级别的活动”（G20澳洲总理准备的国宴是BBQ）。而每逢传统佳节，校友会都会举办较大规模的活动。2014年的中秋佳节，复旦大学澳洲校友们齐聚一堂，与中国驻悉尼领事馆教育组办事处共同举办了主题为“明月寄相思，千里传真情”的中秋联欢会。

“当时，有一个抽奖的环节，奖品是复旦的校名扑克，大家都很喜欢，因

为扑克上印着校园的各处风光，巍峨的日月光华、小桥流水的燕园、沧桑变幻的老校门……看到这些就能回忆起自己当年的那些时光。那次来的人也特别多，有80多位，大家辗转万里于他乡相聚畅谈，真的不容易”，丁绎镬说。

复旦大学澳洲校友会是2001年由李善之牵头成立的。李善之是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的侄子，因为老先生德高望重，身边聚集了很多校友，而关于要成立校友会的消息也受到了悉尼华人圈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复旦大学的校友会成为在澳洲最早建立中国高校校友会的成员之一。

较早的时候，主要是八大高校在互相联系、举办校际之间的联谊活动，后来随着中国其他学校校友会的增多，各高校的会长一致认为，应该有一个更规范的组织架构，来更好地保证彼此的交流和进一步的发展。几大高校澳洲校友会的负责人在中国驻悉尼领事馆教育组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大学校友会联盟。

平日里各高校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有学术交流、郊游徒步、家庭活动日等等。在家庭日的时候，大家会以学校为单位进行排球比赛。丁绎镬笑称，“咱们复旦澳洲校友会的排球队非常厉害。每次的冠军队都是北体，因为他们是体育学院的，人高马大的；我们是亚军队，把其他强队都PK掉了，主要是有团队合作精神。”

最近一次的主要学术交流就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澳洲联络处正式成立，请张军院长参加的揭牌仪式。众多嘉宾出席了此次会议，有联络处主任章利华女



• 图：排球比赛，丁绎镬（左三）的团队获得亚军并与冠军北体合影

士、澳洲贸易委员会亚洲区总经理刘冰先生、亨达集团澳洲执行总经理 Kathy Chan、西太平洋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Geoege Toubia 等；此外，还有清华、北大等兄弟院校的校友会代表以及澳洲工商界和金融机构代表列席会议。

丁绎镬认为，校友会应该成为一个为海内外学子提供更完善服务的组织。他还提了一些将来的工作目标，比如选拔澳洲留学生等，而复旦大学澳洲校友会也希望借此进一步增强和母校之间的联系，成为海外校友和母校的纽带。“你会发现，中国的二代、三代跟祖国的文化亲近感与归属感越来越差，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澳洲校友会“复二代”、“复三代”的活动议程也已经开始讨论，

丁绎镬愿尽己之所能，为中国的海外交流和文化传播做出更大的贡献。 **结语**

（本文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优秀毕业生丁绎镬的专稿，根据对丁绎镬的采访谈话整理而作，在此致谢。丁绎镬，2004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本科生，毕业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现担任复旦大学澳洲校友会秘书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澳洲联络处秘书长等职务，并在悉尼的银行及上市公司担任风控及合规等负责人。）



黄辉毅：拥抱世界

文 / 本刊记者 欧杨洲 袁 驰

2008 年，黄辉毅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转眼间十年过去，他在国际金融机构摸爬滚打一遍后定居澳洲；又于去年决定“再折腾一次”，自己创业。

谈起大学时印象最深的事时，黄辉毅说：“我印象最深的还莫过于复旦许多的国际交流生项目；在复旦，我们接触到了多元文化的世界，这对我在澳洲的职场和创业成功帮助极大。虽然澳洲是一个移民新大陆，但复旦的交流生项目让我更容易融入当地，从而更加成功。”

求学之路：接触世界的明窗

黄辉毅 2004 年收到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从厦门来到上海求学。大城市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路上听到别人用上海话聊天，他都会观察口型、模仿发音，自己慢慢地也能说上几句，“我觉得它是上海的文化，就去学了”。

黄辉毅对不曾了解的文化格外感兴趣，而复旦的国际交流项目更是为他打开了一扇接触世界的明窗。他在 2007 年获得了前往加拿大女王大学英国国际学术交流中心（BISC）的学习机会。黑尔什姆是一个离伦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小镇，学校在镇上的一座 15 世纪的古堡内，黄辉毅作为唯一的中国人，“被迫”去认识其他国家的同学、打成一片。在相对封闭的城堡内一连呆了四个多月，黄辉毅却是一句说中文的机会都没有。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多元文化，而且是从方方面面的细节中感受到。”这次交换经历也是他未来几年到全世界各国学习、工作的开端。

从英国归来的黄辉毅英语口语水平大幅提升，他相信自己已掌握这个语言工具；为了实现进入国际金融机构的愿望，他还需要过硬的专业能力和一些运气。

专业上的切磋主要来自同学，除了一起学习国际金融相关的课程，黄辉毅经常和同伴交流各个国际投行的发展动态，向学长们询问国外工作环境，申请工作时也得到了校友的帮助。经济学院的老师也给了他不少启发：“经济学院有很多老师不仅学术研究有成，在业界也有颇多成就；每个老师都有他自己的特长，你有什么疑问都可以从老师那得到解答。”

“复旦是个一流平台，它提供资源，让所有有方向、有目标学子有更多机会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让没有方向的人迅速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

从业之路：深入世界的艰途

复旦毕业后的十年，也是黄辉毅“在国际金融市场、各大金融机构摸爬滚打的十年”。

临近毕业时，黄辉毅几乎向所有国际投行 Graduate Program 都投了简历；即使项目面向的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他也还是硬着头皮报名，最终拿到了瑞士信贷的聘用，成为 2008 届经济学院毕业生中去香港工作仅有的两名同学中的一位。“运气特别好，他们招聘其实不面向大陆，但发现我能力也不差，就把我作为人才直接引进到了香港。”

公司培训得以让黄辉毅在世界多国周游：在苏黎世总部待了两周，在新加坡培训了三个月，最后回到香港；他和其他刚入职的同事一起，观察投行的运作方式，观察金融市场的基础操作。

这段培训经历让他打下专业技能的基础之外，还让他观察到不同国家的工作、思考方式。“真正到了香港和新加坡你就会发现，他们受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家庭观念很重。”黄辉毅认为对不同国家文化的了解对他现在和客户打交道都有裨益，遇到新加坡裔的“马上就可以把事情说明白、说服他”，客户群体也不再局限于华人，而可以向东南亚国家等地拓宽。

在香港，黄辉毅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又随她于 2010 年来到澳大利亚悉尼。悉尼的金融业没有像香港那样发达，又有从欧美过来、工作履历更加丰富的金融人才竞争岗位，即使是澳洲当地人也很难找工作。“似乎之前国际投行交易

员的工作经历，也对我在澳洲找一份收入可观且体面的工作没多大用处。”

于是，黄辉毅又一切从零开始。哪里有工作，他就去做：从股权数据分析师，到美国国债期货（夜班）交易员、做私人银行；后来还是发现自己最喜欢外汇领域，到路透社和西联汇款做外汇交易员。他用三年时间边工作边攻读新南威尔士大学金融硕士，用本地大学的学位进一步增强自己在澳洲的竞争力。

“从最基本的职位做起，不轻浮，不狂躁。”黄辉毅在西联汇款的销售成绩总能达到完成指标的两倍甚至更多，职位随后升至西联外汇公司企业外汇对冲经理，人脉、资本等资源也在摸爬滚打中慢慢积累。

创业之路：年轻人的又一次折腾

虽然在西联外汇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但黄辉毅还是觉得“有一个天花板”；“我现在 35 岁，还很年轻；我有能力去创业的话，出来折腾一下是必要的。”

他向公司提请辞职创业时许多人都来劝阻：他的上司——西联外汇亚太地区的主管和他分享了自己创业六年但最终失败的故事，希望他放弃。黄辉毅就告诉自己的同事：如果他创业成功，他会希望同事们来加入自己的公司，自己还是要尝试。

2017 年 11 月，黄辉毅联合了不同背景的几个合伙人，成立了澳洲金石国际金融公司，旨在为在澳洲的企业提供从外汇对冲到公司企业贸易相关贷款的服



• 图：黄辉毅在旅行

务，担任 CEO。后来又与合伙人成立了澳洲金石财富，为澳洲的高净值人士提供理财建议。

金石国际金融的团队是黄辉毅一手搭建组合的，有些合伙人是之前认识的，有些是听闻黄辉毅在创业后主动找来的。“每个合伙人都可以提供不同资源，客户、资金、澳洲牌照和流动性供应商，这些资源要慢慢组合。”

目前团队有六名员工，在悉尼海滨的 CBD 区域办公，打算 2019 年在墨尔本也开一个办公室。“目前的团队非常精简，以后会慢慢扩张，人才非常重要。”他在西联外汇的四年的时间里亲自带出了八个交易员，现在仍然保持着很好的关

系。“等 12 个月不能聘用原公司同事的限制过去后，如果他们愿意，我会邀请来。”

创业首先给黄辉毅带来的是人脉的爆炸式增长。华人圈子还是常用微信，他的微信好友数相比于创业前已经翻了两三倍；电话仍然是澳洲当地偏好的联系方式，手机通讯录里的电话号码列表也新增长了不少。“周末时不时也要去参加派对或俱乐部活动，晚上的饭局也比较多，要保持和客户的联系。”

黄辉毅一直强调金融的服务性，“用户至上”的理念不容置疑，应爱惜公司名誉。“做任何事情都以客户的最大利益出发，帮客户做对冲时要从他的角度



来考虑，找到最适合的产品向他介绍，而不是炫耀自己的金融知识，强加于客户之上。”黄辉毅认为澳洲的所有企业都应享有更好的金融服务，区别于目前澳洲四大银行水平一般的产品；他也相信凭借自己团队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独到的专业见解和丰富经验，金石财富能成为澳大利亚最出色的理财公司。

“尽管实现梦想的途中有时会遇到困难，要知道这是命运对你的挑战。不是每个人都会赞成你的选择，接受这个事实，并相信自我的判断，追随那颗在你心中闪烁的明星，它会引领你踏上命运的征途。坚持不懈，你就能享受那些幸福时刻。”

Stay Hungry, Stay Humble.

黄辉毅形容自己的生活“是基本停不下来的”。

工作日的早晨，黄辉毅会在六点钟起床，在和家人做早餐、吃早餐的间隙把财经资讯、指数变动阅读完毕；八点到办公室后主持晨会，之后就在客户之间穿梭，或是在办公室观察外汇交易；临近下班时，他需要再次检查公司一日的交易单，作为创业公司的老板，还需要兼顾办公室的开销情况和公司未来发展的探讨；回家吃饭后会继续跟进国际金融市场的动态，有时也会为“澳洲金石财富”的微信公众号写写分析文章。

生活“基本停不下来”不仅仅体现在黄辉毅的工作节奏上。周日下午接受记者语音采访时，黄辉毅正揣着三本澳洲法律相关的书准备到图书馆阅读。“其实我的团队里有负责澳洲信托法律和税制的专业人士，但我自己也想学，我希

望自己能更了解澳洲。”

和人聊天时，黄辉毅也喜欢问别人“你是做什么的”，了解对方的工作流程和专业领域，和人打交道也在获取新知识。“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海绵，不停地吸收新的知识。”

现在定居澳洲的黄辉毅，家庭和事业都在这里扎下了根基。悉尼是一个国际大熔炉，黄辉毅的移民身份并没有成为一堵无形的墙，妨碍他融入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而这种适应能力，他认为“起始于复旦的国际交流项目”。

“中国人、亚洲人是我的 Identity（身份认同），但我在澳洲也不会有强烈的少数群体或者异乡的感觉。”黄辉毅一直强调包容不同的价值观，“Be open-minded”。黄辉毅有一次在火车站下楼梯时不小心把脚扭伤了，就在台阶上坐了下来，这时四五位行人冲了过来，询问他要不要叫救护车。“澳大利亚的文化是仁慈博爱的。”

黄辉毅小时候长大的厦门也是一个海港城市，在悉尼的空气中闻到海水的香就会让他有家的感觉，“很亲切，很舒服”。他希望能把自己的创业公司做得更大，可以拓展到中国，即使“困难可以预料得到”，也的确“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人才”。

“Stay hungry, stay humble。我把乔布斯的话改了改，一直记在心里。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生活，价值观也要保持开放和包容。” **续**

（本文系记者对黄辉毅校友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黄辉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 2004 级本科。现为澳洲金石国际金融董事兼金融顾问。）



黄振兴：让学术和音乐交织的使者

文 / 本刊记者 袁驰

当记者走进黄振兴老师的办公室时，看到在办公桌的周围放着三把吉他。不是很大的办公室里，三把吉他给了记者不一样感受。

“有一句话是我这 30 年的感悟：‘生活是一门权衡取舍的艺术。’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好和坏，但是要了解自己的偏好、特点，知道自己要什么，可以放弃什么才能活得明白、活的开心。取舍之中，知道‘取’比较容易，确定‘舍’则很难，但是是一个人的大智慧往往就看这个‘舍’。我也希望用这句话与大家共勉。”黄振兴在谈到生活时如是说。

思索和收获缔造的经历

黄振兴于 2004 年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在复旦大学进行了两年的学习，就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前往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交流学习的机会。“正是复旦大学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不仅仅能在国内学习到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同时有机会学习到海外的经济学前沿课程；这样既夯实了我的经济学功底，还拓展了我的视野和能力。”

在荷兰的日子里，黄振兴不仅需要适应英语的教学，也要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和学习方式。在荷兰的大学，老师们非常重视小组合作与上台演讲。尤其是管理学的课程，经常要有案例分析，需要用英语演讲，并且还要回答各种提问。这些差异性对于初到荷兰的黄振兴构成了一定的挑战。谈起异国他乡的求学经历，黄振兴的言语中透露出了几分怀念：“我们常常利用假期和自己的好友四处旅行，感受最真切的风土人情，同时大家互相帮助，也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即便毕业这么多年，好友间还有诸多联系”。

“从繁华的上海来到安静的鹿特丹，骑自行车从郊区到市中心也就半个小时。在荷兰，堵车和焦躁很少出现，人也比较少，不过时间长了也会感到好山好水好无聊。从上海到荷兰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体验。”空间的变化并没有对黄振兴带来烦恼，而是积极适应、积极调整，用全身心去体验和感受一个新的环境。

“在荷兰可以更多地面对自我，思考很多形而上的问题；在上海则更适合进行思想的碰撞，有很多同事交流，各种各样的论坛和沟通渠道也比欧洲方便许多。所以如果想要一个人安静地思考问题，欧洲这种小国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要做一些事业，那么上海则更加适合。荷兰这个国家本身非常有意思。它是《大国崛起》介绍的历史大国中面积最小的，但却曾经成为全球霸主、海上马车夫，这说明这个国家有非常强的开拓精神。它虽然国土小，但是想得很大，格局很

宽。大家耳熟能详的壳牌石油、联合利华、飞利浦、牛栏奶粉……都是荷兰的企业。”

因此，荷兰学习和生活的体验让黄振兴有了对人生不一样的思考。

感性 与 理性 结合 的情怀

提起本专业的学习，黄振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经济学本来就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比如大卫·休谟，既是哲学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他最早提出了效用这一概念，也可以算是经济学鼻祖之一。研究经济学的学者都是从哲学那边分支过来的，没有人文积淀不可能发展出经济学思想。”

“亚当·斯密不仅写过《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也是他的名著之一。我们这个时代也同样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经济学研究，数学、统计、计量工具远超过那个时代，但是没有人文的东西很难有灵感，也很难意识到哪些是重要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去读一些跟我们专业相关性不那么高的著作，这与复旦“自由而无用”的思想不谋而合。

“我认为自由是思想自由，无用是无功利主义之用，从而修身养性，找寻自我。在复旦求学时，如同陆谷孙老师说的那样，我读了很多‘无用’的书。虽然不是立竿见影，但是对陶冶情操、萃取思想、提升个人境界非常有帮助。”不仅仅是从众多书本上汲取知识，在复旦期间，黄振兴还时常去听其他院系老师的讲座，感受跨学科文化学习的魅力。听讲座是不同的人在同一个人地方同一时

间进行思想碰撞的盛宴，这也是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魅力所在。

回忆起自己在复旦的学习和生活，黄振兴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张军老师和袁志刚老师的微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外，就是和自己组建的乐队参加“校园原创歌曲大赛”了。

谈起自己的“音乐生涯”，黄振兴也是满满的自豪感，办公室里的吉他也有了岁月的痕迹，可见他对音乐的痴迷。黄振兴开玩笑说：“大学期间在宿舍里，他经常被当成街头艺人，寝室的兄弟们每每听到他的琴声就纷纷向他‘施舍’，场面非常有趣”，这也是属于“203 的回忆”。

其实早在念高中时，黄振兴就组建了摇滚乐队，并担任主音吉他手。本科时，他将兴趣转到了古典吉他上，担任了学校第一届古典吉他乐团团长，多次前往周边高校演出，在高校乐队间也小有名声。留学荷兰期间他也不忘发展、分享音乐，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在当地华人中演出。工作之后，依然可以看到他背着吉他弹唱的身影，在学院新年联欢会上、在学生的生日中、在上海夏至音乐节上，黄振兴用音乐演绎着大学老师生活的多姿多彩！

创新和坚守共筑的决心

2008 年，黄振兴本科毕业，但恰巧碰上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如果这个时候直接进入业界工作，可能未必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还是选择留在学校里继续深造，一方面加深自己的学术积



• 图：黄振兴在复旦校友创新创业沙龙上发言

淀，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不断摸索未来更多的可能性。”因此，黄振兴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黄振兴笑着说：“这就像马尔科夫链，每一个未来的选择仅受当前自己的情况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谈到学术研究时，黄振兴饶有兴致地说起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我研究的方向是‘实验和行为经济学’，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门类，很多学校并没有这样的学科。所以当时回国有一

个很大的顾虑，即是否有足够的学术研究自由，能够让我做想做的东西。目前看来，国内的科研脚步还是能与国际接轨的。”

在博士毕业后两年间，黄振兴连续在经济学界的两大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上发表文章，用自己的方法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样的成绩在整个国际经济学界都极为少见。所以，黄振兴在短短半



年时间内便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

当被问及当初的选择是否是最好的抉择时，黄振兴如是说：“‘好’本身就很难界定，什么才能算是‘好’？是赚的比现在多、活得更有滋有味，还是达到自己的理想？生活中的很多偶然因素决定了将来的结果。如果你真的是人才，那就不是只有一条路才能走通，而是不管走哪条路，无论在学术界还是业界，都有相对而言更大的可能在这条路上取得高于常人的成就。所以最主要还是在于这个人本身，选择哪条路可能反而是次要的。”

在黄振兴看来，现在有太多的鸡汤文章呼吁大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于是就有很多人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找”上，“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便成了不少人的座右铭。然而事实上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尝试每条路后再做出选择。“如果要读不同学科、入不同行业、尝试不同类型的工作后再说做什么最适合自己的，那半辈子就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本身具备的可塑性和适应性，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有能力使这个选择最优化。真正的问题在于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保持自己坚定的信念。在我看来，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享受自己的工作。当你对一个东西完全摸不着章法的时候你会很痛苦，而如果你完全懂了又会感到很无聊。最好的状态是在两者之间，懂了一些，但是依然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去探索，并且会不断带来惊喜。这样的职业才能使人始终保持成长性和昂扬的斗志。”

每个人的抉择可能都不一样，但不

管选择了什么，就要做到最好的自己，正如汪国真《热爱生命》所言，“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晓**

（黄振兴，复旦大学 2004 级经济学本科，丁伯根经济研究所和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博士。目前在上海财经大学担任副教授、院长助理。主要研究领域是决策理论、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



• 图：王帅在伊拉克

客

王帅：磨炼与回归，让未来无限精彩

文 / 本刊记者 甘磊

“那些日子里，见证着美伊战争之后伊拉克满目疮痍的景象，在艰苦而枯燥的环境里不断考验着自己。”提到在伊拉克工作的这些年，王帅在感慨之余，语气之间更多的是轻松和释然。

从复旦经济学本科毕业之后，王帅投身石油行业，曾担任中国石油伊拉克公司商务计划经理，却又在事业顺利之时选择重回象牙塔。“毕竟已经离开学校将近十年了，希望能重回校园接触新知识，认识新朋友，在这个过程中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

“感谢复旦带给我‘自由而无用’的情怀，让我在这个浮躁繁杂的社会里，心灵得以宁静，不断追求卓越，追求着更加精彩的未来。”

复旦：精神和思想的熏陶

王帅来自河南的一个小县城，在200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学四年，我都是靠着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但是复旦让我从一名平凡的学生变得不再平庸，给了我提升自己、追求卓越的源源动力。”

“当年，陆谷孙老先生在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他当时谈到，要准备在复旦磨砺自己的四年，在基本知识技能过硬的同时，要学会广泛阅读，让自己具有充足的知识储备、精神储备、思想储备，突破‘小资’的窠臼，有高远的精神境界。”受到陆谷孙先生的启发，王帅一直努力戒除功利心态，真正去做到“思想自由”。

在专业学习之余，王帅时常去听其他院系老师的讲座，感受跨学科文化学习的乐趣。“讲座是不同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思想碰撞的盛宴，这也是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魅力所在。”当被问及印象深刻的讲座时，王帅谈到了李敖。“李敖当时在清华、北大、复旦这三所院校开设系列讲座，主题分别是金刚怒目、菩萨低眉、尼姑思凡。当时在复旦的所讲的是‘尼姑思凡’这部分，通过大胆而生动的形式，告诉我们要做到思想自由，突破传统的枷锁，要真正具有精神生活上的造诣，不被学术传统所束缚。”

此外，王帅还经常旁听“哲学小王子”王德峰教授的艺术哲学讲座。“我是经济学专业，但实际上经济学发源于哲学，而哲学又是一门生活智慧的学科。哲学老师们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把专业知

识用启发性的、容易理解的讲授方式传递出来，这些内容本身会让人受到启发，但更重要的是，我对哲学知识的爱好在这些不同的讲座之中得到了培养。”

毕业以后，王帅依然坚持阅读这类文史哲的书籍，沿着当时老师启发的方向，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其实身为复旦人，多读一些书，就更能在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保持内心宁静，以踏实的态度为人处世，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在复旦，王帅认识了许多有理想、思维活跃、努力奋斗的同学，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多启发和收获。“当年我有一位关系很好的同学叫张寅，他在经济学本科毕业之后，到哲学系攻读硕士和博士，现在正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做老师。当时我们俩一起参加了很多哲学系的专业课、选修课和讲座，一起讨论过很多哲学上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生与死、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等等，甚至还有很多异想天开的概念。当然后来我选择了工作，而他在哲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其实我身边很多关系要好的同学选择从事学术研究，他们会对我们业内的生活方式感到好奇，我之后也常与他们交流伊拉克工作的感悟。”王帅提到，学术圈的氛围与行业内相差很大，前者需要精益求精地深入探索，发表新的研究成果，而后者更偏向“做生意”，需要不断去拓展市场、增加行业利润。“但是这其中还是有相似点的，比方说 networking 层面，无论学术圈还是行业内，都需要一个人不断去拓展关系网、社交圈，积累人脉。”

伊拉克：身体和心灵的考验

本科毕业之后，王帅并没有选择诸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从业方向，而是跻身石油行业。“其实第一份工作的选择，有时候考虑得并不是特别深刻。我当时觉得石油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业，在整个国家的能源战略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选择了中国石油，毕竟这是世界五百强的国企，进去之后也会有很多机会。”

毕业后，王帅的第一份工作去了黑龙江大庆，在中国最北部的油田工作了一年半。后来便到了北京，接受了七八个月的培训之后被外派到了伊拉克。中国石油和英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首次合作开发大油田，这让王帅深切感受到，这个平台真的是整个中石油最高的平台，因此，王帅也倍加珍惜这样的机会。

“在去伊拉克之前，我读过一篇报道，其中谈到当时中国石油每年需求量当中的 50% 以上都要靠进口，而国际油价很高，整个国家石油能源十分紧张。但作为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之一，伊拉克能够把油田拿出来对国外招标，我顿时觉得这是一个广阔的空间。另外，中国石油公司第一次和 BP 合作，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西方石油公司的运营方式，对比中西企业管理模式的差别，这真的是很好的机会。”那时的王帅 23 岁，经过层层考核与选拔，成为了中石油第一批进入伊拉克的 13 名员工之一。

抵达伊拉克之后，王帅表示，那里的景象真的令人触目惊心，放眼皆是一望无际的大荒漠。当时，美国还没有完全撤军，因此王帅一行人并没有办法直

达此地，只能先从北京飞到迪拜，从迪拜飞到科威特，再从科威特乘坐小型私人飞机到达伊拉克。每当从飞机上俯视时，王帅都能发现这里除了石油工业以外什么都没有。地表是一望无际的大荒漠，上面立着一口口油井，冒着浓浓的黑烟。

在抵达之后的第一时间，西方安保公司的保安便为新来的员工们介绍基本的安全情况，为王帅等人戴上防弹头盔，穿上防弹衣，并用防弹车将一行人拉到营地。这一路，美军的黑鹰直升机、路边被美军破坏的坦克残骸，处处可见。这是王帅头一次觉得自己与战争距离这么近。

王帅说：“那段日子，我们住在营地里，平时没有特殊情况不允许出去，毕竟外面真的不安全。营地是用高强度的铁网围出来的，外面有很多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保安。我们除了工作就基本没有娱乐活动，空闲的时间就锻炼身体。那几年，我养成了跑步的习惯，基本上没事情的话就在营地跑跑步。”

根据当时的工作制度，在伊拉克工作 28 天之后能够回国休息 28 天。而在伊拉克的 28 天内，王帅基本上处于“工作 + 吃饭 + 锻炼身体”三点一线模式当中。“这其中也会有很多突发情况，比如说宗教信仰方面的矛盾。我们曾经赶上了当地的斋月，白天需要禁食，不吃饭不喝水。”

2014 年，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迅速占领了伊拉克的北部，并且开始屠杀政府军。王帅等人也因此全部撤离，只留下几个人看守营地，维护油田。直到美国宣布出兵伊拉克，并且 ISIS 攻打



• 上图：伊拉克的坦克残骸

下图：王帅在伊拉克所在的营地

首都巴格达出现瓶颈之后，王帅才得以在伊拉克南部继续工作。那次撤离的景象令王帅感到非常震撼。

“整个机场平时几乎见不到人，但是撤离的时候真的是人山人海。基本上所有的石油公司都从那边紧急撤离，BP当时租了七架飞机，用两天的时间把员工一班一班的都带到了科威特，之后我便飞回了中国。当时真的是仓皇逃脱，完全没想到 ISIS 来得这么快。很多人撤退到伊拉克境外之后，才从电视台关于‘伊斯兰国’的新闻报道中得知形势有多么严酷，回到家后仍然心有余悸。”

“尽管时常会觉得落寞与危险，但这种身体与心灵的磨炼让我成长了很多。我们在伊拉克所开采的原油都是尽量运回中国的，这些年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为祖国做贡献，我感到十分自豪。”此时的王帅，将多年以来的孤独、艰苦与凶险藏在心里，话语中有着掩不住的沉稳与释然。

香港：象牙塔里再次构筑的未来

多年的历练让王帅感觉十分充实，但他在事业的上升期毅然选择了回国。“我毕业之后基本上一直在伊拉克工作，和妻子长期分居。时间久了，还是希望能够回到中国，和妻子一起工作和生活，享受家庭带来的乐趣。”

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王帅已经 30 岁了，希望能够在新的领域闯一闯。于是他选择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 MBA，重归象牙塔，接触新的知识。“毕竟已经离开学校快要十年了，我希望能够在

学习过程中认识新的朋友，去想一想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

王帅坦言，在离开石油行业之后，他自身有时候也会很迷茫，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而 MBA 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专业，会涉猎关于投资、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很多问题，未来做各类工作基本上都能适应。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复旦的学士学位再加上 MBA 的学历，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是非常占优势的。

“以前工作的时候就像车轮一样一直在转，随着业务能力的提高，所需要负责的工作也越来越多。刚开始想要离开石油行业的时候，领导希望我能够留下。但是我觉得不能局限于这一个地方，人生还有更多精彩的未来需要去开发。”当然，在攻读 MBA 的前三个月，王帅依然在协助一小部分工作上的事务。“毕竟身为业务骨干突然离职了，有些工作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交接的。”

被问及重回象牙塔的感受时，王帅表示自己还是有很多需要适应与转变的方面。MBA 课程很紧张，但王帅的记忆力已经不如本科阶段，学习能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强，因此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自己放下了相对熟悉且有一定成绩的工作，重新走进校园就真的需要从零开始。

但身边的同学来自不同的行业，这终将可以帮助王帅开拓视野。当王帅在和他们交流的时，他能够了解新的行业。此外，在本科学习的时候，关于项目管理、公司技巧、战略管理等方面的实践技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而 MBA 阶段会对这些技能进行专门培训，这对



• 图：王帅正在讨论石油工作

于王帅未来的工作而言非常重要。

王帅说：“未来的自己，依旧会不断地追求卓越，坚持进步，不断地学习。在香港科技大学学习的过程让我找到了久违的学习乐趣，以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还想继续深造，读 EMBA 或者博士。”

无论是复旦的精神熏陶，还是伊拉克的艰苦磨炼，抑或是香港的继续拼搏，都让人深刻感受到王帅沉稳与踏实的个性。而身为永远的复旦人，这种“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与“沉稳而踏实”的个性互相交融，让他不断求索，开创着更加充实而美好的未来。 **瞭**

（本文系记者对王帅校友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王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004 级经济学学士，曾任中国石油伊拉克公司商务计划经理，现于香港科技大学攻读全职 MBA 工商管理硕士。）

• 图：2015年2月民生村镇银行年度工作会议照



文静：非典型性经济学人的蜕变

文 / 本刊记者 马恺昕

我的存在，是一个永久的惊奇，而这，就是人生——泰戈尔

复旦对文静来讲是一个独特的梦想成真的地方，在经济学院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文静写到：

踏莎行·经济学院三十周年院庆感怀

旦复旦兮，涛涌江沪，厚德载物拿云路，人生幸得入此门，沧海恒沙心念福。

桃李不言，绿溢秋浦，龙跃千里传尺素，卅载光华鸿儒耀，鲲鹏济世无穷数。

从祖国的西北边陲一路走到东海之滨，从中学英语教师、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再到一路转型经济学研究，然后长期专注于金融业的实际操作，文静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努力，正如她个人所言，“（前进）路上只要足够努力就已经没有人和你PK了，远远没有到拼天赋的程度”，这位非典型性经济学人一路从主修地理的英文教师到历史地理研究的跨越，到经济学博士生涯的求学，再到努力前进成为银行的高管，她的不服输与奋斗的品质是从新疆通向上海的最近航程。

从学子到园丁到学子

从新疆走到上海，从为人师长到从事经济学研究，“我觉得这个倒蛮有趣的”，文静这样评价过去的日子。

文静的父母青年时期自愿支援新疆，举家从湖南搬到新疆西南部的边境城市喀什。文静就在新疆出生，在新疆长大，“我们的隔壁邻居都是维族人，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和睦的，经常串门吃饭什么的，挺有趣的”。但是不安于现状的文静在高中时期就坚定了一定要考到“关内”去的想法。但是个人的努力也会被客观条件所制约。不得不承认，在世纪之交时全国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资源仍存在极大的不平衡，喀什的教育资源确实存在不足，文静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在高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报考了新疆师范大学和“关内”多所高校。

但是在录取的时候，文静并没有如愿考出新疆。和当时的所有考生一样，文静在学校与专业栏中都选择了服从调配。新疆师范大学作为当时的国家重点高校，看到文静优异的简历和服从调配的志愿，果断以地理学专业录取了文静，而不是文静所填报的数学系。文静对这件事情记忆十分清晰，“当时新疆师大管招生的那个人，后来她是我的班主任，她说我看到这个简历以后，就是这个档案以后，觉得特别好”，因为当时在喀什二中这所喀什最好的高中里，文静是三好学生，高中就在文静的档案中贴了红标签，后来，那位招生老师说，“一看到这个标签，然后一看里面都写的可调（服从调配），就直接把我（的档案）拿走”。以至于她自己想上的大学连档

案都没有看到。“所以说我的人生，其实就等于在冥冥当中就走向一条不在自己掌控范围之内路”，文静这样回忆到。

但是初入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当时正在大兴土木，环境比较嘈杂，并不是文静所希望的样子。最初文静是想过要复读的，但是父亲的话让她有了更大的动力去努力改变现状，“我记得我爸当时回信说，‘你如果真正厉害的话，你就从你这个地方站起来；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于是文静就想，既然已经是这样一个结果，要面临这样一种状况，“我就要靠我自己的努力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在大学四年的所有课程中，文静做到了一个几乎是“奇迹”的事情，大学四年除了一门因为生病没能全勤所以扣分的课程，文静几乎取得了所有课程的第一名，成为妥妥的学霸一枚。所以文静特别感谢她的父母，在新疆支边的四十多年的岁月中，他们虽然历经生活的艰辛和磨难，但是始终以一种坚韧乐观的精神积极影响着家里的孩子们。在英语的学习上也是如此。“到师大之后，我心想就学习而言，反正我肯定没问题，那就不管是专业课也好，公共课也好都要创造奇迹”。新疆的教育在九十年代并没有开始注重外语的教学，但是文静凭借优异的成绩在大学的第一学期就考过了英语四级，第二学期考过了英语六级，这在二十七年前新疆的大学校园里是件颇为轰动的新闻，一时人人都想见见这位“传奇人物”。回忆起为什么在一个并不重视外语教学的时期努力学习英语，文静对高中时期受到的“打击”记忆颇深。“我当时在高

中的时候，其实英语开始时是中等偏上的程度”，当时班里文静和另一个女同学的英语程度不相伯仲，但是在报名参加只有一个名额的英语比赛时，老师却选择了那位女同学，“因为这个事情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我非常的生气，于是我跑去问老师，‘那您借了什么书给她看？’”文静在拿到老师给的语法训练书后没日没夜地做书上的练习题，“这是我这辈子人生第一部从头到尾的4厘米这么厚的一本书，所以后来我到了大学之后，英语自然很好”。在大学的最后两年，不满足于现状的文静又去新疆大学参加了英语专业的自考并获得了英语专业的文凭。

高等数学的学习，也说明了文静的“不安于现状”。她通过一个寒假不回家的办法，一个人天天在宿舍里刻苦自学，终于达到了高等数学免听的要求。这样努力下来，在大学中，学业自然不会成为文静的烦恼，也给了文静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学生工作，拓展个人爱好。

文静常讲，“我的人生就是一条上升的轨迹，一步一步地不断挑战自我。”在新疆师范大学，文静在最优秀的学生组织部门——女工部（女生工作部）中担任副部长，负责各类大型演出的组织工作，比如三八汇演系列活动、“一二九歌会”等等，这对于文静来说是十分锻炼人的，在之后进入社会中也给她带来了优势。“当时我本来也没想过自己能干嘛，我从来没想到我一定会到复旦去，或者我一定要干到研究生会主席团，但我会发现我一努力就有所收获，一挑战就有所得。所以呢，人生还是要不安于现状，不断的勇于尝试”，文静笑着说。

在大学，文静也学到了一门特别的技艺——吹单簧管，俗称黑管。进入学生会工作后，“我会看别人都在忙什么”。文静看到有一位学姐在打架子鼓，“我当时简谱都不会，更别说是五线谱了，所以我一看就想了解一下，我当时就买了一包瓜子请她吃”，由此了解到学校有一个40人规模的校管乐团。乐团的指导老师问文静，“有音乐基础吗？五线谱会吗？”，文静说，“我保证两天之内搞会”。可能是老师特别欣赏她的勇气，于是，文静作为唯一一名女生入选黑管乐手组，如愿进入了校管乐团，并且很快在八个人的黑管组中成为首席黑管乐手。乐团后来也在全省的大学生艺术节中拿到集体二等奖。

大学四年级面临分配工作，按常理应该是喀什考生回到喀什就业，文静遇到了一个宝贵的留在乌鲁木齐市的机会。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始招聘教师，但文静主修的地理专业教师已经招满，英语教师还有一个空席。文静具备了所需要的英语考级证和专业文凭，和许多英语专业的同学同台竞技，根据实堂授课情况择优录取。“我上去给学生们讲完一节课以后，（听课的）老师们就都离开了教室，因为要听两节课，我心里还有点发慌，我想可能是讲的不好老师们就不浪费时间听了，后来才知道，人家说听完一节课以后不用听了”。所以这唯一的一个教师名额就选定了文静。三年的教师生涯，文静付出了很多，但更学到了许多，也赢得了学生们和家长们的认可和尊敬。“因为我的梦想还是要过黄河、过长江去。”不安于现状的文静说。于是就在四人一间的教师宿舍



• 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7年专业学位活动日合影留念

内，文静又开始了她的考研之路。

从新疆到上海到复旦

在选定复旦大学为目标之后，1996年的文静与复旦失之交臂，以五分之差落榜。“我当时想了想，那就再考一次，就给自己说再考不上就不考了，也算是逼自己一次。”后来同宿舍的同事回忆起文静备考的日子，想起有一次起夜，看到文静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看书，“我自己其实都忘了”，文静笑着说。1997年，文静如愿考取复旦大学史地所。“我确实认为勤奋能够弥补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人生的差距，比如遥远的距离，从新疆跨越到上海的这个距离，你看我的同屋给我提起的这个例子，当时我根本

不觉得苦，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和充实，觉得能学到很多东西，更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视野，甚至改变整个人生。”

但是笔试通过后并没有一帆风顺，文静因故不能按时赶到上海参加面试。于是文静想到一个方法，她向当时的史地所所长葛剑雄先生求助，给他打了电话说明情况，热心的葛先生为文静想到一个方法：进行一次公对公的加试，最终文静通过加试如愿进入复旦大学，“所以说，在这个世界的帮助之下，奇迹都会眷顾竭力争取的人们”。

在史地所中，同学们的史学功底都十分扎实。作为地理专业的文静相比历史系的同学仍然存在短板，于是她分析了自己的长短板，努力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在保证课业的同时，文静开始锻

炼自己写作的能力并发表了多篇论文，最终获得了“谭其骧—禹贡基金”奖学金，“其实天天与古籍做伴，过程还是很费劲的”，文静苦笑着承认。在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中，文静延续了一直以来“学霸”的特点，几乎包揽了各大奖学金与奖项，“其实奖学金都够我三年的生活费了”，文静笑着说。

在史地所的这三年，文静除了将学业搞好，也积极地参与到复旦大学的学生工作当中，成为研究生学生会主席团的一员。“我一直强调的就是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用到能够让自己价值提升的地方去，能够在为自己增加闪光点方面去做一些努力”，文静也是一直这样践行着的，除了学习，学生工作与合唱、社会交往方面她都愿意去花费时间和精力，让自己因喜爱的、擅长的事物而使自身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成为一个自带光芒的人。“可以供学弟学妹们借鉴的是在社会上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文静补充道，“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的束缚，而且我认为一定要打破这种束缚，破茧成蝶”。

文静分享的另一项人生经验是勇敢去尝试新事物。在研究生阶段，有一个要求英语程度好的市场营销实习机会，需要开展市场营销和调研的工作。文静当时也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但是她想“何不试试呢”。后来文静在这家知名的德国公司市场部上了近半年班，写成多篇关于市场营销和市场竞争方面的全英文报告，所在上海公司也因此被德国总公司表扬。提及这段经历，文静说自己每天都是一个人从早忙到宿舍熄灯前回去，形容为“特别、特别孤独，体会

到了孤独是一个人的狂舞。尼采的那句话说的真好‘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但是也因此收获到了许多。这也是文静第一次深入接触到经济管理方面的相关内容。

从地理到经济到金融

硕士学习期间，文静一直在反思和寻找自己真正的兴趣点在哪里，也一直思考未来的职业取向。文静承认自己仍然有着喜欢与人打交道，喜欢与各种各样创新事情打交道的性格，从这个角度看文静自认为并不完全适合历史地理研究。所以研究生二年级时，文静开始考虑转变专业方向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段，文静遇到了一位后来成为她爱人的男生。他们是在研究生合唱团认识的。他是山东人，他的父母也是青年时期支援三线建设到了重庆，他也是不安于现状辞去了一家国有大厂的管理职务，考上了复旦大学研究生并在上海发展。共同的爱好和相似的经历让他们逐渐走到了一起。他们经常在一块儿交流未来的发展，人生的定位，在深思熟虑后，文静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金融领域，她决心已定。文静坦然告诉葛先生，“感谢葛老师给我一个做学问的机会和平台，但我发现从事史学学术研究确实不太适合我的性格。我的性格不是那种极其沉稳的可以坐得住的”。

每谈及此，文静对葛先生满怀感激，“作为一个大家、一个大师、一个老师来讲，他是非常尊重人的个性和一个人的自我发展需求的”。还有硕士时求学



• 图：2015年7月台湾省日月潭的游艇上畅想

的引路人——恩师满志敏教授和张修桂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陆德明先生都于她有再造之恩，她一直深深铭记在心。文静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度过六年的复旦生活的，她永远不会忘记留在复旦的人生路上风雨兼程的足迹。她说：“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复旦都教会了我许多。于人生前行的途中，这会化成一种力量使我能明辨平矜释燥于人生每一个迷惘的十字路口。可敬的先生们，虽于斋室的方寸之中，然捭阖于时空的万里之遥，甘守寂寞，乐此不疲，以执着的精神，言传身教，分享其丰富的思想容量，敏锐的思维能力，让学生们不仅体会到了知识的责任，渊博的份量，更收获了切身思考的果实。”回想自己的心路历程，文静感慨地说：“如果从大学

毕业的时候算起，一直到真正明确了自己的人生职业方向，整整花了九年时间啊！”总结自己的学习生涯，文静总结说，“不断地挑战自我，去做符合自己的个性和自己优势的东西”。经济学博士毕业后，文静决定在金融行业求职工作，在众多选择中她选择了进入中国民生银行。

初入民生银行时，文静从事零售银行方面的工作。文静仍然记得当时是上海分行自助设备规划投放岗位，“当时为了干好这个岗位，刚学会开车就满世界的开，要确信找到的是合适投放自助设备的地方，我要研究出来哪个地方自助设备能赚钱，哪里会亏钱”，文静在做了充分的调查之后做出每月的自助设备运行报告并提出增撤的建议，当时的

行领导说“这才是我想要的有理有据的方案！”文静说：“人呢，在一个岗位上，不要天天去想一个更好的（岗位），你要把眼前的这个岗位做好，做好了以后自然会有人看到你的价值。”

后来，文静在民生银行一干就是十三年，凭借出色的才能和努力她的职位一步步上升，先后在九个部门工作过，从零售银行做到资产评审，在管理岗位上再做到公司部、机构金融部（新设筹建）、产品和业务创新部（民生系统内唯一一个部门，新设筹建）、票据中心的总经理，在市场营销方面做到卢湾支行行长再到上海分行闵行管辖行行长（下辖14个一级经营单位，包括7家一级综合支行、4个平级公司业务部、3个直属公司业务工作室，再到总行董事会战投委村镇银行管理部负责全行二十多家村镇法人银行的营销推动工作。一路走来，文静对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都心怀感激，也在积极的帮助他人。在做支行行长时，文静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小姑娘。当时那个进来的小姑娘处在失业的边缘，如果再做不出业绩就会被辞退，文静就亲自带着她去跑项目，帮她超额完成了任务。“我成长到现在，很多人（帮助我）都不计较回报，许多情况下我也没有办法回报，那我就要把这份回报、把当时给予我的恩德反馈给社会；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流动的池子，你以后有能力了一定要再去帮助别人”，这就是文静告诉她所帮助的人的话。在民生银行的十三年里，文静不仅带领着自己主管的部门、支行、管辖行取得了能够达到的最佳业绩，同时也帮助民生银行的同仁们拓展业务、新建部门，使

他们的职业生涯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两年前，文静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出于想更多陪伴家人、感受新的环境与事物，文静决定来到一个新的领域，也就是现在所在的城市商业银行任两个一级部门的副总裁。股份制上市银行与法人银行有着许多的不同，从运转方式到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方式都给文静带来了新的感受。对于这样的变化，文静认为，“每走到一个阶段，你不管是一个岗位，或者一个单位、一个项目的完成，我一直个人主张要静下心来很好地复盘，这样就能发现自己在哪方面不足要补齐，在哪方面更好要保持。”

纵观文静至今的职业生涯，从英语教师转换至研究历史地理最终研究经济学，文静着实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文静相信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擅长、喜爱做什么事情的，只是起初有一个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的简单目标，于是她努力摸索到一个更好的更先进的地方去，与更加优秀的人在一起。她认为：凡是大家认为最好的领域里面一定是最优秀的人才最集中的地方，如果要比就和最优秀的人才比，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不断地挑战自己，成为更加优秀的自己。“我是属于那种始终会要去接触一些新的东西的、不断地学习、挑战自己的那类人”，不断地换新领域、学习新知识在旁人看来也许很苦，但是只要是自己喜爱的、符合自己期望的新事物，而且只要明确了自己的努力方向，就一以贯之，奋发有为。文静享受并且感恩着这些经历。



• 图：2015年2月民生村镇银行年度工作会议照

从职业到生活到未来

文静 2015 年开始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校友会常务理事；2016 年 3 月被聘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职业生涯校外导师”；2017 年 1 月被聘为复旦大学金融学专业研究生专业导师，希望能为母校多做一些事情。

在文静的业余生活中，文静也培养着自己的收藏爱好，“我经常出差忙完了之后一个人打个车跑去当地出名的各类市场逛逛”，文静笑着说，同时也会每年为自己安排出游计划了解世界。

文静的先生如今已是资深投资人。“他特别理解我，坚决支持我的每一个重大选择。他时刻分担着我的喜悦和苦恼，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我简直想象不出将来会是怎样。”文静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感激，秀气的脸庞上挂满了幸福宁静的微笑。文静认为理想的婚姻关系是舒婷在《致橡树》中描写的那样，双方在各自的道路上成长、发展，“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红硕的花朵……”但“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在工作和职业生涯中，文静始终被认为是一个女强人，但她并

• 图：2014年7月加拿大贾士伯公园



不认可这个称呼，而是更愿意做一个贤妻良母，虽然达成这点不容易。在孩子的成长中，文静充分尊重儿子的个人想法，“我觉得孩子还是要按照自己的个性这样去发展”。儿子的长处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更早体现了出来，一进初中就显现优秀的社会组织能力。“后来他自己要去上辅导班，自己连办学机构和课程都找好安排好了，说妈妈你只要带着钱帮我去缴学费就好了”，文静笑着说。

文静也着重强调对于孩子眼界与阅历的增长，乐于带孩子去世界各地感受不同的风景和文化。“是不可以去左右他的生活的，不可以去控制他的，我们家长就是提供一些我们过来人的经验，路还要他自己走，对吧。”

在未来，文静已经有了清晰的人生规划，继续努力做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文静一直在践行着。于文静而言，所有的感恩，这不仅仅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对于付出的所有的努力，这不仅仅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 **竣**

（本文系记者对文静校友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文静，复旦大学史地所1997级硕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0级博士。曾任民生银行上海分行下辖大区行行长，现为海峡银行资产合作管理部兼上海研发中心副总裁。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校校友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职业生涯校外导师”；复旦大学金融学专业研究生专业导师）



“逐梦者”赵雪芹：在命运的安排面前，从不认输

文 / 本刊记者 韩可欣

交易员出身的畅销书作家塔勒布在他的《随机骗局：潜藏在生活与市场中的机率陷阱》一书中，调侃了那些自以为是的理性人：世界以其秩序存在的同时，也遍布难以推演预料的随机性，而生命的机缘恰好源于不确定的未知。

赵雪芹深谙此理。从贫瘠的小山村考上大学，从大学讲师到经济学博士，从证券公司首席分析师到基金公司联席投资总监、研究总监，她对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着清晰的目标。因为在命运的每一个关口，她都紧紧抓住了机会，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

勤恳做事，无愧初心，这是她的处世之道。

走出黄土地，奔向大学的农村姑娘

赵雪芹生长于山东省莱阳市的一个小村庄。在那片黄土地上，贫瘠的物质生活将人们磨炼得坚韧而又无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每户都有了自已经营的土地。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都选择让孩子早点辍学，初中毕业之后就下地劳动，帮助家里到责任田里劳作。

但赵雪芹的父母是时代中的一股清流，哪怕咬着牙对抗艰辛的生活，他们也选择让孩子们继续读书。正是他们的选择让孩子走上了和大多数同辈完全不同的命运，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赵家四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为了多挣钱给孩子们交学费，赵家父母不仅承包了十几亩责任田，还承包了桑园养桑蚕。农闲时，父亲做家务，母亲靠自学的裁缝手艺给别人做衣服。为了供养孩子们读书，赵家父母一年四季昼夜劳碌，为此，赵家常遭到村里人耻笑。

赵雪芹幸运地碰上了一对有远见的父母，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长大成人。

人生的前二十年中，农民的淳朴构成了她对这片热土的深厚情感。她至今与一些小学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民风中特强凌弱的一面，也让她深刻地感受到农村的矛盾。

她形容自己的父母“与农村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们从来不与其他村民一样“乱嚼舌根”，也不将乡亲的嗤笑放在心上。从外县嫁入赵家的母亲，由于口音不同，常常受到村里“恶妇女”的排挤。“她们用各种类似小孩之间的编排来挤兑我妈妈，但我妈妈对他们真是特别大度。”母亲宽广的心胸被幼年的赵雪芹一点一滴看在眼里。

在尊崇知识的赵家，读书是孩子们的头等大事。在赵雪芹眼里，“终身学习型”的母亲是她的启蒙导师。1960年左右，她的母亲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山东省电力学校，成为了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女性。但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赵



母仅仅读了一年多的书，便被迫回家了。如今，八十岁高龄的母亲仍然笔耕不辍，经常读书学习，还跟着电视节目学习针灸手法。赵雪芹还将母亲的写生素描收集起来，已经有厚厚的一摞：“画得很好的！每次看着都想哎呀我妈妈都成画家了。”

如果说赵雪芹性格中坚韧的部分来自母亲，要强则是父亲给她最深重的影响。“我爸爸做什么事情都不愿意落在别人后面。”作为农民的孩子，她一直强调着自己是“只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做好工作。”

在赵雪芹中考那一年，她的很多同学都是为了跳农门选择直接考入中专学习，因为这样能快速改变“身份”，拿到城市户口。但赵雪芹不愿意这样：因为她的哥哥考上了复旦大学的历史系，她希望能追随哥哥的脚步去高中学习，最后进入大学——在填报中专志愿时，她选择了一个几无可能录取的学校，最终果然落榜，她便如愿去高中继续学业了。“本着录取不上的心态去报的，没录取挺高兴的，就比别人晚了一个月去上高中。”赵雪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父亲理解女儿不服输的性子：“你老这么不甘心，就去读高中吧！”于是，她进入了重点高中莱阳一中，三年后又以远远超过录取分数线分数被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录取。

这个从小被父母教导“有本事就要走遍天涯”的女子，就这样跳出农门，迈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这个北方姑娘首次的人生选择上展现了她从不屈服的性格。从选择读书到坚持考大学，她从不向周围的“大流”低头，而是赌上了一

切去追逐她的“大学梦”。

七年复旦，人生就此大变样

本科毕业后，赵雪芹成功分配到在山东经济学院任教，从助教做到讲师。三年后，幸运的大门再次开启，赵雪芹得到了一个来复旦进修的机会。她没有想到，这次进修会让她和复旦结下三段共七年的不解之缘，甚至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

“来了没两天，我就觉得我肯定是要考研的。”在复旦深造成了她新的梦想。

也是在这一年里，她开始拼命选修经济学方向的课程，向着自己兴趣进发。

九十年代的复旦人，既保留了八十年代意气风发的理想主义情怀，又独有九十年代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在复旦的七年对赵雪芹的影响，是“渗透到血液中”的。

1994年，赵雪芹在复旦经济学院就读外国经济思想史方向的硕士。当时的南区是硕士与博士的大本营。在智能手机与手提电脑尚为奢侈的时代，学生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与第六教学楼，读书成了消磨时间的不二选择。“当时大家都非常勤奋。”她说。

求学期间令她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在复旦南区自修室的那些个冰冷的冬季，南区自习室靠窗的位置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暮冬时节，雪从窗户里飘进室内，在角落里结成的冰长久不化。“靠窗的座位有太阳所以暖和，早去晚归才占得到。”来自北方的她日日裹着



• 图：赵雪芹参加校友活动

一件厚重的羽绒服来抵御寒冬。她将那时在太阳底下读书称作是“奢侈的事情”，又提及冬夜只有往被窝里塞个热水袋才能睡着。回忆起当时的趣事，她眼角眉梢都带着笑。

更多的记忆是关于学术研究的。她反复提及自己“真正的学术入门”是从读硕士开始。她的硕士导师、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老师所教授的实证研究方法让她至今受益匪浅。为了硕士论文的国营企业改革这一研究课题，她数不清去国企实地调研了多少次、她清晰地记得导师多次提出建议，还有张辉明老师一次次帮她联系到企业调研。从此，她将实证研究变成了自己日后研究的重要方法，特别是在从事证券行业研究后，更深深体会到了实证方法

打通行业公司研究的“任督二脉”的甜头。

“这种方法在后来工作里做行业研究，做投资，都是适用的。直到现在我还会经常去回顾当时的研究方法。”工作后，她第一次去调研一家名叫大连圣亚的旅游公司，连珠炮似的问了五十几个问题。多年后，当时的公司负责人见到她的其他客户，还提起赵雪芹“把我都问干了”的景象。“就是一种做事锲而不舍的劲儿。”她这样概括。

读完硕士回到山东经济学院继续任教了两年，但她始终无法忘记复旦的校园，无法忘记两段复旦经历给她带来的种种。于是，她写信给尹伯成老师，希望在他门下攻读博士。“尹老师像老父亲一样关心我们，当时我收到他的回信，

满满当当手写了一页，说欢迎我考，鼓励我好好学习。”

这一选择对于赵雪芹来说并不容易。此时选择备考博士，不仅仅时间很短，还意味着她要在一定时间内完全放弃家庭生活。此外，选择考取博士也意味着家庭生活将会大变样，自己、丈夫和孩子未来的命运都会从按部就班变得不可捉摸。

“我只有 81 天时间复习。基本上 all-in 就是全部时间都在学习，除了稍微回家吃饭活动活动。”赵雪芹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状态。她狠下心，将只有八个月大的女儿留在家中由母亲照料，自己从早到晚在办公室学习，“一出家门我小孩就哇哇大哭，哭得我一身汗，但也没办法啊。”除了回家吃饭，她将全部时间花在梳理各科知识上，考完之后大病一场，生了带状疱疹。最终，她成了 1999 级尹老师门下的博士生。

在她看来，复旦的每个老师都是熠熠生辉的。张熏华老师教授的政治经济学，期末的考核方式是面试，“提一个问题他不满意，再提一个，问得越多分越低。”即便是在这种严苛的评分标准下，赵雪芹仅仅回答了两个问题，就圆满地结束了考试。还有上课妙语连珠的年轻姜维老师、经济学泰斗蒋学模老师、九十年代最流行的产权经济学教授张军老师等等，都令她至今难忘。

进修一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这七年的复旦时光让“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精神深深嵌入她的骨髓。她将在山东大学读本科的自己形容为“懵懵懂懂的孩子”，而复旦给了她严谨的治学思维，让她在学界闯出一片

天地；复旦还给了她入世情怀，如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成了她未来几十年苦心思索的命题；复旦的师长则以温厚谦和的人格与渊博的学识，成为了她日后为人处世的楷模。

全力向前，发现金融新世界

日本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曾说：“要加倍使出全部的力量往前冲，不要回头。如此一来，你将可以看到原本看不到的东西。”赵雪芹便是这句话的最佳实践者。博士毕业的她已经 35 岁了，带着三四岁的孩子，她原可以找一个教职，安安稳稳地过着悠闲而学术的日子。

然而，赵雪芹再次选择挑战自己。这次她的目标是——金融行业。

在博二的时候，师兄介绍赵雪芹去了券商，这让她迷上了这份充满挑战性的行业。而对于博士毕业已经 35 岁的赵雪芹，选择这个行业绝非易事：券商们偏爱学习能力强、抗压能力强的年轻人，赵雪芹的年龄和背景并不占优势。

转机发生于一个复旦校友的帮助，让赵雪芹成功获得了海通证券的工作机会。这使得她倍加珍惜这份机会，“进去之后别的不说，学习能力还是有的。”

博士毕业后，她历任海通证券社会服务业首席分析师、中信证券商业零售及旅游行业首席分析师、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等职务，在卖方研究中深耕了整整十四年。

“白加黑，7*24，我这十几年一直在干两份工作。”赵雪芹自嘲如果用这个词形容自己的一生，就是“劳碌”。



• 赵雪芹(前排左三)前海开源基金管理公司研究部合影

在海通证券的四年，她白天做机构销售交易部的工作，晚上则研究各个行业。加盟中信证券后，她又同时研究旅游行业与商业两个行业。现在，作为基金经理的她还兼顾行业研究管理工作。通常情况下，这都是两人份的工作量。

十几年倏忽而过，超额的工作量让她落下一身职业病。从 2002 年起的十年间，她经常早上七点到办公室，晚上十点离开，几乎未早于 24 点前睡觉。长期盯着电脑工作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腰扭曲到走路都有点不对称，脸也肿得跟个烂桃子一样。查不出病，

就是因为太累了导致免疫力低下。”

2012 年，除去在沃顿商学院进修的三个月，她在剩下的 270 天里飞了 107 个航段，坐飞机对她来说和坐公交一样普通，机场成了日常工作场所。作为卖方从业者，一天辗转多地进行路演是她的工作常态，“比如在美国的时候，早上从纽约出发到芝加哥给客户路演，下午再到堪萨斯再讲一场，晚上再飞华盛顿。”

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工作狂属性，“说实在的没觉得累，因为天天接触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只觉得很亢奋很有意思

思。”她对这个行业保有着持续的激情，“我觉得我挺适合干这行的。”

去年的“十一”长假，她是在电脑前度过的。六天时间里，她仔仔细细地筛选了A股市场全部的三千多只股票，从不同策略角度选出了一个拥有一百只左右股票的股票池（作者注：即基金投资对象备选库）。“放长假才能静下心来，没有外界的打扰才能好好研究。我觉得这六天时间过得很快乐啊。”

虽然入行时已经是35岁的“高龄”，她将此当做“厚积薄发”的契机。“毕竟比刚毕业的研究生多好几年的阅历，虽然起步晚，但是成功相对快一些。”

在分析师从业期间，赵雪芹曾获得新财富白金分析师。这是只有连续7年获得新财富分析师才能得到的封号，国内获此殊荣的分析师寥寥无几。此外，她囊括了水晶球奖、金牛奖、汤森路透StarMine全球卖方分析师等业内众多权威奖项。

2007年左右，作为分析师的赵雪芹刚刚成名。此时正值股票市场一片飘红，有买方机构试图利用她来修改报价报告，以操纵股价，从中牟利。对此赵雪芹断然拒绝，“我是靠自己的职业操守赢得市场的尊重，挣钱只是结果，并不是目的。”随着口口相传，赵雪芹刚正不阿的形象在圈子中树立起来，再也没有人找她“打擦边球”。

曾经，一家上市公司的高层多次找时任中信证券董事长的王东明协商要求赵雪芹修改对其公司报告的卖出评级。但幸运的是王东明极其尊重赵雪芹的意见：“她是专家，就应该听她的。”后续事实也证明了赵雪芹判断的准确性。

学会拒绝这些非理性的诱惑，在她看来是让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更令她感到自豪的，是看着自己手把手教出的新人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在她踏实的做事风格与严厉教导的影响下，七位青年分析师从她的团队里成长起来，之后成为了各大券商的首席分析师。此前，整个行业内从未有人发掘出如此多的“潜力股”。“这可以算作我成就的一部分吧。”她笑称。

转型做投资，在实践中再出发

荣誉没有让赵雪芹满足，反而让她开始反思，让她不甘于现有的轨道，开始谋求新的转型和变化。她觉得，仅仅是市场对研究者阶段性成果的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归零。“投资这个行业是要不停学习的，不与时俱进就很快会被淘汰。”博学广闻是金融界从业者运筹帷幄的基本保障。在赵雪芹看来，学习能力比荣誉重要得多，话语权由业绩决定，“我不比别人聪明，但我相信勤能补拙。”

时代造就的趋势再次让赵雪芹看到了转型的机会，她也牢牢抓住这次机会，实现了再次的“跨越”。2015年，在牛市抬头的背景下，她由卖方分析师转向买方，跳槽到公募基金前海开源担任基金经理，以求将多年积累的卖方经验和行业资源转化为生产力。

谈及转型的原因，她说：“人总是要不断的提高，需要一个新的东西来验证自己，让自己接受新的挑战，不能原



• 图：赵雪芹参加尹伯成教授八十华诞暨从教五十五年学术研讨会

地踏步。买方要将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实战性更强，对技能的考核要求更高。”

在很多人眼里，投资是一场赌博，赌的就是其背后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赵雪芹的投资风格是风险厌恶，即在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进行投资，通俗来讲就是“胆儿小”。从卖方的“纸上谈兵”转战买方的“真刀真枪”，赵雪芹追求的是绝对收益，“我不从博弈角度选股，而是基于价值、估值、行业比较和前瞻性来选股。”每当她向朋友们推荐买自

己的基金时，总会直言别对她期望值太高：“先不亏钱，再考虑赚钱”。

从业绩上看，赵雪芹的这一转型不可谓不成功。她管理的五只基金中，四只近一年的收益率在10%以上。从2018年年初至今，这些基金相对大盘走势的表现也都非常抢眼。

文科生转战金融界，本身意味着诸多限制，理工类行业研究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根本无法进入。因而她将无门槛的消费品行业作为切入点，依靠灵敏的

嗅觉和勤奋的研究，将其变成自身的优势领域。此外，她善于从宏观角度分析问题，对行业走势有着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周期里，只要大家口袋里的钱在增长，消费就是一个长期能走牛的行业。”

2010至2013年，她分管中信证券研究部大消费组7个消费类行业，拥有强有力的对公司跟踪挖掘的能力。转战前海开源之后，她作为基金经理发行的第一只基金“前海开源沪港深智慧”与第二只基金“前海开源沪杭深大消费”都属于泛消费行业，消费行业也将作为她未来的投资主方向。

她对投资有着自己的一套哲学，将其称为“一门艺术”。“投资第一基于基本面价值，第二是艺术。艺术的因素有许多，供求关系和心理影响都包括在内。这种因素投射到价格上就是价格波动。”虽然不是学习金融行为学科班出身的，但长时间积累的经验让她对这种“艺术”有了独特的敏感度，能预感到先机，从而准确出击。

谈及对未来的生活，她戏言设想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能轻松一点，同时又能把投资做好。”随即笑着反驳自己：“这个行业想做好就轻松不了，只能是忙里偷闲了”。

多年积攒的工作经验让她拥有比一般从业者更成熟的研究方式，能更迅速、更理性地做出抉择。“但其实没有捷径，只能勤奋工作，谁都不能改变。”她苦笑道，就算是理想的生活状态，也会以服从工作为主。

人生新境界，求取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之道

幸运的是，她的背后永远站着支持她的父母与丈夫。对此，她常常怀有感恩之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繁重的工作和压力让她的身体机能开始下降。她也曾考虑过是否应该休息一下，在个人生活和家庭上倾注更多精力。长久以来，她对丈夫与孩子怀有愧疚之心，直言“没平衡好家庭与事业，基本上没管家庭。”

初入证券行业，实务与学术之间的落差让赵雪芹深感焦虑。学财务的丈夫从头开始教她如何分析公司财务三张表（作者注：即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经常是打电话问完了又忘，忘了又打电话问。他是我工作后的第一个老师。”在丈夫的支持下，赵雪芹终于在证券行业站稳了脚跟。

不同于许多职业女性的家人，每当赵雪芹在家全心全意工作、接听客户电话时，丈夫从未表示反感，只是常常提醒她要注意身体。“他其实很聪明，也有很多发展机会，但为了支持我，他管家管得很多。”相互体谅与扶持让赵雪芹的婚姻几十年如一日般美满。

但没能深度参与女儿的成长过程，一直是赵雪芹的遗憾。在女儿六岁之前，赵雪芹的母亲来到上海，承担了主要的抚育工作，给孩子念小人书，教孩子识字。丈夫还在深圳上班时，孩子跑过来找她，赵雪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忙着工作，经常敷衍孩子：“你去找姥姥吧。”等丈夫回到上海工作，她的回应就变成了：“去吧去找爸爸。”

• 图：赵雪芹参加尹伯成教授从教55周年暨八十大寿研讨会合影



甚至在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之前，赵雪芹从未见过孩子的老师。“回头想想损失了挺多，好像不记得小孩成长过程是怎么样的。”她轻轻叹了口气。

也许是父母的榜样力量和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对孩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小属于“放养”状态的女儿健康成长，如今已在国外大学的心理学系读完大三。让赵雪芹欣慰的是，女儿继承了父母善良与诚实的品质，逐渐长成有担当、敢作为的青年，“有时候她说出一句话我还挺吃惊，哦哟这孩子挺有想法的。”

她对孩子只有一个简单的期许——“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她认为行行出状元，将为了挣钱而工作视为悲哀。她也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孩子去追求自己的爱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是最有意义的工作，干得也会更有劲儿更舒服。”

在可预见到的未来里，她期待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生活，开始计划着

用更多假期与家人去长途旅行。“开阔视野，也多陪陪这些重要的人。”她笑言。

吴晓波曾这样评价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这一代人，一个个像悬崖边的孩子。在青春的荒原上，他们忽然看见了光。他们奋力奔跑，触足之地，或陷泥泞，或长青草，惊心动魄间，天地舒展成一个以自由命名的花园，大河山川，各自生成。时间是玫瑰，他们是玫瑰上的刺。”

几十年来，赵雪芹向着自己所热爱的那束光奋力追逐，从未停歇。未来等待着她的，将是更坦荡的路途。 **结**

（本文系记者对赵雪芹校友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赵雪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1994级硕士，1999级博士，经济学院专业学位校外导师。现为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联席投资总监、兼任研究部行政负责人。）



• 图：李丹在美国的博士毕业照，与父母一起



李丹：经营学术，就是经营热爱的事情

文 / 本刊记者 陈曦 翁海峰

李丹的办公室不大，仅有一台办公桌和一个沙发，办公桌上放着两台电脑，在劳动节放假的第一天，她就在这里忙碌着。记者敲门进入她的办公室，她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块屏幕，飞速敲打着键盘。“两位在沙发上稍作休息，我马上就写好这一部分了。”说罢不久，李丹便起身为来访者沏茶。对于李丹而言，两个小时与记者交流的时间，是在其满满当当的工作安排中硬挤出来的。

经济是思维，历史是乐趣

李丹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其研究领域为经济历史、城市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三个方向中，她最感兴趣的是经济历史，尤其是民国时期的经济史。

交谈过程中提及历史时，李丹微笑着说：“我对历史是真的热爱，真的感兴趣的！研究历史很好玩，它能让你透过表面现象去探究内部原因，并为现实提供指导意义。如果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找一份工作的话，技能型的专业可能更合适，但如果一个人对生活抱有热情并想为人类贡献些什么，研究经济历史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在李丹眼中，经济学并不仅仅关于“钱”的一门学问，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她直言道：“我对钱本身没什么概念，这也是我没有修读金融学的原因。”

李丹老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以阐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闺蜜和我讲，她和她的男朋友已经相处五六年了，但这个人就是个渣男，你说我跟他分不分手？如果我没学过经济学，我可能会说，五年这么久了，分了蛮可惜的，我劝你们还是和好吧。如果学过经济学，我劝她一定要分，那五年已经过去了，在经济学上应称其为“沉没成本”，而沉没成本是不应当影响未来决策的。如果他是渣男，就应当避免将来更多地把时间耗费在他身上。”

李丹正是用经济学的思维指导其学术，让学术更严谨，用经济学思维指导生活，让生活更理性。

学科融合做文章，直击学术空白点

李丹在波士顿大学修读博士期间（2003-2008）选择了经济历史学这一方向，并以中国经济史为主要研究内容。

在当时，中国经济史这一具体领域的人才需求并未得到很好地发掘，很多人对李丹的研究内容亦不甚了解，毕业后的就业难问题则成为李丹可能会面临的现实状况。但李丹在当时并没考虑那么多，因为抱有极大的兴趣，她就去做了。并且很庆幸自己最终选择了这个专业。李丹谈道：“做研究的过程往往是枯燥且乏味的，如果没有对这一领域的热情，那研究过程将会是相当痛苦的。”

李丹老师是经济学专业出身，同时又对研究历史有极高的热情，站在两个学科交汇处的她，发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盲点。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和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历史发展变迁的知晓需求亦随之提高，然而，在学术界与之相关的多是由历史学家撰写的以描述性数据为主要研究材料的文章，而作为中国经济历史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历史量化研究，在国际学术上却是一片空白。

李丹提到，研究经济历史的有两类学者，一类是历史学专业出身，一类是经济学专业出身。然而，用历史的思维去研究经济和用经济的思维去研究历史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李丹则偏重于后者。

历史学家研究经济史常选取描述性的史料进行分析，而经济学家则会选取量化数据进行研究，通过数理模型进行



• 图：课堂上的李丹

经济学上的分析。

由于当时通过量化数据分析来研究中国经济历史的学者较为稀缺，故这部分的研究往往由外国学者做，这就出现了外国学者书写中国历史的状况。由于语言上的差异及思维观念的不同，外国学者的研究可能不是很全面，因此，中国经济历史的量化研究并未很好地被囊括于世界经济历史研究体系之中。而李丹的定量研究，恰使得中国经济历史可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同期横向比较，这为中国经济历史研究与世界的沟通搭起一座桥梁。

埋头故纸堆，昂首走天涯

做学术的过程中，研究取得新进展的欢愉是短暂的，长期繁复的数据收集过程则是持续的。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如有一丝不慎，研究结果也便失去了其意义。因此，李丹十分重视对每个数据准确性的把控，重视对每个数据的多方印证。

在李丹的《A mirror of history: China's bond market 1921—1942》一文中，需要用到的在《申报》上的数据就有数万条。她凡事亲力亲为，核对并矫正数据，确保其真实性与可靠性。

在美国，很多历史学家都在做其本国的经济历史的研究，因而这些数据详尽且完备。但在中国，与之相关的数据则非常零散，数据存在于各个不同的地方，没有一个集中的物理场所或网络节

点可以让你找到所有所需数据，这也是让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们非常痛苦的一点。研究中国经济历史，意味着要重新去构建数据，从犄角旮旯里挖出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归类 and 整合，正如李丹所言：“没有巨人的肩膀让你站在上面远眺，这意味着一切必须从零开始”。

上海是当时的金融中心，在民国时期，中国三分之一的银行聚集在上海，因此上海也是研究中国金融史的最佳城市。在李丹作论文的时候，还没有建立《申报》的电子库，也没有能够抓取网络数据的爬虫软件，于是复旦的文科图书馆和上海档案馆成了李丹常去的地方。李丹埋头故纸堆，翻阅《申报》中与研究相关的每一天的数据，记录下来并录入电脑。复旦文图的《申报》由于长期未被翻阅已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的“灰头土脸”的李丹，对能获得的数据和阅读民国时代的报纸上的奇闻轶事，也是自得其乐。

除了个人的“艰苦奋斗”，李丹还善于借助外援。在研究过程中，1912年之前的关于中国工业产出的数据，尽管找了很久，但仍一无所获，最后通过合作伙伴牵线搭桥，方寻找到了拥有此数据的研究者。李丹坦言：“当你在一个专业领域做久了，就会形成自己的学术圈子。通过圈内的各种联系，总会把数据收集全。问题的关键是你收集数据的过程中一定要真正用心地去做。”

李丹也常常鼓励自己的学生多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不是闭门造车。她认为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的情感共鸣和思维火花的碰撞，能够使学术研究变得有趣些，观点的交锋亦能相互启迪、

查漏补缺。

李丹虽然常埋头故纸堆，但从来没有人问她：“何妨一下楼？”她之所以选择在周末和节假日继续加班，是为了把零零碎碎的时间积攒起来，有完整的一个月去“走天涯”。李丹的旅行并非仅仅为了休闲，而常常是带着问题去世界各地交流与探讨的。李丹认为人是要劳逸结合的，既要读万卷书，也应行万里路。

合作之中做学术

翻开李丹的履历，从2008年来到复旦到现在，李丹共发表了十余篇在国际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而在这些论文的作者名单中可以看到有些文章是和其他学者合作完成的，何振宇教授则是李丹的挚友兼学术合作伙伴。

截至目前，李丹与何振宇教授共合作发表了十一篇论文。两人的合作友谊是从李丹在波士顿大学读博士期间就开始的，那时他们同在一间办公室，有很多机会交流学术问题，相似的学术经历和学术兴趣给他们两个人提供了很多合作的空间。

现在，尽管李丹和何振宇教授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存在着距离和时差的障碍，但是两人之间合作的关系却越来越密切。出人意料的是，李丹和何振宇教授的沟通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微信电话，平时合作上需要有什么沟通的，一个微信电话就解决了。

当记者向李丹询问她对何振宇教授的印象时，她忍俊不禁道：“他真的是



• 图：与学生在一起的李丹

个工作狂，是那种能从早上九点来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十二点的人，精力十分旺盛。”“工作狂”，就是李丹对何振宇的印象。

谈到与何教授的合作关系，李丹这样向记者形容：“我和他在学术上可以互补，他的计量能力非常好，对数据敏感，论文中有些数据需要他帮忙才能处理；而我的优势是思维比较开阔，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比较强。”

在李丹看来，“合作”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趋势。因为研究领域越来越深入和细化，研究过程中总会有自己的短板存在，因此“合作”是一个学者（尤其是当代学者）非常重要的能力。此外，她还告诉记者，她很享受与其他学者合

作的过程。合作研究有很多好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是：其一，学术资源共享方便；其二，合作也可以弥补学者自身研究条件的不足。

“闭门造车是要不得的，学者要学会合作、善于合作，才更容易出成果。”这是李丹在学术研究中一直笃信的。她向记者举了个鲜明的例子：从诺贝尔奖的获奖名单上就可以看出，现在越来越多的诺奖获得者都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一起分享诺奖。一个经济学家独挑大梁的时代已渐渐远去，目前学者单独研究的劣势逐渐凸显出来。由此，对经济学研究来说，合作的价值也就被放大了。

“总之，学术这件事，还是不要孤

独的好。”她一边轻轻放下拿在手中的水杯，一边摇着头这样总结道。确实，李丹的学术研究也折射出她的性格和为人处世，毕竟她还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生活中的她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热爱她的丈夫和孩子，而李丹对生活的态度也被反映到她的事业上来。就像自己幸福的生活一样，李丹也是希望自己所从事的这条学术道路还是越走越热闹的好。

全英文授课，把美式教育带进课堂

目前李丹在复旦开设三门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其中宏观经济学还荣获了“上海市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和“上海市英文示范课程建设”的荣誉。不过更值得一提的是，李丹所开设的这三门课都是全英文授课，这也是她教学的一大特色。因为即使在复旦，她也是少有的能将全英文授课坚持到底的老师。

关于在全英文授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她也承认，中国学生高中之前一直是接受中文授课的，大学后突然转变成全英文授课，很多学生一时难以适应。学生们不愿意踏出选择英语课程这一步，有畏难情绪。然而李丹却决心迎难而上。关于为何要坚持全英文授课，李丹这样解释道：“经济学源自西方，绝大多数著作是用英文写的，同时语言是会影响思维方式的，我希望同学们在一开始接受经济学启蒙和训练的时候就是原汁原味的，这对同学们以后不仅是个人发展还是学术研究都十分重要。”李丹继续补充道：“很多学生担心自己英文不好，

‘怕’我的课，这我也非常理解，但选择上我课的学生我都会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他们，毕竟学术的底子一定要打好。”

此外，李丹回忆道，曾经有一位选了她的课的同学，一开始英语并不好，但就是在上这样全英文的课程中激励自己学习英语，没日没夜地训练，没多久，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一开始在我课上时，她讨论都是困难的，但到了最后，她的英语讲得就很不错了。”谈到学生取得的成就，李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除了在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外，李丹在教学方面也十分出色。李丹告诉记者，似乎相较于学术上取得的那些成就，学生们对她的认可才是最令她开心的。

关于教学理念，李丹认为学术训练必须是严格的。“我上课很严格的”，李丹告诉记者，“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一开始是仿苏联的，与西方经济学教育体系对比，教授的内容是足够了，但深度却不够，美国则恰好相反。”有着深厚留学背景的李丹希望能够把美式教育带进复旦的课堂，因此她对选她的课的学生要求一直是十分严格的。一个学期有5次小测验、一篇短论文、一个video presentation、一次期中考和一次期末考，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记得有一个学期学生交上来的作业有小半个人高。”

李丹边说着边和记者打着手势，“我上课的时候，晚上回家的任务就是改作业”。李丹课上高强度的学术训练，确实让许多学生叫苦不迭，但选过她课的学生，却往往会在苦中培养起这样一种



• 图：与学生在一起的李丹

能力：对英文文献不再排斥与惧怕，在论文创作过程中，学会了去主动从英文文献中挖掘素材，获得启发。

对于目前教师的职业，李丹表示自己十分满意，她说：“一直以来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教书和做研究，在美国教师还更像是一份职业，而在中国做教师则不一样，会更有成就感。现在已经毕业了很多年的同学也会和我保持联系，让我有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文献典籍、三尺讲台都是李丹的人生舞台，她翩翩起舞的背后则是付出与奉献。李丹不说艰难困苦，亦不言玉汝于成。学术无止境，教学有创新，对于李丹而言，自己现在从事的就是所热爱的，现在所拥有的就是最好的。 

（本文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丹的问学栏目专稿，根据李丹的自述整理而成，在此致谢。李丹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2008年获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学。）



• 图：ChinaJoy 盛况



祝君波：出版文化，收藏心性

文 / 本刊记者 曹柠

一个初夏的周三午后，祝君波先生接受了我的采访，他没有叫我去他位于市政协的办公室，而是到位于天钥桥路的一套民宅改装的工作室中，这是他投入更多心血的地方。小小的工作室被三个连排书柜和满地的藏书、画册挤得满满当当。这位曾经的厅级干部身穿淡黄色衬衫，穿着拖鞋，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神采奕奕，淡定而随和。

祝君波，历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市政协委员兼政协文史委副主任，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朵云轩总裁、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创始总经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执行副主任，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副主任及编审；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海外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上海理工大学传媒专业、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高校的硕士生导师。

祝君波对事业极其投入，在出版行业一干就是四五十年，而他的经历又极为丰富，堪称全能跨界，成就最大的几项集中在拍卖、出版、游戏、收藏四大领域：他是中国拍卖第一人，带领朵云轩开拓出大陆艺术品拍卖市场；他是资深出版人，在多家出版社任职过一把手，亲手打造了“中国最美的书”系列，为中国出版界赢得了国际声誉；他是上海出版总局主抓游戏行业的副局长，心得独到，一手促成了ChinaJoy（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安家落户，至今繁荣；他是艺术品收藏鉴赏领域的权威，功力深厚，人脉通达，创办了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同时还是上海艺术博览会等大型活动的策展人。

朵云轩：从学徒工到总经理

祝君波 1955 年生于上海，遇上极左年代，求学之路坎坷。得益于中美关系缓和，尼克松访华前夕，中央的上山下乡政策有所松动，祝君波在家里已经有三个兄弟姐妹下乡的情况下，得以留在上海做学徒工。1972 年上海新闻出版局招收了学徒员工 250 人，他便是其中之一，其中大部分都补充到了新华书店工作，而祝君波在 1973 年 5 月幸运地来到朵云轩，这个改变了他生命轨迹的地方。

朵云轩原是清末民初诞生在上海的一家笺扇商号，起初经营苏杭雅扇、诗笺信纸、文房四宝、书画装裱等，后又发展出木版水印、书画中介等业务，曾有“书画之家”“江南艺苑”的美名。新中国成立后，朵云轩（当时称上海书画社）完成国有化，保留了书画收购业务，抢救、收藏了大量民间流散珍贵文物。文革期间，传统遭毁，文化事业凋敝，但 1970 年初，因为领导感兴趣，在朵云轩设了一个机构恢复木刻雕版书。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朝，在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刻印古书，两千多年的历史留存下八万多部典籍大部分靠的都是雕版刻

印。大部分民间的族谱、家谱、县志，也是雕版印的。当时的负责人是出版专家茅子良先生。一共刻了《共产党宣言》、《稼轩长短句》、《楚辞集注》。毛主席病逝后，又刻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送呈刚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

祝君波在朵云轩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木版水印雕版工。他刚进朵云轩时，师傅跟他讲，政治上要积极，但业务上也一定要钻研，在朵云轩业务上不过硬的人，是站不住脚的。这奠定了他扎实的业务基础，刻书版的学徒每周有三个半天练毛笔字，条件好但压力也大。当时朵云轩的学徒有五六百人，练毛笔字是对学徒的基本要求，即便卖文房四宝的小员工也要懂书法，而在木版水印室的小员工也要懂书法，而在木版水印室的学徒，还请来唐云、吴青霞等大师给他们示范、讲课，增进他们对画的笔墨、枯湿、深浅的理解，以便更好地把握复制技法。朵云轩的经历使祝君波在文革年代因祸得福，虽然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但却在朵云轩这样的文化机构中扎下根来，踏踏实实地跟着师傅们学了门手艺，更重要的是领悟到文化的涵养是个漫长的过程，急心不得，也奠定了他们对待工作的基本态度：尊重文化艺术，保持虔敬之心，将文化的事业当成公共

财富来呵护。像他这样在 70 年代进入朵云轩的有近百人之多，都成了极端年代受到庇佑的无形资产。

1979 年，祝君波到新闻出版局读了一年编辑业务进修班，其中不乏复旦和上师大的名师，如章培恒先生。他底子好又勤奋刻苦，结业时考取了第一名。进修结束之后，出版局的领导有意留他做行政职务，但对出版社业务感情颇深的祝君波还是选择回去当编辑，后来就到总编办公室做主任，协助领导管理编辑工作。他 1982 年开始读华师大夜大学，成绩优异，学士论文写的是题画诗，导师认为已经达到了硕士论文的水平，劝他可以以工作为重，在工作中继续研究，他这才放弃继续攻读研究生。

祝君波早在 1974 年就入了党，由于业务过硬，办事有想法且干练，逐渐被上级领导选作行政干部培养。1984 年作为年轻人才储备，29 岁的祝君波进入领导班子，成为社长助理，又做了多年经营和管理工作，32 岁时担任了副社长。1991 年 10 月前任社长离休，组织决定由他接替他任法人代表，负责上海书画出版社和朵云轩两大块的业务。入行 19 年，他从最底层的工作一路升到领导岗位，对业务知根知底，对出版社的发展信心满满。

出版行业是一个传统而稳定的行业，但其中也不乏一些高潮，比如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印刷以前的旧书。还有 80 年代科教兴国战略兴起时，国家全面恢复和发展教育，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出版业十分活跃。更多的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1992 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至此中国的出版融入了世界，

外国出版的很多书也同时可以在中国出版。外国的书可以通过正常的版权贸易，把翻译权授权给中国人。

祝君波经营出版社 40 多年，借着开放市场的东风，出版了诸多文化价值极高的书目，但他也非常重视经营，实行以书养书，以文养书，以商养文的企业策略，“要养活员工，让他们拿高工资，给他们买房子住，而且还可以用这些赚来的钱去养那些可能赔本的书”。他很早便明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不是分离的，他常说“卖不出去的书，没有人看的戏，没有收视率的电视节目，会有社会效益吗？如果没有受众基础，就算初心再好，也没有办法把效果做出来。所以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无法完全剥离的。”

1993 年，祝君波与复旦经济系结缘，在领导岗位进修经济学硕士，班上同学多是处级干部，后来很多担任要职，包括原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原上海证监局局长张宁、原上海市委秘书长范德官等人。祝君波坦言在复旦的岁月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是却给他的人生留下了重要的烙印，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他反复强调通晓市场基本规律对一个文化行业的从业者的重要影响。将文化和市场结合起来思考也成为了贯穿他半生的命题，曾出版《艺术品收藏指南》《艺术品拍卖与投资实战教程》《祝君波谈收藏》《典藏文札》等专著，现在他仍每个月为台湾《典藏》杂志写专栏，和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那样，成为上海地区传播艺术品鉴赏、拍卖、收藏的一杆大旗。



• 祝君波(右二)在朵云轩首次拍卖

中国拍卖第一人

祝君波在艺术品收藏界有一个响亮的名号叫做“中国拍卖第一人”，这是名副其实的历史记录。业界公认，1992年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最早是在上海兴起的，中国第一拍是朵云轩在1993年6月进行的。朵云轩之后嘉德、瀚海、荣宝斋才相继开始拍卖事业。

故事还要从1991年说起。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上海各界摩拳擦掌，准备进一步解放思想，拥抱开放市场的大潮。那年冬天，祝君波从香港友人处获知，佳士得、苏富比进入香港以后，引进了英国式拍卖，做得有声有色，吸引了高端的文物和客户，香港的文物经营模式已经焕然一新。而香港几位华人实业家已创办了一家华资拍卖公司永成，他们擅长古玩，对书画

比较陌生，希望与朵云轩合作，强强联手，创出自己的品牌。1992年4月，朵云轩与香港永成拍卖行合作成功，朵云轩的名声就此在香港打响，和永成的拍卖一直持续到1993年秋，前后共举办了四场。在香港舆论界反响不俗。祝君波与两位同事又考察了佳士得、苏富比的春季拍卖后，兴奋异常，决心要在内地创办第一家专业的艺术品拍卖公司。

当时的时代氛围是理解此次壮举的重要背景。当时，正是学习讨论邓小平南方谈话如火如荼的时候，解放思想，大胆突破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祝君波一行人回来一汇报，从上到下的领导都很支持，相比后来层层叠叠的管理，当时想要做些大胆尝试还算一路畅通。8月21日，朵云轩通过了工商登记。1993年1月份，上海文管会也很支持，批复同意朵云轩具有拍卖文物的资格。

1993年2月20日，在静安希尔顿酒店举行了拍卖公司成立大会。汪道涵、龚心瀚、徐福生等领导出席大会并讲话。公司当时编制15人，实际员工只有总经理祝君波、副总经理曹晓堤等四人。在南京路朵云轩顶楼加盖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会议室，这就是当时公司全部办公场所，真正秉承了朵云轩一贯的传统，艰苦创业，白手起家。祝君波自定6月20日为拍卖日，开始背水一战，派出员工去征集拍品。

初创时期艰苦是必然的，首先要解决的是拍品。社会上做生意都习惯银货两讫、当场成交，对拍卖公司先收下书画，拍出了再结账，拍不出再退还物主的做法一时难以适应。祝君波和自己的同时四处收拍品，荣宝斋、中国书店也支援了一些，虽然其中不乏张大千《溪山雪霁图》等精品，但总的来说数量和分量都不足，为了能首战告捷，为国内拍卖市场作出好的示范，祝君波毅然决定把店堂里挂的画摘些下来，再从仓库拿了一些精品力作，组成了首场拍卖的拼盘。

然后便是做客户的工作了，祝君波胆大心细，奋勇创新敢为人先，服务工作细致入微，在拍卖前特地制好拍品图录寄给重点客户。如收藏大家张宗宪先生是在永成结识的大客户，他收到祝君波的信和图录后，专程在拍卖前单独到公司来看藏品，并表示要捧场，还拿走了很多图录，帮朵云轩拉客户。另一位是香港金山集团的罗仲荣先生，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拍卖场的大买家，他在祝君波的力邀下，也和妻子一起专程到朵云轩简陋的办公室看画。正是这些细

微周到的工作为祝君波和朵云轩赢得了人心，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1993年6月20日下午一点半，中国拍卖史上首场成功的拍卖第一槌在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敲响。著名艺术家谢稚柳、程十发、陈逸飞，文物界荣宝斋米景扬，瀚海秦公，嘉德王雁南、甘学军，苏富比溥文，佳士得袁曙华和江炳强，兰馨蔡国声等文化收藏界名流悉数到场。来观摩和来看热闹的社会各界人士挤满大厅水泄不通，座位不够很多专家都只能席地而坐。

拍卖结束后的记者发布会，张宗宪、蔡泰和、陈德熙、许祥杰等大买家悉数出席，祝君波向记者宣布成交率为74.5%，成交总价为830万港元，两件拍品超过100万元，事后，《解放日报》在报道中写道：“只要改革开放不断推向进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终究会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请不要忘记1993年6月20日，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这紧张激烈、动人心魄的一幕。”祝君波和朵云轩就这样载入史册。

一炮打响，从此艺术品拍卖如燎原之火在大陆蔓延开来，到2016年，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总成交额为318.3亿元，占全球市场份额38%，位居全球第一，这一切都源于当年祝君波那勇敢的一搏。1993年，王仲伟出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主持工作，在了解了书画出版社的运作和朵云轩的拍卖之后，建议祝君波到市委党校中青班进修。祝君波业务繁忙正准备大干一场，担心党政培训分散精力，在王仲伟的劝告下还是去了，又改变了后来的发展轨迹，从

业务干部走上宣传部门领导岗位。

在书画出版社继续工作了两年，祝君波被调到上海美术出版社兼任社长和党委书记，当“救火队员”，这家老牌的美术出版社传统显赫，但一时经营不善，亟待拯救，祝君波临危受命。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整改积弊，裁减冗员，重订规章，拥抱市场，他不怕得罪人，只要是为了公家的事，多大压力都能上。三年下来，美术出版社起死回生，为日后的繁荣期打下了基础，祝君波的威信也达到了顶峰。2000年，他胜任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离开了出版社，他继续积极创新，留下了中国最美的书和ChinaJoy两个繁盛至今的项目。

做最美的书，创最好的游戏

“中国最美的书”是祝君波最引以为豪的成绩之一，自创立以来他连续十五届从未缺席过主持或参与终选，付出的心血可见一斑。这项2003年创立的书籍设计评选项目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15届，已经成为国内书籍设计领域最权威的赛事，更因为注重与国际书展的对接而成为了中国出版界的一张名片。

被授予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称号的书籍将参与德国莱比锡书展年度“世界最美的书”的评选。由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已有近六七十年历史，代表着当今世界书籍艺术设计的最高荣誉。这一奖项，每年设金字母奖一名，金奖一名，银奖两名，铜奖五名，荣誉奖五名，共计14种图书能获奖。我国自参评以来，已经有17种图书获“世界最美的书”奖，其

中《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订单——方圆故事》曾获金奖。

从2015年开始，评委会每年都会借上海书展之机，邀请“世界最美的书”来上海，与“中国最美的书”一同巡展。在祝君波看来，搭建一个平台、沟通东西方文化，邀请国际同行来中国，探索书籍之美，是中国作为一个出版大国，充满生机的文化气象，也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具备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办了15年的评选，祝君波日益感到中国书籍设计艺术的明显进步，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美术风格，而且融入逐步扩大的世界眼光。

祝君波任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期间，还见证了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当年游戏业还不像今日这般大行其道，一些领导干部甚至对游戏行业抱有偏见，而祝君波作为主管领导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游戏行业的发展，当年他的一句名言“游戏不是天使，但绝不是魔鬼”，一时间广为流传。

中国游戏业的蓬勃是从2000年开始的，在当时的上海滩汇集了游戏界的先驱朱骏、陈天桥、王子杰、史玉柱，从韩国引进的游戏，主要在PC端上玩，叫做端游，而后来乔布斯发明了新的移动手机，便进入了手游时代。在创业创新方面，祝君波认为上海网络游戏产业一直走在全国的最前列。从端游时代的盛大、巨人、九城、久游等，到页游时代的游族、三七玩等，再到手游时代的莉莉丝等，上海总会涌现出诸多风云人物。

祝君波的前瞻性也得益于与这些游戏业先驱的交往，上海当时有三大游戏



公司，第一个是盛大，第二个是九城，第三个是巨人。祝君波与不少游戏企业的一把手很早便相识。他认识陈天桥时陈还只是个小小公司的经理，但祝君波已经能感受到此人身上巨大的能量和这个产业的巨大潜力。2004 年陈天桥率领盛大网络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功，成为了当年的中国首富。

令祝君波最为欣慰的是，2004 年，他将 ChinaJoy（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引入上海。2005 到 2007 年左右，在中国游戏还没有完全壮大时，中国游戏业当年 75% 到 80% 的市场份额都在上海。一个重要原因是硬件好，当时上海拥有全国最先进的宽带技术和服务器，基础设施好，因此吸引了大量游戏产业到上海集聚。同样人才也是必须的，上海大量的理工科和美术人才为游戏行业输出了大量人才。

祝君波当时敏锐地察觉到，如果展会办在上海，将极大的迎合企业需要。而北京的同行，也正有此意，他们认为上海是游戏集聚的中心，会展条件也比北京好得多。因此在他的努力下，首届在北京举办后，往后十几届，从此移师并永久落户上海。受到了游戏公司的热烈欢迎，从展会管理角度来讲，上海比较市场化和人性化，对展览公司的服务也更好。

在祝君波看来，游戏业的突飞猛进并不令人惊讶，游戏产业是朝阳产业，在他主导下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对于游戏产业的支持也不仅限于 ChinaJoy 这一大型展会。上海作为国产网络游戏属地管理试点，游戏审批申报材料 and 流程进一步得到提速和简化，审批时限较以往

减少 50%。ChinaJoy 在上海连续举办了 12 届，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ChinaJoy 不仅成长为全球最顶尖的游戏展会，更成功从 B To C 模式向创新的 B To B 加 B To C 模式转变，还以其巨大的号召力，带动着中国游戏产业走向繁荣。

名传江湖，宝刀未老

2006 年祝君波调任东方出版中心，官至正厅级，这是中国出版集团下属的一个机构，原来叫大百科上海分社，王元化曾是副社长。期间他继续创立文化品牌，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

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自 2008 年创始，由上海市政府四家机构共同主办，以私家高端收藏为定位，兼及民间大众收藏，全球范围内收藏界最有影响的专业会议。两年一届，迄今已举办了五届，在会议组织、与会者代表性、论坛质量、学术研究、文献出版、观摩展览、会议服务等方面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受到与会代表和媒体等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形成了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2012 年第三届大会首次移师台北，由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清猷雅集、中华文物学会协办。与清猷雅集 20 周年庆典、台北故宫之夜等活动融为一体，成为了当年海峡两岸的一次难忘的文化盛宴。全球 600 多位收藏界精英云集台北。此次活动被誉为海峡两岸的一次文化交流盛会，也是全球华人收藏界最为隆重的一次世纪聚会。台湾《艺术新闻》杂志称此次大会为“2012 十大艺术新闻”，



• 海上文博苑效果图

“堪称全球世界华人收藏界最大盛事”。

即使到了临近退休，祝君波还是闲不下了，原本应功成身退，现在还在为自己的收官项目做最后冲刺。就在天钥桥路这间小工作室中，祝君波与自己的几位退休老同志和研究生持续奋战，为了海上文博苑项目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海上文博苑的创意来源于马春雷同志与祝君波对艺术品收藏行业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在考察了欧美许多顶级的私人博物馆后，祝君波曾总结过收藏的三种境界：投资理财尚可，修身养性为佳，守护文明物证最高。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将私人收藏以展览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是大势所趋。而海上文博苑的模式在国内尚属首次，此前还未有项目能实现此构想。祝君波表示，海上文博苑将探索“政府 + 社会”合作的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之路，在保证藏品、艺术作品物权

不变的前提下，为收藏家、艺术家及其后人提供更好的藏品展示、研究、交流和仓储的专业空间。

海上文博苑如果顺利建成，将实现政府和收藏家的双赢。从政府角度来讲，收购大量珍贵艺术作品来充实展馆，不仅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需要巨大财力支持，这显然并不现实；对收藏家来说，如果让藏品默默地藏在家中，既不安全也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有违收藏初衷。但私人收藏家难以组织独立的私人博物馆，因而，对大多数收藏家来说，能有一个专业的展馆展示自己的藏品无疑是皆大欢喜。

在场馆设计上嘉定区政府全力以赴。海上文博苑项目的手笔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十三五”期间重大文化项目、嘉定建县 800 周年重点项目和“教化嘉定”的标志性建筑，规划区域处于嘉定新城与老城的“过渡地带”，北侧

和西侧紧邻环城河、横沥河，与古城公园、南水关公园、韩天衡美术馆隔河相望，与州桥历史文化风貌区及孔庙、法华塔、竹刻博物馆、顾维钧陈列馆等处同一轴线。总建筑面积达到约 7.8 万平方米，由来自葡萄牙的世界著名建筑师、普利兹克奖得主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及其弟子卡罗斯·卡斯达内拉（Carlos Castanheira）操刀设计。博物馆主体建筑内计划常设 25—30 个面积约 300—500 平方米的陈列展厅和 3 个面积约 500—1000 平方米的临时展厅，定期进行藏品交流展示。公共空间侧重文化休闲，有咖啡室、茶室、书法培训室等。

受嘉定区领导的委托，在展品征选方面则要靠祝君波、顾祥虞等专家在收藏领域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网罗整个华人世界的优秀私人收藏家。目前签约藏家中既有上海本土的收藏家，也有来自浙江、台湾及美国的收藏家，藏品涵盖书画、器物、家具、油画、雕塑等。例如，开创出闻名中国现代画坛的云南画派的著名美籍华人画家丁绍光，将其画作中的佳品展出；台湾收藏家林明哲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收藏中国现当代艺术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收藏了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马克西莫夫、梅尔尼科夫等美术大师的名作。这些近现代油画和当代艺术品也将在文博苑的独立展馆中展出。

官人、商人、文人

祝君波开玩笑说自己有三个身份：官人、商人、文人，但其实他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汇了官人的公心、商人的精干、文人的情操，他有今日成就自然不令人意外。我问他，如果早些离开文化出版界谋求仕途，或者在经商下海的大潮中辞职去开拍卖行，定会升官发财，会不会比现在更幸福？他笑笑，显然，我不是第一个这么问的人。他说，不会，他为自己此生所作所为感到深深地自豪。他流转多岗，恰好做成了自己性情中挚爱之事，做大官和发大财比起这些长久的事业实在不算什么。“成就不能只用财富来衡量，有些钱我不去赚有人会去赚，但有些事情如果不是我去做可能就没人去做，或者起步晚很多年。”，比如说中国最美的书这个品牌，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了世界最美的书项目的一个分会，每年激励着众多设计人才，让中国人的艺术设计能走出国门去莱比锡拿奖，背后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是无法估价的。而且我离开后还是可以继续办下去。”

谈到对他影响至深的人物，祝君波给出了三个名字：毛泽东、邓小平、汪道涵。毛留下的是时代烙印，其言其行影响了青少年祝君波的基本思维方式。毛泽东的时代，政治挂帅，祝君波入党早、资历老，在行政工作上颇受重用，可他却一早清楚，如果没有过硬的专业的基本功和丰富的阅历，仅仅做一个党政干部是无法满足他的事业心的。邓影响的社会大潮，改革开放和注重实践的风气深深鼓舞了壮年祝君波在业务上的



• 2017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获奖作品

锐意革新，不断拓宽自己和体制的边界；汪则是私交甚密，耳濡目染下，他没有凭借汪老的关系在官场上占得好处，反而是汪老重视文化、重视阅读的品质对他影响更大，让他看淡了功名利禄，将待人接物的智慧和奋发为公的情怀圆融为一。

63 岁的祝君波下个周就正式退休了，他说他还有最后一场仗要打，即在嘉定区政府领导下完成海上文博苑的建设，那时他就解甲归田，去游山玩水。我们的访谈比预计的长了两个小时，讲到激动之处，他总要起身拿出实物给我看，或是刚刊登了他文章的杂志，或是手头项目的规划图，或是历届活动的图样册，或是 40 年前他学徒工时的木雕版拓印。他时不时地起身接电话或签文



• 祝君波先生在艺博讲堂演讲

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胸前的口袋中放着的地铁卡，中间还帮我续了一次茶水。很难想象，这位官场、商界和文化圈都鼎鼎有名的大人物过着如此低调、充实的生活。在赠与笔者的《祝君波谈收藏》扉页，祝君波挥毫落纸，恰是他潇洒人生的写照：以文会友，以藏养心。✎



吴立波：翻山越岭之后，还是那颗初心

文 / 本刊记者 张程喆

18岁那年，吴立波从陕西考入复旦经济系。他独自挎着行囊只身坐了20个小时的火车从陕西来到上海，自此便踏入了南方的土地。

在复旦的四年，吴立波主要做了两件事，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复旦文科图书馆的阅览室是他的常驻地，他广泛阅读各学科门类的书籍，形成了系统的知识谱系；他走四方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在BBS上发帖，在食堂贴过征友启事，他还曾踏上绿皮火车跋涉几十个小时去见友人。他说这两件事让他知道了“聪明睿智的人是怎么看世界的”。经过四年大学时光的沉淀，他打磨锤炼形成了他初步的世界观。

毕业后，吴立波横跨多行业，换过多份工作，在人生路途上翻山越岭，其中也走过不少歧路，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然而站在当下回首过往，外人看来似乎分裂隔绝的各段经历对吴立波来说自始至终是一脉相承的，——他对社会的激情和关怀从未褪色。

直到今天，他还是怀着成长之初在复旦健全起来的那颗赤子之心。

读万卷书，形成对世界的认识

吴立波是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爱吃面和饼，上大学之前，他在家乡陕西生活了18年。18岁那年，他参加了高考。他来复旦的原因简单而纯粹，“当初我就是觉得复旦是南方的第一学府，是个好学校，我也想换个自小生活的环境，到外面的世界看看。”

至于选择经济作为自己的专业，源头要追溯到他对政治的热情，“从小我就对政治感兴趣，学经济完全是因为经济是政治的核心问题。”

大学四年，吴立波主要最大的收获有两个：一个是获得了系统完备的知识，打开了他看世界的视野；还有一个则是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两点对他一生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在复旦四年，吴立波过的是一个非典型理科生的生活。在学习专业课程之外，他花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来阅读。当时图书馆规定，每位学生每次只能借三本书。吴立波每次到图书馆都会一次性借三本书，一个月之后把看完的书还掉，再借三本。每隔两三周，他会去一趟阅览室，坐在角落里那张桌子翻翻自己喜欢的期刊，一落座就是几个小时。回忆起来他对人大复印资料的记忆尤为深刻，“那本东西是白皮的。”

他看的东西很杂，除了他兴趣最浓厚的政治类书籍，他还阅读了大量关于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宗教、自然科学的书本。他养成了自己的一套阅读习惯，先读关于某个学科系统性、综述性的书籍，这样可以快速形成较为健全的知识谱系。比如在哲学学科，他就

先读了《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

吴立波很看重阅读，因为他相信，“一个人完整、系统并且成熟的世界观是要通过广泛阅读来树立的。在复旦这类综合性大学，广泛和系统的阅读尤为重要。”他深受复旦文化的影响，“复旦浓厚的学习氛围让我受益终生。复旦的文史哲这类基础学科很发达，而文史哲不同于一般科学，它们具有超越性，浸染在其中的我耳濡目染。”

步入社会以后，吴立波接触了各色人等。在复旦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复旦浸润下的学子有何独特之处。可是当毕业很多年以后，这时的他与校园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回过头来看，他发现了复旦人身上不同的气质，“复旦出身的人，有相对独立的思

考能力和人格特征，与社会当下最热最火的东西相对保持一定的距离，保留了自己相对独立自主的一面。”

受益于广泛阅读，吴立波诗写得不错，在一批诗歌爱好者中小有名气。古典诗词协会是他大学四年唯一参加过的一个社团，他热心地帮着社团做些事情，参加活动也挺积极，后来便成了社团的副会长。在古典诗词协会，他结识了一帮挚友，直到今天他还和其中几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行万里路，寻觅同道中人

交朋友，寻觅同道中人，是吴立波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和阅读投入最多精力的活动。在他看来，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如果能在其中找到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讨论天下事，朝着共同的目标

和理想努力，将是一大幸事。

在日月光华 BBS 论坛，吴立波是一个活跃分子，他大量发帖和积极回复别人的帖子，希望借助网络这个平台来交友。他发布和回复的帖子，内容大多数是针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因为他，他真正想寻觅的是“关心社会问题，并且有志愿探索这些问题并找到解决方式的人”。

为了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吴立波手写了一张征友启事，贴在了旦苑的边上的橱窗里。当时，他的这个征友举动在学校里引起了一阵讨论，新闻系办的小报还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

与朋友们彻夜长谈是常有的事。校门口的毛像是吴立波和朋友们熟悉的“老地方”，他们一般都在这里聚会。毛像边上有几张石桌和石凳。他们有时候坐在凳子上，有时候干脆直接坐在草坪上，谈论问题。话题内容大多为社会问题。他们针砭时弊，对国事、天下事，有时候遇到意见相悖之处，几人甚至还会争得面红耳赤。深夜十一二点，夜深人静，只有孤零零的几盏路灯亮着，他们争论的声音在空荡的夜色里回荡。

吴立波没有为自己设交友的限制。为了寻找真正的知己，他不惜花大把的时间和精力。为了结识新朋友，有时候是为了和老朋友沟通和交流，吴立波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设置什么交友的限制，他的朋友有学生，也有社会人。他交友的范围不限于复旦，也不限于上海，交友唯一的标准就是“谈得来”，有相似的价值观、追求和目标。“那时候我们还是穷学生，没有什么钱，只能买硬座票。”他登上绿皮火车，一坐就是20来个小时不合眼，从上海跑



到北京去找同学。

谈起朋友们，吴立波感慨万分，他表示自己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虽然我走了很多坎坷的路，我人生遇到过多次转折，幸运的是每一个转换的节点，都有朋友出现，他们来帮助我，给我机会。”

从银行出来，成为了记者

从复旦毕业后，吴立波去了银行工作。这是他离开象牙塔后的工作的第一站。银行科层制度严谨，规定严格。在银行这部精密的仪器中做一颗螺丝钉，他随着机器按部就班地运转了三四年。

毕业四年后，吴立波 27 岁。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银行，赤手空拳地进入媒体行业，转变身份成为了一名记者。当时他离职的时候，同事听说他要去当记者，愕然地望着他，“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放着现在好好的工作不干了。”

同事话中的含义吴立波也明白，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份凑活像样的工作。”也许在外人看来，他的决定非常突然，但是他自己知道他转行“不是截然的改变”。他一直关心社会问题，“当初学经济学也是为了触及社会中最核心的一块内容”，从经济系毕业进入银行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从银行转到媒体对他自己来说也不是突如其来的改变。

“我进入媒体还是和我的社会关怀有关系。我希望把职业和理想结合起来，在就业过程中实现我的社会关怀。”媒体是社会公器，是一股推动中国社会进

程的巨大力量。他带着一腔热情投身媒体，“”

另外，在银行的这几年，他越来越感觉到世界之大，想去见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只有了解了世界，知道了世界是怎么样的，我才能更好地做些事情。”

“我之所以干媒体这一行其实是带着理想主义。”记者这个职业，与吴立波的理想和抱负契合。一名记者的工作活动范围和内容相对自由、灵活，在工作中能跟各色人等接触，包括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社会层次的人。“我想行走到中国的各个角落，想读不同的人生故事，想拓宽视野长点见识。”于是他听从了内心的声音。

2004 年，吴立波通过朋友的引荐进入了新华社主管的《瞭望东方周刊》工作。这是他进入媒体业的第一站，也留下了他作为一名记者最辉煌的代表作——《中国十大学者背后的财团》。这篇报道反思了经济学家在社会中话语权中的地位 and 扮演的角色，并分析了经济学家背后的利益根源。在当时，经济学家在社会改革中拥有强大的发言权。吴立波捕捉到了这个现象背后反映出的社会问题，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一气呵成此作，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办杂志，做自己想做的事

做记者做了几年后，吴立波辗转又待过几家媒体，但是现实不能与他心中憧憬的蓝图达到一致。就在现实不尽如



• 图：吴立波在校长邦组织的论坛上做演讲

人意之际，他碰到一个机会，便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操作和运转的媒体。

他之前在媒体从业积累了一定的人脉，他找了媒体界的几个朋友，花了大半年时间拿到了杂志刊号，又拉了一定的投资资源，办了一本新闻类的综合周刊，名为《东方周报》。创业阶段，整个团队有三四十人。吴立波既是代表管理层的董事，又任总经理。这个创业对吴立波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我第一次整合我能聚合的各种社会资源，按照我自己方式，干一番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媒体属于公共产品，是社会的公器，在中国办媒体是一件很难的事，首先要获得资质就非常不容易，其次要依靠自身的经营是很难获取利益甚至收回成本的。诸多问题困扰着他，比如协调各方的利益需求，杂志未来发展的方向，等

等。办杂志的那段日子，吴立波几乎没有睡过一天好觉，一躺在床上，各种问题就在脑海里盘旋，让他难以入睡。

移动互联网的趋势在逐渐展开，媒体的形态和市场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互联网的三家巨头 BAT 几乎垄断了所有流量，其余的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纸媒节节败退。在新的时代，传统的商业模式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互联网巨头依靠流量和广告变现。中国媒体行业的遭到巨大冲击，媒体越发不独立。吴立波对媒体业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理解，“以前媒体还能自我造血、生存，现在要么委身于资本，要么依靠政府的扶持。”

2013 年 3 月，《东方周报》的历史结束了。这对吴立波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梦想像泡沫一样破灭。媒体一直是他内心向往和憧憬的事业，然而当他真的做了之后他才发现现实的比想象还要复杂和残酷，“媒体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存在于社会中，就必须服从整个社会的逻辑。”

转入投资圈，仍然坚守正道

他无力对抗时代的洪流。《东方周报》的创业失败后，吴立波最终捡起了自己的老本行，走上了纯粹的投资的路。2013 年正值金融领域改革后突飞猛进的时间点，金融投资行业大发展，各种创新层出不穷。吴立波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他在投资领域做了很多尝试，可以说“在我做投资的这几年里，各种各样的我都经历过了”，

从风险最低的银行，到信托，到债权投资，到股权投资，等等，“我几乎看遍了整个金融投资的全貌。”

现在，吴立波在全国第四的地产公司绿地集团的绿地金控的另类投资部工作，同时兼任绿地教育集团的总监一职。

他自认自己最大的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态度上都是绝对认真地对待；第二个特点是“做得进去，也做得出来”，这样不会纠缠于一些细节，有时候从当下抽离出来远观地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思维方式是帮助他看得更深、更远。

从事投资这一行，需要有高度敏锐的判断能力以及对社会的认知能力。“任何一个新的行业或者企业放在你面前，你要能抓住它最核心的点。”吴立波认为他的综合判断能力、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他在复旦的四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泛地阅读加上广识良友。

再加上他做过很多工作，经历过很多，看过很多人和事之后，比起大部分的投资人，他自认为自己可能看得比别人更透彻一些，因为他从内部观察和实际操作过。投资圈内部芜杂，很多投资人对商业没有什么感觉，“他们判断的依据就是从纸面材料上看到的逻辑框架，这样其实并不可靠。”

谈起现在的工作，吴立波坦言，“我把它纯粹地看成一份职业来对待。”人到中年，他已经明白要有时候人不得不把工作本身和社会问题做适当的分离，因为工作和终极价值追求是很难一体实现的。

不过，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的价值判

断标准在他心里从未改变过。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够帮助他避开一些“雷”。更重要的是，坚守正道和初心让他内心坦荡，“晚上睡得很安心。”

中国的投资市场上基于商业模式创新很多，但这些项目不一定能在实际上创造新的对社会的增值。他更关注高科技项目，大文化领域，教育类项目，而对纯娱乐性的项目没有那么偏好。“我在投资的时候会看什么是真正有益于国计民生的项目，而不是以挣钱为唯一的目的”。

就像歌里唱着，“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吴立波走过很多地方，就像翻山越岭，攀过歧路，也看过大海。目睹、经历各种人事后，吴立波早就褪去当初刚从复旦园走出来的稚嫩。

“在工作里实现自己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很困难的事情。”他渐渐意识到现实的残酷，“我现在懂得了把工作本身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怀做适当的分离。”

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实际上没有变。他举手投足的气质里仍有一份少年感，他依然坚持着成长之初形成的价值观，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社会正义的坚守，他依然铭记于心。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了。



• 图：2010 年毕业典礼上全家合影



家庭教育：给孩子点亮启程的明灯

文 /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80级陆波

我的儿子小彭同学 2010 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之后就职于华尔街的一家私人高频交易公司，现任其香港子公司亚洲固定收益和大宗商品业务负责人。在这 8 年的工作中，他白天从事高强度的交易工作，工作之余又进行了大量的“放松性”活动。他推出了自己的公众号，写了大量介绍东西方文化历史艺术的文章，包括西班牙的绘画艺术，伊朗的文化历史，印度的文化历史，和中国山西古建筑游历等等。近期他又推出了系列游记散文，介绍丝

绸之路上的中亚列国的文化，饮食，历史等等。他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他曾大校友的科普读物《妙思统计》，此书已由高教出版社在今年年初出版。在香港生活工作期间，他学会了广东话，参加了品红酒课程，并获证书。他弹古典吉他，潜水和冲浪。他参与投资了他校友制作的电影“Some Freaks”，此电影受邀在 2017 年上海电影节上作为独立制片放映。在今年年初，他又拿出一部分积蓄，和他父亲一起在复旦大学建立一个奖学金，旨在奖励中国人口学和社

会政策方面的年轻人才。

如果从世俗功成名就的角度讲，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谈不上什么成功。但从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来讲，他很充实向上，他谦和的气质和丰富的知识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在此，我承蒙母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会之邀，分享我们父母是如何教育和培养他的一点体会。如果我的教育理念能给现在年轻的父母有所启发的话，也可视作我对母校的一点报答吧。

判断一个家庭的育儿是否成功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已经成年的孩子。如果在他走上社会，感受他健全的人格得益于他原生家庭的文化熏陶，并为此感谢父母的培养时，就是父母交出了合格的答卷。事实上，即使是成名之后的朗朗也未必欣赏和肯定他父亲对他的家庭教育。而最近有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更是在去美国留学后写下万言书批评他父母对他的教育方式。所以，所谓家庭教育成功不在于名利高低，而是渗入孩子气血中的胸怀和情趣。在积淀了岁月的沧桑和繁华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意识到自己原生家庭的教育对自己一生的影响。

而小彭同学在他 29 岁生日时说，如果以后他有了孩子，他希望像我教育他那样教育他的孩子。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对我们对他的教育，尤其是他成长的前 18 年的家庭教育最好的肯定了。

小彭的成长得益于中西方不同的教育体制，但更得益于他从小受到的家庭影响。因为在和孩子共同生活的最初 16 年中，我们始终关注他的人格健全，学习兴趣和生活能力。由于我和他爸爸早

年留英经历，我们很早就认识到孩子一生的成功，主要不是看他读什么学校，挣多少钱，而是在他走上社会之后，如何设定和把握自己的人生目标，充盈自己的生命，自如地适应社会而不被社会所左右，在充分发挥自己所能时获得社会 / 他人的尊重，在得到尊重的同时，自己获得自信和喜悦的心情。既有内心的执着，但又不失谦和与包容。培养这样的孩子是我们这个家一直秉承的家教目标。

虽然现在小彭已经成年和独立，但当我们回忆起在他孩童时期对他点点滴滴的教育细节，依然是感慨万分。其实，培养孩子的过程就是对父母人格的再一次塑造。而在所有培养他的经验中，我觉得培养他自我管理能力的经验最为重要。这种管理能力包括了学习习惯的管理，身体的管理，情绪的管理。当一种良好的行为成为了一种习惯后，要他改变也很难，反之亦然。而好的习惯养成的最佳时间是孩童阶段。

学习习惯管理

管理自己，我首先注重他的学习习惯管理。在小彭幼儿时期，我们就帮他确定晚上的活动时间，包括学习英语的时间和玩游戏的时间。这实际上是考验父母的坚持力。记得有一次，我加班回来，已经很累了，但这是孩子学习英语的时间。那时他对学英文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我很坚持要他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去听，去读，他才跟随。但如果我因为种种理由而取消了学习，对他来讲是



• 图：天空之镜全家合影

求之不得的好事。确实，当他问我今天还要不要读英文时，我的内心也很斗争，也非常希望停一次。但我立刻意识到今天我并不是仅仅在带他读英文而是在教他如何坚持将一件事做到底。如果我今天因为累而放弃，那么明天也会有其它情有可原的理由来破例，其结果就是因为我的破例而让他也有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破例理由。所以，我必须自己做出榜样，将自己决定的事做到底。就这样不断地坚持，从4岁到10岁，他的英文一直在

我的辅导之下。直到他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我才停止对他的英文辅导。也正因为我知道大人的坚持不易，我一般不会为孩子选择太多的课外活动。因为父母没有那么多时间花在他的身上。在他小的时候，除了英文我自己辅导之外，我们没有报什么课外班。一方面是学校已经有很多活动，时间压力已经很大，他的身体也不好。另一方面，我们自己都有繁忙的工作，与其半途而废不如专心做好一件事。这表面上看是举一

个学习英文的例子，其实后面就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

现在很多家长把周末排得很满，从游泳到围棋，从舞蹈到英文，生怕落下一个就输在起跑线上。但从我儿子的经历来看，他的很多爱好都是在毕业之后自己去选择学习起来的。当他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之后，任何年纪都可以是起跑线。但小时候学会专注地将一件事坚持下去对他长大之后做事的习惯大有益处。

最近重读美国哈佛教授，管理思想大师克里斯塔森的书《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其中也谈到了不破例的重要性。他说，以100%的坚持来保持原则要比以98%的坚持来保持它更容易实现。我对一件事的坚持在潜移默化影响了小彭学习的坚持性。就拿他学古典吉来说，无论他工作，应酬，写作有多忙，每周一次的课，他一坚持就是3年半。完全不是功利，而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写旅行日记是另一个让他养成良好习惯的例子。从他5岁开始，我们每年都会带他出去旅行。自他三年级开始，我就和他约定每次出游要写旅行日记。这个坚持非常不易。首先，作为一个很偏科的男孩，他对写作没有热情，所以每次写的东西都是“流水长长”，让我这个文科出身的母亲直摇头。但我明白一件事，不能用我们成年人的要求去要求他，更不能用我文科生的水平去评判他的写作。只要他肯写，能坚持写，他总会有进步。毕竟，在社会上用文字交流的人要远大于用数字交流的人。于是，我尽量不去评价他的写作内容，甚至不

去看他写的东西（怕看了以后直接打击他），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写。年复一年，他渐渐发现写作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他记下到过的地方和那些发生的但已在记忆中淡忘的事。于是，他开始自觉自愿地去写了。这个过程在今天我的笔下只寥寥数笔，而在真实的生活中却需要我付出巨大的耐心和坚持。有时，看到已经在外边走了一天路的孩子很疲劳的样子，真不忍心还要敦促他完成当天的日记。但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放弃了，那么他也就放弃了。因此在他把写作当成是一种乐趣之前，做一下“虎妈”是无奈的必须。终于，在高中毕业之际，当他独自周游欧洲时，他开始自觉自愿地写他的游记了。整整6万字，他每天都在半夜里对着电脑码字，不是为了完成作业，而是为了自己的心情。之后，漫漫的旅行足迹走进了一本本厚厚的笔记本里。有很多朋友看了他的文章后都惊叹他的知识面和写作意志力。问我，他哪来的时间和动力？我想，这得益于我在他小时候一直的敦促。而持续地写作让他的中文水平在大学之后的某一瞬间突然大大地提高，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很多朋友奇怪他16岁出国留学，怎么中文还可以写得这么好，其实这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让他在这十几年中坚持用中文写游记而提高的中文水平。这些博雅之趣已是他生活乐趣的一部分。（为了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他还反复阅读中国古人的游记散文，如岳阳楼记）。而我认为培养孩子的生活乐趣是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一部分。



• 图：201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与数学家纳什合影（小彭为右2）

身体管理

在学习习惯管理的同时，我们非常注重他自己对身体的管理。现在常常有人说，年轻人是用命买钱，而老年人是用钱买命。这说明很多家长并不会在孩子小的时候给孩子灌输身体重要的理念。小彭从小体弱多病。这反而让我们大人一直很关注他的身体管理。我一方面不希望他因为身体较弱而产生自卑情节，另一方面，我希望他能比健康的孩子更懂得关爱自己的身体。通常小孩的身体是由家长负责，但我想如果他能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身体，那么以后出去独立生活我们也就能放心。他从小一直哮喘，吃药比吃饭还多。但我们不会去暗示他的身体不好就可以放弃很多的尝试，相反，我们会告诉他，你的身体不好，

所以要注意自己的生活要有规律，还必须比别人更加努力。要按时吃药，要适度锻炼，等等。从他10岁开始，我就让他自己和医生陈述病情，自己去配药，自己按时吃药等等。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指导下自己行动。于是，尽管他的身体在儿童时期很瘦小，但他不自卑，并且比他同年龄的男孩成熟。他注重自己的作息安排，参加锻炼，不会熬夜。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因为身体原因而落后于其他小伙伴。甚至在大学毕业后能够加入到高强度的金融交易行业，一做就是8年。看到其他同事年纪轻轻就有了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等等职业病后，他在香港除了锻炼还坚持每周做推拿。这一坚持又是数年。

每个孩子由于自身体质不同，并不都需要有我们类似的管理身体的方法。

在这里我只是传递一个有关健康的理念，就是把孩子的身体交给他自己，这样，从小养成的良好习惯就能让他做最好的自己。

情绪管理

管理自己，最难的就是自我情绪的管理。独生子女一般情况下在家里都是最受宠的小皇帝，如果这个“小皇帝”身体不好，加上这个小皇帝又是家族中的长子长孙，估计在一般的家庭只有他任性的份了。但我们家不是这样。在社会上打拼过都懂得任性的小皇帝长大后在社会上不受欢迎。如果到那时再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会很困难。一旦适应不了社会的压力，要么就是退回家做“啃老族”，要么就是将问题都归结为独生子女的问题。我注重孩子的情绪管理，主要做到不以他为家庭中心，而把他当成家庭的小成员。做好家规，彼此尊重，平等交流。我曾跟他说过，在你18岁之前，如果我们之间有分歧，最终的决定权在父母手上。因为你是未成年人。在18岁之后，如果我们之间有分歧，最终的决定权在你手上。因为你是成年人，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孩子的情绪基本上是和学校以及同学相关的。比如，考试考得很好，老师表扬了，学校表扬了，孩子就会很高兴，而考试失败，或被老师批评，情绪就会低落。但我希望孩子的情绪尽可能不受外界干扰。于是，如果他因为考试成绩好而受表扬时，我们家里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的。

记得在第一次他拿到奖时我们就告诉他，你爸爸也有很多奖，但这已经过去了。只要自己在考试的过程中开心了，学到了东西就很好。那年他6岁。我们家庭所在意的是他对知识的兴趣，而不在意的是他的名次和分数，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孩子的关注点，从而养成他不为自己或父母的面子而学习的正确的学习态度。当外界有表扬，他是高兴但不在意。在见识越来越多的人和事之后，他意识到了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所谓谦卑和平常心，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境界。所谓山外有山就是每个人都有值得他学习的地方。现在周围朋友对他的称赞集中在他平和通达的个性上。确实，要做到宠辱不惊，首先是父母要有这样的定力和觉悟，才能营造这样的家庭文化氛围。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他考得不好怎么办？我一般看到不理想分数之后，第一句话就是，你错在哪里？懂了没有，理解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不懂，我们一起来看哪里可以改进的。如果没有尽力，是不是太轻敌？如果尽力了，但确实他做不出来，那就只能接受事实。我关心的是他是否尽力而为。人各有天赋。父母都不是完人，怎么能要求孩子一定是完美的呢？

孩子情绪的管理，一定要获得父母的帮助和引导。记得他刚到英国时，碰到了在学校里的马来西亚同学对中国人的歧视，他那时也有些情绪的波动，但由于我们一直关注他的情绪管理，帮助他去理解这样的人的一种心理状态，使得他很快就能不卑不亢地相处，并且在马来西亚同学需要帮助时，他依然愿



• 图：普林斯顿大学中文话剧社演出“暗恋桃花源”（小彭为右3）

意提供帮助。这样的性情体现出中国新生代的风采，也让他赢得了很多同学的友谊。在中学毕业后的第8年，他受他英国预科同学之邀，与来自欧洲，中东以及非洲的十位同学一起创建了一个投资公司，现在已经开始正式运作。

情绪管理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管理。教会孩子控制情绪首先需要父母自己的情绪管理。尤其不要在孩子面前经常表现出负面情绪。即使面对不公正的对待，也要对孩子有正面解读，犹如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那样，这样才能使孩子保有孩子的天真和可爱。那怕在他未来的人生中会有很多的挫折和痛苦，我仍希望他能像一个真正的少年那

样去好奇，去梦想，去尝试，去探究。我绝不欣赏一个初中生会有着历经沧桑的老人一样的人生通透力，似乎看穿了一切，毫无青春的热情。一个人如果从少年时期就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和理想，那么他的青春可以陪伴他一生。

很多国人，包括孩子和大人，都有很强的面子意识。在学习成绩上，在做班级小干部方面时“面子工程”尤其突出。但我认为，小时候过早地被大家关注会造成孩子的心理负担和压力，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才能抵御外界对其内心真实意愿的干扰。我也注意到往往一些在学校成绩拔尖的孩子在走上社会之后反而难以有勇气去面对失败。所以我

鼓励儿子为班级和集体多做事，但不在乎他是否是班干部。儿子在读初中时，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没有什么令人夸耀的奖状，也不是班级的干部，但由于我们家庭并不看重这些，使得他能有很好的心态去热心为班级服务。初中四年我称之为他经历了最宝贵的“挫折教育”。现在我反而庆幸他在初中时没有成为学校的“明星”。但对父母最大的挑战是当他在不被欣赏和关注时，如何用正面的解读去帮助他调整自己的心态，塑造他面对现实的韧性，并且继续保持纯真和阳光的个性。父母在他人格形成的关键期的陪伴和交心至关重要。正是那几年做一个班级里的普通孩子让他更加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阳光热情，善解人意，并有点幽默感。在初二时，他代表学校参加了东方电视台“十万个为什么”的擂台赛，拿到了7连冠。老师说，他在比赛中心理素质超强，这是他脱颖而出的根本。当在参赛中能将名次和面子都忘记时，他所面对的压力就变成了迎接挑战的动力了。所以，我十分看重儿子的这段初中经历。

人的运气往往不是自己所能预见的。在经历了平平常常的初中四年之后，高一时他就读了复旦附中的理科班，而复旦附中宽松的教育环境让他有了更多的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他的数理化成绩在一个理科人才济济的班级里并不突出，但他活跃在各个社团里，并结识了一群优秀的附中人。即使他的数理化成绩并不名列前茅，他依然被选为附中之星。也许就是初高中的两段经历，使得他在性格上变得包容和谦和，学会了看淡别人对他的看法而更注重自我人生体

验和自我的挑战。在他就读英国预科时，聆听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介绍，他觉得鼓励自我挑战的文化适合他，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样的学校作为他申请的“提早决定”的大学，一旦学校录取，便不选择其他学校。这样的风格在他申请工作时也是如此。一旦有了自己心仪的目标，他就不化更多时间去做那些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优秀”的其他申请。

在他的身上，已经少有面子的压力。一旦没有了面子的束缚和压力，他的心灵就得到了更多的自由，这让我为之欣慰和骄傲。

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如火如荼，就业市场严重萎缩。但他依然过五关斩六将进入了在交易行业具有很高声誉的私人交易公司。在一轮一轮的面试和心理测试中，他能沉着应对，在坚持和纠错中判断市场。这是一个交易员非常重要的素质。而我们在培养他的十几年来从没有想到他日后会成为一个高频交易员，但正是我们对他的全面的素质培养让他具备了交易员的素质。从他童年到中学毕业的成长过程中，我们父母在帮助他抗衡社会上的一切为了升学，一切为了成绩方面走过了坎坷的心路历程，自我心理也越发变得强大。而能让我坚持选择培养孩子的好个性超过孩子的成绩的最大的动力就是，我始终认为，当下的学校是为孩子的升学负责，而我们做父母的，是为了孩子的终身幸福负责。所以，用父母的人生经验和智慧点亮孩子的心灵，那么，那怕某一天我们都已离他而去，或是他在未来的生活中遇到各种挑战，他依然会感到那盏灯在他的心灵深处指引着他前行的方向。

我之如此强调健全孩子的人格，是因为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历了世界的巨变，行业的兴盛和衰落，让我看到如何学会适应和如何学会学习本身是适应未来世界的关键。我们根本无法预测未来将会怎样。和很多父母为孩子寻找稳定的生活不同，我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生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人生的不确定。比如健康，比如工作，比如财富，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摧毁。那么，应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就需要有从零开始的生活勇气，乐观通达的生活态度和广泛生动的生活情趣。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永远会在生活中找到他的生存空间，会珍惜他的生命和生活，并为他人带来快乐和温暖。

而这些品质的培养，在现在中国的学校教育中还很缺乏，于是，作为家庭教育，我们有必要为自己的孩子补上这些。

也许我的育儿方法在时隔二十年之后已经落伍。现在的家长信息更多，压力更大，选择更多，志向更远。但有一点我想无论在什么时代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孩子快乐一生，幸福一生。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父母首先要学会如何教会孩子管理自己的能力和感受幸福的能力。很多家长现在很焦虑，但和他们交流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为孩子的择校焦虑，如何选择他们的课外活动焦虑，以及出国读书焦虑。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变化的东西。是以今天的视野去把控不确定的未来。所学的知识也许一夜之间都会被淘汰，海外的形势也风云变幻，去焦虑那些我们无法把控的事其实是浪费了父母的情绪和孩子的时间。

但我们如果能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思考能力和与人相处的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会管理自己的身体和情绪，那么，无论未来如何变化，他都能沉着面对，成为一个宁静致远的人。

我很努力很辛苦的做到了，相信所有热爱孩子的父母都能做的。 

全球校友会快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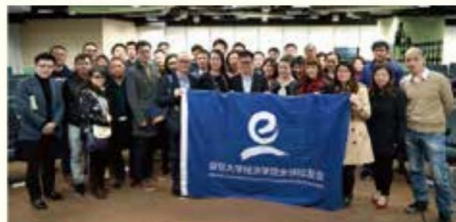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深圳校友联络处第一期“博学大讲堂”成功举办

2018年1月6日下午，新年的第一个周末，在深圳福田中信证券23楼的会议室里，复旦大学校友们齐聚一堂，准备参加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深圳校友联络处主办、复旦大学深圳校友会金融分会协办的“第一期博学大讲堂”，本次活动共有50多位复旦校友参加，10余名社会人士报名参加。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香港校友联络处第十期“大家沙龙”活动圆满举行

2018年1月6号下午，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香港校友联络处主办的第十期“大家沙龙”在香港圆满举行。雄牛资本董事长李绪富博士专程从上海飞来，与50多位香港校友亲切交流。



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副会长及经院各地校友联络处2018年工作会议圆满落幕

2018年1月13日，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副会长及经院各地校友联络处2018年工作会议在复旦召开。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陈诗一、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联席执行会长赵定理、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和法兰克福、澳大利亚、加拿大（温哥华）、日本、北京、中国香港、深圳、无锡、苏州、兰州西宁、山东、广州、新疆、海南、广西、重庆、厦门、成都、贵州、中国台湾、杭州等23个校友联络处的主任、代表济济一堂，共同探讨学院各地方校友联络处工作的未来发展。会议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主持。



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2018年会暨“走进新时代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2018年1月14日下午2点，由万思资本独家赞助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2018年会暨“走进新时代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大会有幸邀请到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校友，上海市社联主席、上海社科院原院长王战校友，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德红校友，海通证券有限公司总经理瞿秋平校友，万思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海校友做主旨演讲。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许征出席并致辞。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联席执行会长赵定理致辞，俞乃奋做校友会工作报告。万思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海校友作为赞助方致辞。大会由《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



中澳经济论坛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澳大利亚校友联络处揭牌仪式在悉尼顺利举行

2018年2月2日，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澳大利亚校友联络处主办，亨达外汇（澳洲）有限公司和西太平洋银行集团协办并赞助的中澳经济论坛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澳大利亚校友联络处揭牌仪式在悉尼铂瑞酒店顺利举行，在仪式庆典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澳大利亚校友联络处正式成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院长、联络处主任章利华女士、澳洲贸易委员会亚洲区总经理刘冰先生、亨达集团澳洲执行总经理 Kathy Chan、西太平洋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Geoege Toubia 等嘉宾出席会议并致辞。澳大利亚各地校友代表、复旦大学校友代表等近 70 人与会。在悉尼的兄弟院校校友会以及澳洲工商界和金融机构代表也到会祝贺。



“智慧之花、美丽绽放”——经济学院纬衡空间 2018 年三八妇女节校友师生座谈会成功举办

2018年3月8日，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妇委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会校友部主办的“智慧之花 美丽绽放”纬衡空间三八妇女节校友师生座谈会在经济学院 805 会议室隆重召开。本次座谈会有幸邀请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六位杰出女性校友，她们分别是：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嘉楠；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王雪松；德勤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总监常婧夷；上海拉夏贝尔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长秘书方先丽；IBM 大中华区首席数字官徐云程；上海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副总经理夏凌。这六位特邀嘉宾和到场的经济学院师生、校友一起分享了对于复旦、职场和生活的独特看法与宝贵的人生经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香港校友联络处 2018 年春茗活动圆满举行

金鸡辞旧岁，瑞犬报年丰。2018年3月10日周六中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香港校友联络处举行了一场香港校友春茗活动，邀请了数位大咖嘉宾与近六十位校友共进午餐，新朋老友欢聚一堂，共叙浓浓校友情谊。春茗会正式开始前，现场的氛围已十分热烈，复旦人的血脉让校友们一见如故，老友畅谈欢笑更不在话下。这次活动中，有多位来宾朋友从上海远道而来。五位嘉宾与在港校友们亲切交流，就各自所在的行业领域分享了近况及看法。老中青三代校友们相忆复旦往事，展望未来。



"外滩智本汇沙龙" 第八期活动——区块链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成功举办

2018年3月31日下午，“外滩智本汇”沙龙第八期活动——“区块链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30 楼思源报告厅成功举行。活动由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洪伟力主持，邀请了诸多该领域的行业精英和专家学者，希望从多个角度来探讨有关区块链的话题。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民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肖凤；上海阡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证券交易所原总工程师白硕；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主任杨东；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伟分别进行了主题分享。



复旦经院重庆校友联络处组织“金融科技产业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

4月12日，2018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在重庆举行，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等来渝出席并发表演讲。借着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首次在重庆举办的东风，4月12日当晚由广东横琴新区金融管理局指导，横琴新区金融服务中心主办、复旦经院重庆校友联络处协办的“金融科技产业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在重庆威灵顿酒店举办。来自政府金融主管部门、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律所等机构的校友及嘉宾共计 50 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香港校友联络处 2018 年春季越野行山活动圆满举行

4月14日周六上午，知名户外旅行家、野去自然旅行联合创始人洪伟力博士来到香港，作为特邀嘉宾，带领约 30 位复旦校友及校友之友赴西贡越野行山。途径麦理浩径二段至香港三尖之首的蚺蛇尖，然后行至黄石码头，下午返回市区，全程 5 个多小时，挑战颇多。校友们一路欣赏壮丽的山海美景，一路分享交流生活感受，欢声笑语，身心愉悦。



复旦大学经院深圳校友第 8 期见面会成功举办

2018年4月14日下午，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深圳校友联络处主办、复旦大学深圳校友会金融分会协办的“第 8 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深圳校友见面会”在深圳市福田区天健商务大厦长江证券会议厅成功举办！活动有幸邀请到两位优秀的校友、金融行业的资深专家黄齐军校友和赵雪芹校友作为演讲嘉宾，分享新时代下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投资逻辑。近 70 位新老校友齐聚现场，了解经院资讯，纵论资本市场，畅叙校友情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安徽校友联络处揭牌仪式暨 2018 春季高端论坛成功举办

2018 年 4 月 22 日上午，在百余名在皖复旦校友和北京大学等兄弟院校安徽校友会代表的共同见证下，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安徽校友联络处联合举办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安徽校友联络处揭牌仪式暨 2018 春季高端论坛”在合肥隆重举行。第一单元为复旦经院安徽校友联络处揭牌仪式。第二单元——“2018 春季高端论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院长、严法善教授分别发表演讲。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香港校友联络处第十一期“大家沙龙”活动成功举办

2018 年 5 月 5 日周六午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香港校友联络处第十一期“大家沙龙”活动在港大校舍热闹开办。我们荣幸邀请到中银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复旦大学 91 级国际金融系校友叶允平先生作嘉宾，同校友朋友们共话《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商业模式》。叶先生同时带来他的新书《资本帝国——巴菲特和芒格的伯克希尔》，为现场听众慷慨赠书并现场签名。逾五十校友同校友之友报名参加是次活动，现场嘉宾与校友间讨论热烈，笑声掌声频频。是日恰逢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2018 年股东大会，更让与会听众觉得别具意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地方校友联络处互访交流第一站——“走进山东”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工作在近年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不断创新校友工作的内容和形式，最新探索推出的地方校友联络处互访交流活动，2018 年 5 月 13—14 日，在山东校友联络处的精心筹备和积极安排下，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执行会长赵定理、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带领下，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地方校友联络处代表及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副会长代表林海、蒲小川、辛强、张咏等 30 多人，走进山东，走近校友，与山东当地校友进行深入的互动交流，并实地调研考察。张军院长对这一别开生面的活动形式和取得的效果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这一活动能持续开展，使之走向全国乃至海外。



首届复旦香港论坛圆满举行

2018 年 5 月 19 日，首届复旦香港论坛在港岛海逸君绰酒店举行，逾三百名听众出席了本次大会。下午 2 时 15 分，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许征女士致辞，为本次论坛揭开了序幕。论坛邀请了前政务司长及财政司长唐英年先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教授、兴证国际金融集团副行政总裁、兴业证券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忆东先生作为主讲嘉宾。



邀您助力《**客**》发展基金



2015 年 10 月，于经济学院恢复建院 30 周年之际，学院隆重举行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成立大会，这是学院发展史上的大事件。2016 年初，伴随着 30 周年庆祝活动的余热，首期《仙舟客》被送至各位校友手中。

各位校友或许会记得，复旦大学校园里的 700 号楼，曾叫仙舟馆，为的是纪念老一辈经济学家薛仙舟先生。建筑背后常常会有动人的故事，在首期杂志中，我们就刊登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仙舟馆的风物变迁。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院本身又何尝不像一叶仙舟？风引仙舟，客路相逢，数十载间，我们从远方而来，汇聚到这里，即便有一日离开，也会怀有某种乡愁。一代代人，在这里得到成长，度过了美好的大学时光。这本《仙舟客》，记录的就是我们自己和老师的故事。这是我们创办这本校友刊物的初衷。

在《仙舟客》中，您可以看到多位经院校友，他们活跃在各个领域，灿若群星。您也能在文章中找到您自己熟悉的身影。

时代总是在变，电子媒介今天已是潮流所趋，但我们还是选择做更传统的纸质杂志。我们相信，它触摸上去会有更温情。除了文字优美，我们也希望它有好的色彩，好的版式，让您爱不释手，甚至感受到款待，像再次回到了校园。

杂志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广大校友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为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准，扩大赠阅量，特设《仙舟客》发展基金。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专业化采编、队伍培养、扩大赠阅范围等事项。



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
微信公众平台



快速捐赠通道
请扫描二维码

捐赠说明

本基金以自愿捐赠为原则，全年接受捐赠，通过微信平台捐款，以 100 元为捐赠单位。捐赠者将获赠阅全年《仙舟客》，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证书，捐赠者姓名将登在《仙舟客》杂志、“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微信公众号等以表示感谢。

